

炎黃春秋

第 6 期
2009年

周瑞金：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

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

公民选举权六十年

吴晗：学者官员双重身份的悲剧

共运史上党报批评党的领导机构的争论

目 录

一家言

- 1 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 周瑞金
 8 公民选举权六十年 魏兴荣
 12 权利觉醒的时代 李永忠

人物志

- 14 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 张绪山
 22 巴金留给我们的箴言 袁 鹰
 29 吴晗：学者官员双重身份的悲剧 苏双碧
 34 李叔同与《太平洋报》 张 悅

往事录

- 37 彭德怀对“高彭联盟”的申诉 林蕴晖
 40 五十年代历史学家的命运 王维江
 46 《观察》的身份 李 钧

亲历记

- 51 “文革”前的中学生思想教育 马昌海
 55 父亲被“审查”的日子里 张 刀
 60 编写“红色文学史”的前后 张毓茂

随感录

- 63 建议开放中南海 丁 东 智效民 赵 诚
 66 “斗争哲学”曾被认为是反共哲学(外二篇) 曾彦修

品书斋

- 68 江一真“求真” 汪征鲁
 72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章立凡

争鸣录

- 77 这个疮疤揭不得 张 鸣
 79 无须掩饰的败笔 肖 荻

海外事

- 81 共运史上党报批评党领导机构的争论 靖 鸣

编读窗

- 88 读者来信摘要 彭 兴

顾问:

杜润生 李昌 于光远 李锐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实 王俊义 冯征 冯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何方
 吴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李普 李一蠡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杜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杨天石 杨继绳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云
 展江 徐孔(副召集人) 秦晖
 袁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迪 曾彦修 韩钢 雷颐
 魏久明

社会会:

杜导正(主任) 徐孔 吴思
 杨继绳 李晨 徐庆全 胡竞成

社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思

副社长: 徐孔 杨继绳

执行主编: 李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网络总监: 张晓鸥

理事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琼

理事: 白建钢 郎福呈

秘书长: 徐孔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茱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本刊网址: <http://www.yhcq.com>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

传真: 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6.90元

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

● 周瑞金

世界金融危机袭来,经济日益萎缩,失业率逐步攀升,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下滑,保护主义壁垒有所抬头。这对支撑中国30年繁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中国往何处去?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场合表示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

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为危机应对献计献策,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与网友进行了坦诚热烈的交流。近一段时间以来,网民对政府的4万亿提振经济计划,对农民工失业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对中小企业的命运,对危机时期的政风政纪等等,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善良愿望。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寒冬中,民生多艰,诸多民怨需要排解,但民心可鉴,民气可用。改革30年后民间积累的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能否在这一轮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施展,这是中国闯过世纪劫难,乘风而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

强势政府的底气来自强势人民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政府再次显示出强势政府的姿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举全国财政之力,首先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接着,各部门、地方纷纷出台投资计划。初步统计,将达10万亿以上。这说明什么?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国力大大提高的结果,令人鼓舞。

在经济强势扩张的同时,在社会稳定方面,针对2009年这个多事之秋,若干个历史事件的整数周年,经济危机背景下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继续绷紧自北京奥运会强力“维稳”的那

根弦。从新闻宣传、互联网管理到政法部门,均以严防死守的姿态,随时捕捉发现和扑灭任何“不稳定”因素。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60年历史的执政党,面对当前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这样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可以理解,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本来我国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大跃进”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指出:“目前,中国公布的财政刺激计划,并没有试图提振公共和私人消费,而是旨在使中国经济渡过难关,直到可以再次出口。这是行不通的。”“对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而是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现在,正是做出改变之时。”

加拿大《环球邮报》也发表文章说:“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加强其人民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使个人收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应地提高。”

其实,并非只是旁观者清,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呼吁。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提出,不赞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应对这次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他怀疑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就能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担心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会扭曲市场的惩

罚机制，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账，损害市场的自我修复机制，使萧条持续更长时间。张教授指出，“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才是治本之策。

另一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也认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在许教授看来，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因此，他呼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等行业放开管制，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让民众充分地发挥想像力。

目前关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者和媒体，都对这样一个现象表示深深的疑虑，这就是广义的“国进民退”现象。改革之初，邓小平等人深感几十年极左政治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和社会（包括思想文化）两方面大胆放开严格管制，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允许城镇居民自谋职业、第二职业，推行国有和集体企业承包制，发展非公经济，鼓励港资、台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允许中国公民为非境内资本企业打工。整个80年代改革，中国社会财富的涌流和物质的繁华，以民富为本，以“民富”实现“国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拐点，在经济上出现了让“不法”个体户“倾家荡产”的政策宣示，在社会管理上“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取代了“再也不能发生文革”的忧思。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下，经济政策向国有企业大幅度倾斜，非公经济虽在继续发展，但得到更多发展机会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广九那样的平民百姓，而是有着浓厚官场背景、擅长官商勾兑的企业管理者。

为了进一步看清这个问题，我想摘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引述的两组数据：

据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

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此后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的研究指出：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从1990年代初以后，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到了2007年，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1/4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倍。这些数据揭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益拖累甚至可能拖垮实体经济的时候，在中国GDP增长靠政府投资和出口两轮驱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果真正实现国内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听听丁学良先生的告诫是不无益处的，即“必须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重大转型，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大众资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这里，我们似不必拘泥于“大众资本主义”还是“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辨，更重要的是丁学良先生所言：“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如果我们意识到上述忧思不是空穴来风，更非别有用心，那么，一些学者关于不要把提振经济完全押宝在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不要将民众银行储蓄没完没了地注入国有垄断企业，金融政策重新向私营中小企业倾斜，开放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机会，更多地刺激民营企业投资而不是垄断国企低效投资，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壁垒，通过发放消费券甚至释出部分垄断国企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等方式，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这一类思考和建议，都是值得认真思考、严肃对

待的课题。

在“文革”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时刻，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果敢地启动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改革进程；今天，在应对 1929-1933 年以来最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关口，同样需要思想解放、七嘴八舌、集思广益，让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党内和党外，对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挑战和深化改革的思路广泛建言、畅所欲言，并认真倾听国外有识之士的学术建议，借鉴国际组织和外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需要政府和民间双引擎，上下一心，形成合力。要真正把民间作为经济发展、利益协调的主体，在危机中政府这个权力主体与民间这个权力主体一定要顺畅沟通，共同发力，携手破解避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诸多难题。

经过 30 年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中国民间蕴藏着极为丰厚的发展资源，共产党领导的强势政府采取充分发动民众的政策取向，就具备了抗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底气。

经济危机是社会不稳定的预警信号

世界性的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说是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利用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修复机制，在危机中率先脱险，还有可能把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债务的最大持有人中国，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搞不好也有可能翻船；说是机遇，在 1929-1933 年那一次世界危机中，成功摆脱危机的美国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头牌强国。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面临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且不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绝非 30 年前较小的经济规模可比，在庞大的基数上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更为困难。30 年改革过程中绕过去的很多历史深层次问题，30 年改革后产生的很多新的深层次矛盾，都在积累、发酵。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发生社会不稳定。经济高速发展时，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发展中受益，区别只在于受益的多寡（贫富悬殊当然也是个严重问题），可谓 GDP 增长“一俊遮百丑”；但根据詹姆士·戴维斯的“J 曲线理

论”，人们的期望值容易被繁荣的经济鼓动得很高，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拐点，生活状况的改善难以满足人们的较高期望，社会上不满情绪便高涨起来。因此，动乱常常发生在长时期经济繁荣之后突然萧条的时候。2009 年，经济下行可能还没触底，我们还要为 GDP 增长“保八”而奋斗，保持社会和谐尤其是政治稳定，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同样重要。2009 年这两个“稳”字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我们还需看到，经过 30 年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中国人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在消费者权利、物权、人身自由等方面，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复苏，公民维权行动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增加了社会现实矛盾的能见度，网络舆论成为现阶段最现实也最具影响力的权力监督手段。这是改革 30 年在社会自由和民主化方面的重大成就！但是，问题也有它的另一面：社会透明度的增加，网络监督的抬头，必然要求形成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司法公正，要求廉政和依法行政，要求透明的公共财政，要求切实保障公众的政治参与。但正如党内外几乎一致的共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特别是网民的参与意识越强烈，内心的被剥夺感也会越深刻。我们有必要重温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一段警世之言：“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由于萧条、衰退和条件恶化。一个习惯于忍受的民族，根本不知道有压迫的存在，而当这种压迫减轻了时，他们反而意识到了压迫，于是开始反叛。被革命摧毁的统治，往往就在它作出改进和改善的时候，往往就在它接受恶劣统治的教训的时候，往往就在它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时候，革命却发生了。”党领导中国已经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进行了邓小平所谓的“第二次革命”，釜底抽薪避免了另一种我们不愿看到的“革命”的发生；但要避免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还必须在中国改革前 30 年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改进和改善”后，下大决心实施较为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

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滞后，将让中国社会，包括执政党，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类话，党内

外有识之士说了很多年，在世界金融危机蔓延的2009年，恐怕更不能视为危言耸听了。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

深化改革，说来容易实行难。似乎上上下下各有苦衷，即使领导者个人意识到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一旦企图有所改弦更张，都有一种备受各方牵制的无力感。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势不可挡之际，用什么力量来化“危”为“机”？

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官民互动、上下借力，共度时艰。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化解经济危机的力量，除了党和政府的果断决策、坚强领导，还需要来自民间，要十分重视发掘和释放民间的经济社会能量。换言之，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是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是压制；而所谓“新一轮解放思想”，最需要思想解放的，也不是民间不是百姓，而是缺乏远见更缺乏担当精神的官员。

在我们熟知的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和若干个“一号文件”、“N号文件”构成的中国改革史之外，我们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看看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如何与励精图治的几代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上下呼应，江湖与庙堂联动，自下而上地瓦解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松动、融化了被传统体制板结了的中国社会。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看民间的作用力：

一、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智慧

上一个30年，每一次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是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

——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的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将之制度化。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

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就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拱动下，才得以最终完成。

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大包干”生死状，并一举大获丰收，这点星星之火，才渐次燎原全国。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市化的推动者、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更源自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曾被党报称为“盲流”欲严厉禁绝、后来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决了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壁垒和工业农业的剪刀差。

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与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把曾经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的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胼手胝足地壮大成蔚为壮观的民营经济，“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鼓励，最终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而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出现，冲决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资本论》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浙江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从监狱里出来就敢用国企积压的罐头从苏联换回飞机的川人牟其中，阿里巴巴的马云等年轻知识阶层的IT新技术人士……不管他们最终的命运怎样，都在不同层面冲决着几十年拒绝市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性堤坝。

几乎每一项改革的起步，都站着这样一些“舍得一身剐”的草根小人物，而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双渴望个人幸福、渴望国富民强的眼睛。

13亿人的渴望和智慧，是推动中国改革最大的动力。

二、中国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冲动

30年前，“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绍

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消费者协会”、环保 NGO……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改革冲动的阶层。没有改革,就没有他们;只有继续改革,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和成就感。因此,他们是改革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

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 6 个方面的人员。

据出自统战部官员一年多以前的粗略估算,新社会阶层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多达 1.5 亿。他们人员构成较复杂,但有鲜明的特征:相对学历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多为非中共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时有逾界行为,有愈来愈强烈的社会改良意识和政治诉求。

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 GDP 总量 65% 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有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 36 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

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维护公民权益、推动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可以疏通民间不满情绪的宣泄渠道,充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开辟出辽阔的中间缓冲地带。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

体制内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习惯于公权力唱独角戏的大一统社会治理模式的领导干部,那些沉迷于凭借行政权力轻而易举占有社会资源、垄断发展机会、独占改革成果的人群,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

目前炙手可热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决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发迫在眉睫。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加入新社会阶层的冲动,改革的活力可能丧失,改革的希望可能泯灭。

因此,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经济危机,拿出的四万亿,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而前年提出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之策,在一些地方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造成企业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危机已现。

而决策层和执行层对新社会组织的压制,则会在社会矛盾积聚、凸显、日益濒临爆发点的情况下,使党和政府直接面对因利益受损或期望受挫而无助、愤怒却又散乱无组织的各类草根民众,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可能连一个可以对话沟通的民众代表都不容易找到,也没有了民间停缓和民众情绪的社会中介组织。结果,只能使任何一个原本针对某个地方、某项具体政策、某些基层小吏的不满,迅速升级放大为对政府的总体抗议,对干部阶层治理能力和廉洁度的总体否定,甚至是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因此,要化解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要解放

思想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的力量。他们可能会成为协助化解危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三、新意见阶层的问世,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

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细细梳理近年来的网络焦点,诸如陕西华南虎照片的真伪之辩,山西“黑砖窑”的曝光,厦门PX项目的迁址与上海磁悬浮建设是否影响沿线居民的争议,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以及《物权法》大讨论,西藏拉萨事件与西方媒体的对峙,汶川大地震诸多救人线索的网上披露以及对校舍建筑质量、救灾物资公平分配等问题的反复诘问……诸多事件,是在网民和传统媒体的联手下,拓展了张扬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性解决渠道。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胡总书记无可争议地被评为2008年度“强国论坛”最佳嘉宾。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关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官方表达,在网民群体得到了最由衷的响应。

现在,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通过网络了解民意。每年的两会,已成网民与中南海互动的良机。数十万网民曾以网上“我有问题问总理”等方式,共商国是。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中,以网友提问作为开场白。而各地“诸侯”网上给网民拜年,与活跃网友见面对话,已蔚成风气。最近,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民各界人士调查委员会”,到晋

宁县看守所实地调查农村小伙子李荞明因“躲猫猫”游戏而触墙死亡事件,虽然于法理无据,也不宜提倡,却创造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网友可以堂而皇之进入事发现场,而不需要像前些年一些突发事件中偷偷摸摸当“公民记者”。地方党政机关不想“躲猫猫”,更体现了政府对民意的尊重和某种敬畏。而洛阳一些活跃网友和版主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则表明地方政府有诚意也有胆识,建立整合与吸纳网络舆论的机制。我们甚至可以说,网上汹涌的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决策的决心与出台的时机,甚至影响到国际舆论对中国立场的研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于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十分畅达。让我们或许是猝不及防,或许是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络来势汹汹,铺天盖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对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因为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尽管管理层可以对传统媒体说“不”,但网民们如无数没有编制的“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时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而这个新意见阶层,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都鲜明地看到了他们强有力地推动。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美国历史学家胡克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英雄能找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说他能自己创造一个。他凭借他那理解事务的超常素质,选择另一途径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胡克相信,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质”。30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特别是多年惨烈

的党内斗争中一路走来,是传统体制的内耗中硕果仅存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当时“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足以傲视世界,是几十年极左政治浩劫后为民族复苏留下的一线旺盛的血脉。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正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是自下而上的破旧立新和自上而下的规划实施完美结合的伟大革命。

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则急剧边缘化。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近年来党内一些感时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尤为可贵。我觉得,事实上,如何对待上述三个层面的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封堵、漠视,还是鼓励和因势利导?把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人权益、扩大政治参与,看做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可以调动、整合,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需要“严管、严控、严查”?这一点是衡量决策层思想是不是解放,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

面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袭来,中国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动力和希望究竟何在?如果说改革30年前两个阶段的主要动力,来自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强烈的执政危机感互动,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

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相结合,那么今天,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动力、新希望就在于:执政党坚持科学发展、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崭新执政理念,与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新意见阶层及广大民众强烈要求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完美结合!

上一轮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现在首先是要讲真话的时候,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实情”;“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个黯淡的时刻,坦率和有力的领导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诚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胜利之本。”近来,我们常说企业对投资要有信心,公民对消费要有信心,还有一个信心可能更为关键,就是政府对自己的人民要有信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典口号。我们说了几十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勇于担当的胆识,需要视民如殆的人道主义情怀,说到底,也需要领导层的坦然自信。不仅要教育人民群众相信党、相信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自身也要相信人民群众,是经济和社会双“维稳”的主体和动力,而不是在群体性事件等场合“维稳”防范的对象。要相信党和政府具备改革创新的能力,相信“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具备抵御世界经济危机、化解规避潜在社会动荡、甚至化危为机,迈向世界强国的政治实力。要真正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并智慧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才能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如此,则中国前途幸甚,中国人民幸甚!

(作者系《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公民选举权六十年

● 魏兴荣

选举权,最通俗的阐释是选择和推举领导者及被选择、推举为领导者的权利。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即使选举的对象是人大代表,代表受委托的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去推选领导者。

选举权是一项政治权利,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权利,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最起码的政治权利,因此是一国宪法赋予公民权利中的必备权利。此项权利是否具有普遍性、真实性和制度保障性,关乎一国民众的地位与福祉,关乎一国执政者的执政合法性及执政方向的正确与否。尽管选举权几乎无一例外地载于各国的宪法中,但这种权利仅作为一种宣示、一种标榜还是具有制度保障的真实性,是将一个政治实体划分为民主与否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标准。

我国公民选举权现状

回首1949年以来60年的历史,我们所制订的四部宪法都规定了公民享有选举权。但公民的选举权在现实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状况?让我们稍作解析。

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宪法教科书上阐释此规定的特点时,总结出两大特点:普遍性和平等性。并进一步阐释说,普遍性是指一个国家内享有选举权的公民非常广泛,所有达到一定年龄的公民,不论其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等因素,都享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而平等性是指每个选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不允许任何选民因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

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不同,而在选举中允许某些公民享有特权或对某些公民加以限制或歧视。

欲使具有如此“普遍性”和“平等性”的选举权利从宪法文本走向现实生活,除了宪法的原则规定之外,须由相关法律作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否则,字面上的权利则如不能充饥的画饼。我们国家的选举制度是基于间接选举而设计的,即公民无权直接选举各级行政官员,而是由公民选举的代表去参与对官员的选举;而选举代表也基本是间接选举,即除了县以下人大代表采取直接选举外,其余各级人大代表都是下一级代表选举上一级代表,如市人大代表选举省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即由代表选举代表,而不是选民直接选代表。因此,关于选举方面的具体规定我们更多地只能参照“代表《选举法》”(此选举法的全称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但其实际内容只涉及对代表选举的规范)的相关规定。

如何使各种选举真正体现民意,使公民的选举权真正得到行使,候选人的产生是否代表民意是至关重要的选举环节,也是选举公正的初始。我们的代表候选人是如何产生的呢?《选举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推荐者应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介绍候选人的情况。第三十三条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图为刘少奇在会上讲话

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

以上规定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

一是选举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限定了代表候选人产生的途径,从而强化了选举中的“党性”,弱化了民性。二十九条规定了政党、团体及选民或代表十人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的三条渠道。除此之外,为何不设定代表候选人的个人自荐途径呢?因本条未设置候选人产生的“自荐”途径,一方面限制了公民的被选举权,另一方面也阻塞着“选民或代表十人联名”途径的畅通。因为联名一般是建立在自荐的基础上,不允许自荐,联名之渠道则会被渐渐淤堵。现实情况亦如此,当有联名推选候选人的情形发生时,为了“消解”该联名的成功性,常常要求被联名推举者本人表态及签字是否同意被推举,使被推举人陷入一种“尴尬”境地而违心退缩。久而久之,“十人联名”推举候选人的情况几乎已不复存在,而团体推荐也鲜见,剩下的只有政党(且多为执政党)这一强势集体推荐候选人的唯一渠道了。也正因为如此,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这些原本应被代表监督的对象,却都顺利地成了各级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并最终成为代表。

二是选举法第三十三条客观上保护了代表候选人实体资格的非透明性,使选民和代表失去了辨别候选者优劣的起码依据。第三十三条的规

定有三层意思:(一)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二)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三)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其第一层意思中的“介绍候选人情况”具有单向性,缺乏介绍者与选民或代表的互动,致使介绍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简化介绍,在现实的选举过程中“介绍情况”成了一张写着候选人简历的纸,人们只能从中看到该候选人姓名、年龄和历任职务等简单情况,而其是否具备候选人所

应具备的品格、能力方面的实体性资格,选民却无法获知;第二层意思中因写着政党、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情况,因一方面哪是政党推荐哪是团体推荐的候选人人们并不清楚,另一方面既然是“可以”介绍那也可以不介绍。所以在现实选举过程中这一环节从来没有出现过。至于第三层意思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因规定中是“可以”而不是“必须”,选举委员会若嫌麻烦不想组织见面会,那也不违法。于是,在现实的选举过程中,此种“见面会”也被轻而易举地省略了。

如此这般,如果候选人一般系政党所定,选民或代表又无法获得候选人真实情况的知情权,那么选民或代表选代表时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没有选择依据的选择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选择,是一种压根不存在选择而只能是走过场的名义“选择”。这种做法丧失选举的严肃性,使公民的选举权在无形中被消解了。

层层选出的代表是如此选举的,这样产生的代表能代表真正的民意去为民代行选举权吗?公民的选举权到此已大打折扣了。

除了代表的选举以外,对各级领导人的选举是如何规范的呢,让我们以选举国家层面的各类领导人为例,检视一下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

宪法第六十二条(四)至(八)项所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选举方面的职权如下：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八)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以下的问题：

(一)重要职位选举程序缺失。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竟然不包括对委员长的选举。从宪法“国家机构”一章中，我们看不到委员长究竟归谁选举。

(二)提名程序规定不统一，有的职位有人提名，有的职位无人提名。如国务院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而国家主席的选举无人提名，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选举均无人提名。

(三)候选人的产生未设定选举规范，个别职位的领导提名制体现的是公权意志，而不是民意。

(四)过于简化而模糊的选举程序缺乏选举人参与的必要空间，使原本庄严的选举流于形式，失去尊严。

选举国家层面的领导人如此，选举各级地方的领导者也如此。代表选举机制加之领导选举机制构成我们国家整个选举制度的几乎全部。至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直选部分，因该“两委”均未列属国家政权序列，且因缺乏更大范围的规范选举环境等因素致使该部位选举乱象环生，我们暂且不论。在这样一种选举机制中，我们很难看到公民依据自己的意愿参与选举的制度空间。由此看来，宪法在公民权利章节中所“赋予”的公民选举权的内容仍滞留在文本层面，且一滞留达60年。而且此种滞留非现实当中有何障碍，不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真经，而是法律本身就不曾设置选举权下放的通道。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选举机制，在众多的选

民无知情权的情况下，各级人大代表们，各级官员们，每每都顺利地高票当选，成为公民的代言人或管理者。仅以全国人大十一届代表大会为例，看看全国人大代表所选的国家主席、总理、高院院长、高检检察长，所得赞成票率都在98%以上，如此高到几乎百分百的普遍高得票率，则很能说明我们的选举是怎样的一种情况。选国家领导人如此，选地方领导人如此，选人大代表、党代表皆如此。即使空投的各级高官人选，尽管代表们常委们对其政绩、能力、品行如何皆一无所知，这些候选人也一样能顺利当选。所有的选举都顺利进行。所有的选举都波澜不惊。所有的选举都没有悬念。

选举权得不到落实的弊端

不管宪法对公民选举权的文字规定说得多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但现实中公民选举权的虚无状态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因为每一个具备选举权资格的公民都在经历着未曾享有过真正的选举权的复杂况味。

公民不能享有法定的选举权的弊端显而易见。

一是严重影响宪法的权威与尊严。如果连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一国宪法所赋予的公民的权利都只是纸上谈兵、聋子的耳朵，那么，让人相信宪法至上的地位从而加以敬畏则是不大可能的。人们会认为宪法也不过如此，不过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从另一角度曲解列宁的名言），说着好听，摆着好看，没有实用价值。如此，宪法的权威将大大降低。如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处在不可实用的虚化状态，这样的宪法的权威性、正当性也自然大大降低，民轻薄它，官也不看重它。

二是影响执政者的公信力。宪法赋予了公民选举权，现实中公民却不能实际享有选举权，说明执政者存在说做不一的问题。试想，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家长对孩子许诺说你有何种权利，而实际上却并不给他承诺过的权利，孩子会作何想，还会对家长给予信任和尊重吗？况且家长和执政者并不能类比，家长的位置是天然的，而执政者是被委托的。家长食言都会带来信任危机，执政者如此不更易使公信力丧失殆尽吗？

三是毒化从政之路的环境与土壤。如果各级代表和官员的产生都是执政党内定的，而非通过公民的意愿优选出来的，那么，这些代表是否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官员是否能执政为民对代表与官员来说就无关紧要了。因为“民”影响、决定不了他们的命运，他们无须对人民负责。现实中百姓拥戴的官员未必得到提拔，百姓反对甚至民愤昭昭的官员反而官运亨通，带病提拔成为一种并非罕见的现象。这种种事实的叠加，给从政者和意愿从政的人一种强烈的负面信号：对上负责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环境与土壤怎么能造就出更多一心为民的好官和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呢？

四是疏离官民关系，加剧官民矛盾，危及政权根基。当官员的官位来自人民手中的权利，他就会饮水思源，回报人民，千方百计为人民谋福利。当其官位与人民没有多少关系，人民在其心中就没有位置，他不仅不会竭尽所能的服务人民、造福人民，而且还会以权谋私，鱼肉百姓。当人民没有权利选择领导者时，他们就只能俯首听命、任人摆布，官员们就会颐指气使和滥用职权，就无须买老百姓的账，老百姓的地位就无从谈起。此种情况下的官民关系只能日益疏离，且矛盾日积月累，不断加剧。看看现实中各地层出不穷的官逼民反酿成的突发群体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就可以判断出官民关系恶化的程度。长此以往，社会就会发生分裂，引发动荡，出现政治危机。

五是造就不负责任的公民社会。当公民及代表所参与的选举并不需要也不允许且不能够（不了解候选人）表达真实意愿时，当这种选举成为一种法定习惯时，国民的选举意识、民主意识、政治责任意识及公正意识、道德意识都会日益淡化。如果我们选举制度不断地培育这样的选民和社会政治氛围，这对国家、对社会、对公民都将是非常有害而危险的。我们常常慨叹、谴责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道德缺失、诚信缺失的现象，我们想没想过这种现象是如何造成的？我们想没想过我们负有在体制上引领、提升公民道德水平、诚信意识的责任？

改革选举机制，推动政治文明

什么样的选举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什么样的选举是劳民伤财徒有其名的选举，是不言而喻

的。在信息化、互联网时代，我们切不可低估公民日益提高的鉴别力。事实是任何空洞的说教都无法掩饰的。官员们位居高堂俸禄丰厚，他们的俸禄来自纳税人，他们手中的权力也唯有来自人民的推举授予才正当。如果人民的选举权利不能落到实处，官员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那么官位就来自自授或官授，少数人秘密相商一平衡一妥协就把权力瓜分了，这样的权力未经人民授予也不受人民监督则不能保证权为民用。这样的权力最终走向专权与腐败也势在必然。

2008年世界范围的大选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一个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个是偏安一隅的同胞之地台湾。他们的大选激情燃烧到本土之外，竞争之激烈扣人心弦，透明程度之高让世人洞悉。他们的大选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盛事，成为表达民意的最集中最重要的渠道，成为凝聚人心的盛典。人们像过节一样历经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海外的选民也放下手头的一切，万里迢迢自费回家，参与数年一度的选举，表达心中的意愿。经过这样的大选，一个领导者走上政治舞台的峰巅位置，那是经历风雨后见彩虹，一旦胜出，那是多么激动人心和无上光荣！就像2008年的北京奥运，任何一个冠军的桂冠都是在公平公开的规则下、在全世界的注目下拼搏而得的，是多少年的艰辛汗水换取的，所以他们无须掩饰胜利者的骄傲与狂欢，他们用各种方式向世人激情宣泄光荣时刻的美妙感觉。体育如此，政治也如此。公正、公平、公开之下，方有荣耀，方有体面。

建国近60年了，改革开放30周年了，选举权写入宪法也54年了。30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经济从计划走向市场，改革开放成就辉煌。但顺应潮流顺应民意需要变化的选举制度却始终未变，未改革也未开放。在回顾、庆祝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的时刻，在庆祝建国60周年的时刻，我们确实到了以重建选举制度、落实公民选举权为突破口，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文明的时候了，否则，我们精神层面的大国地位便无以确立。至少，我们到了该设计方案的时候了，到了该设立时间表的时候了，到了该倾听民意之声的时候了。因为无论如何，从人治走向法治、从专制走向民主，都是我们对未来不可逆转的正确抉择。

（责任编辑 吴思）



● 李永忠

生于 197 年前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小说家狄更斯 ,在其《双城记》的开头 ,对所处的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 ,作了这样的描述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 ,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 ;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 ,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 ,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一个希望之春 ,也是一个失望之冬 ;我们面前有各种机会 ,我们面前也一无所有 ;我们可以直登天堂 ;我们也可以直下地狱……”

近二百年后的中国 ,也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阵痛。

研究中国历史 ,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民本思想 ,古已有之。如“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等说法 ,早见于 2000 多年前 ,可却常常停于思想家的笔 ,止于清官忠臣的折 ,留于开明帝王的嘴 ,而很难付之于行……

于是 ,千百年来 ,从来没有贵过的老百姓 ,不得不把自身的全部权利和希望寄托于父母官 ,顶礼膜拜于好皇帝。

一个绝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的古老民族和古老帝国 ,凭什么能延续几千年 ,而且凝聚的力量远大于分裂的力量 ?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支撑这么多的人 ,在这么长的时间 ,患难与共 ,同舟共济 ?

这其中也有地域的原因 ,文化的因素 ,及其它各种影响……但是能维系几千年的大一统帝国 ,必有其更具特色、更深层次的东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我探秘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 来 ,腐而不朽 ,垂而不死 ,死而不僵的深层次原因 ,发现了两个更为有意思的现象。一是隋唐开创的科举制 ,在理论上给了所有读书人通过科考而非钱财、出身、关系、背景以出线(学而优则仕)当官的可能性。此举不仅开了世界最早还官帽之权于民的先河 ,也开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先河。二是秦汉完备的监察制度 ,使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达到一个几近完美的程度。皇帝握有立法权 ,

金口玉言 ,王言即王法 ;丞相及地方行政长官掌有执行权 ,独立于行政系统的监察系统 ,即从中央的御史大夫到地方监察官行使监督权。封建社会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 ,维护了封建社会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 ,使贪官污吏及不合格的官员能及时有效地清除出去。入口有比较客观公正的科举制 ,出口有相对独立的监察制 ,从而确保了多数朝代都能维持二三百年。即使维持不下去 ,政权被农民起义推翻 ,新组建的政权也会照样采用科举制度和监察制度 ,以保证其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

这就是制度的力量。也即权力结构的力量。

而清王朝的灭亡 ,则在于其立法权不能顺应时代的改革要求 ,皇权独大且改革太慢 ,虚君共和迟迟不能推行 ,再加上科举制度偏重八股 ,监察制度剑走偏锋 ,君主立宪说在嘴上 ,写在纸上 ,贴在墙上 ,却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于是 ,以改良的方式走向共和之路严重受阻 ,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势在必然。

于是 ,武昌起义枪响 ,辛亥革命爆发。

纵观秦汉、隋唐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史 ,监察制度和科举制度在维系这大一统的封建帝国 ,防止分裂割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这极具特色的两大制度 ,基本上也与中国封建社会相伴始终。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意识到这点 ,不仅在西方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上 ,明确提出了五权分立 ,加了监察、考试两院 ;而且将走向共和的历程 ,明确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 ,并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

过了差不多一百年 ,被坊间称作新三民主义的“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由胡锦涛总书记提出 ,体现了我们党对以人为本的最好诠释。

改革开放三十年 ,既是我国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三十年 ,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三十年 ,还是广大干部群众权利意识觉醒和复苏最广泛的三十年。第一次解放思想 ,在经济上实现了最广泛的还权于民。农民有

了自己的地,困扰多年的吃饭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深入基层调研中,引用了老百姓“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话。对这句话稍作分析,即可明白,“端起饭碗吃肉”说明经济上还权于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放下筷子骂娘”,影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群众权利还未实现。据此,胡耀邦前瞻性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和复苏,而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及时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1988年3月2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来自台湾代表团的黄顺兴,在麦克风前的一句“我反对。”发出了1954年以来全国人大第一次公开出现的不同声音。人大代表权利意识的公开表现,折射了人民群众权利意识的复苏。

身处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从大量案例中,既可以最早并直接感受到“权利时代”的到来,也可以深刻并真实地感受到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我以为,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大体市场化了,而政治体制(特别是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却基本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多年来不少地方和单位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没有做到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因此,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少地方和单位,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快更好地把我们带入权利时代。我们如果希望不当时的落伍者,就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认真回应权利时代的挑战。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

真切感受到权利时代的到来,有利于在反腐败问题上形成共识。那就是,中国三十年的反腐败,在经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的历程中,权利反腐已成弦上之箭。

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的五种,而这五种需求可分为两大层次。前三种属于低层次需求,后两种属于高层次需求。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大多数人的低层次需求基本满足,而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复苏,则是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此阶段的必然反映。当然,任何一种需求都不会因为更高

层次需求的发展而消失,而是相互依赖和重叠。只不过高层次需求发展后,低层次需求虽然存在,但是对行为的影响力则大大降低。

网络集合公众意志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是典型的“权利反腐”。这种民间的“权利反腐”与体制内“权力反腐”将共同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的完整体系。

从反腐蚀到反腐败的三十年,我们猛然发现,组织部门对“一把手”的优中选优不可谓不精,宣教部门对“一把手”的各种教育不可谓不细,各级党委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不可谓不严,纪检监察机关对“一把手”的查案力度不可谓之不大……可是党政“一把手”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却持续上升,乃至占同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40%左右,一些地方和单位甚至超过一半多。

这是因为,在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力推动下,我们虽然已进入了权利时代。但是,受“一手硬,一手软”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还未实质性推进,对权力的有效制衡还未真正形成,群众的权利意识还未充分表达。正是这些地方和单位“主人”的权利严重小于“公仆”的权力的状态,“权力之虎”不仅尚未被真正关进“权利之笼”,而且还可以随时随地发威伤人。最近网络关注度极高的“罗彩霞事件”,就是“权力之虎”严重伤害权利人的经典案例。

身处权利时代,需要执政党、全社会又一次广泛深入的解放思想。农村改革的成功,关键就在于经济上还权于民,从而为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厚底。新世纪新阶段的解放思想,既需要坚持并深化“生命论”(即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的理论认识,也需要扎实推进“以人为本”的具体做法和有效恢复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也即主人翁地位),从而促进执政党及全社会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复苏,在经济上还权于民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上还权于民。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2020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我的朋友吕良彪律师在概括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维度上,列了三个重要维度,即:“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特色的政治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色的经济现代化,以公平、自由、文明为特色的文化现代化”。我认为,如果再把“以权力分解、权力制衡的权力结构为特色的制度现代化”,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列入其间,那就满足了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所必须的构成要素。

我以为,“权利时代”的进程快慢与权(下转14页)

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

——从“假如鲁迅还活着”说起

● 张绪山

毛泽东喜爱鲁迅什么？

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一书提到的一个重要政治情节:1957 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

罗稷南提出的这一命题,涉及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偶像人物。以毛的回答,在毛执权柄的时代,鲁迅的处境有两个,且只有两个:一是沉默,一是

坐牢,没有其他选择。但不管怎样——沉默或坐牢——那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鲁迅都是本色不再。这意味着,原来被认为是互相配合、心心相印的两位旗手——一个被认为代表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代表着正确的文化方向——在建国以后宿命般地走到对立的两极。

然而,通观毛泽东毕生著述中涉及鲁迅的文字,人们看到的却是他对鲁迅的推崇和喜爱,以毛个人的说法:“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

1933 年,有人告诉毛,鲁迅称毛的诗词充满“山大王气”,毛听后哈哈大笑,不以为忤,反以得意,是毛以鲁迅得其心的证据。1949 年 12 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在应付紧张的外交活动的空余,还在阅读随身携带的鲁迅著作,并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

(上接 13 页)力结构的改进完善程度成正比。在广大群众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不断增强,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新阶段,必须加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近 30 年前就一针见血的指出,必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而改革领导制度的核心,就是改革权力结构,就是在权力问题上正本清源。

危机在大智慧者、大军事家和大政治家面前,通常也是机遇。以我之见,用金融手段解决金融危机,不过下策而已;用经济方式解决经济问题,不过中策而已;用政治体制改革解决面临的危机,才是上策。因为在世界金融危机来临时,能看到房子这个物品问题的人,只能算个战术家;能通过房贷问题认清金融危机这件事的人,可以算个战役家;能透过金融危机悟到可能出

现的各种危机,认识到以人为本,并勇于审时度势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才能称得上大战略家。而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透过物而见到人,通过经济危机看到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大战略家。因此不仅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响亮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在《法兰西内战》中更明确地强调:“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

因为,权力与权利间的差异和矛盾决定了,权力与权利不是一个恒等式。权力永远不会在没有约束和制衡的条件下自动代表权利。

历史证明:权力只有来自权利,权力才会真正代表权利;权力必须回归权利,权力才能真正属于权利。

(责任编辑 吴思)

觉。”1966年7月8日毛在一封信中再次提到，“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并说，“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就在生命接近倒计时的1975年11月，毛还就周海婴提出的鲁迅著作出版和研究的建议做出批示，“请将周（海婴）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鲁迅全集》因毛的指示而获得迅速出版。

对于毛的自托知己，鲁迅在天之灵做何感想，人们自然无法知道，但毛何以视鲁迅为知音，则可以从毛的文字中窥见一斑。

早在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突出强调的是：“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很显然，毛泽东尊敬鲁迅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鲁迅的事业与自己的追求的一致性。所以，他认为鲁迅虽“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不过，最能打动毛泽东，使他引为同道的，是鲁迅的性格特征。鲁迅一生嫉恶如仇，对旧势力毫不妥协，尤其是他那“打落水狗”的斗争精神，以及直到晚年对于自己的论敌“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都非常符合毛泽东的脾胃，与其性格相投；更重要的是，毛似乎从鲁迅那里借鉴到了榜样的力量，为他从马克思那里学来并加以中国式地运用、终生视为法宝的“斗争哲学”找到了同盟。所以他对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韧性备加赞赏，称颂鲁迅“一贯彻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他认为鲁迅一生有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不过，在这三个特点中，毛泽东最重视的无疑是“斗争精神”。

如果说在建国前重视鲁迅的“斗争精神”是夺权的客观需要，那么在建立政权以后，毛泽东也没有放弃之，相反，更将这种“斗争精神”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发扬光大，灵活地加以运用。60年代初，在一次谈话中他再次提到鲁迅的性格，

认为“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可见，他从鲁迅那里感悟到的是一以贯之的“斗争精神”。他毕生珍视并坚持青年时代发明的述志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说明他对“斗争哲学”是何等的热爱。他在建国以后的所作所为，确实如其所说，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即使是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一旦被他认为是“向他射的箭”，他便“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彭德怀、刘少奇的惨死，邓小平的屡遭打击，都是明证。

鲁迅生活在中国社会的黑暗时代，他以文艺为武器所进行的反抗，是新兴力量反抗旧社会势力、改造旧的文化传统的努力，所以他毕生的“斗争”都是针对旧势力及其维护者；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如果活到50年代以后，当然也不会收敛其批判社会的锋芒，放弃批判社会的义务。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前，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对旧制度进行批判，同鲁迅一样是旧政权的反抗者；但与鲁迅不同的是，毛泽东还是新政权的建立者，他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后，习惯性地以“斗争哲学”和“斗争精神”维护自己的政权，不仅将“斗争哲学”磨砺的锐利矛头指向了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敌人，同时也无情地指向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昔日与之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战友，于是，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成了他“斗争哲学”的牺牲品，死的死，伤的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他感觉需要调动全体国民参加斗争、维护其政权时，则不惜发动“文革”这样摧毁

国计民生的内乱,终至导演了一场陷整个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千古浩劫,而为这一切进行辩护的,是他那套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起点是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领悟”：“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一言蔽之,曰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一句话,阶级斗争。”这样的理论又被他掌握的舆论工具鼓吹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对斗争的喜爱或曰嗜好,贯穿于毛的一生,甚至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刻,他还是念念不忘于阶级斗争。1976年元旦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使两位客人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对“斗争”主题的激情留恋。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似乎在宣告他用毕生精力发现的一个真理:“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朱莉·戴维注意到,精力显然已消耗殆尽的毛泽东触及“斗争”话题时,“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对斗争的追求变成嗜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鲁迅地下有知,该怎样评价这位将他视为知己的“斗争论”英雄呢?

毛泽东的“圣人”理想与鲁迅地位的演变

一个人有醒着的时候,也有睡觉的时候,要了解一个人,固然要听他醒着说的话,但梦呓也有用处,它能使人们知道他潜意识中的欲念,让人知道他清醒状态不愿告人的想法,透过他在非常状态下的表现,人们可以看到他潜意识的真实内容。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间,毛泽东震怒于刘少奇的冒犯,当着众人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见刘源、何家栋:《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8

年11月20日)刘在毛心中的地位于此“失态”之语中真实地显现出来。同样,毛对罗的回答也应作如是观。

1957年夏天毛对“假如鲁迅还活着”提问的回答,不经意间流露出新环境下其内心深处的秘密:事过境迁,毛对鲁迅已经形成居高临下的支配心态。这种情形很类似于唐太宗击败突厥,踌躇得意之际,随口说出“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云云,透露了李渊曾称臣突厥的天大秘密。

然而,毛泽东内心的这个秘密并非一时情感冲动的产物,而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为其英雄主义的理想所激荡。他在年轻时代就立下“自信人生二百年,奋当击水三千里”的豪言壮语,志存高远,指点江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但是,毛的理想决不止此。他认为,“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伦理学原理批语》)他在给友人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原因是曾国藩树立了将“豪杰”(事功)与“圣贤”(文教)集于一身的榜样。及至壮年,他的“圣贤”理想更显突出。在他那气吞山河,雄视百代的“言志”诗中,明言“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言下之意,这些神武圣王都不过是武功差强人意而已,至于“文采”、“风骚”则不足道哉。“略输”、“稍逊”貌似谦恭,实则是高傲的自负。对于号称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一句“只识挽弓射大雕”,将这位功略盖天地的世界征服者变成了一介赳赳武夫。“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让人看到了一种气势如虹的雄心,一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使命感:毛不仅要建立超越千古帝王的武功,而且还要实现流芳百世的“圣人”理想。

为了实现自己摧毁旧政权的抱负,毛泽东文武兼用,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思想资源。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对旧制度的攻击和破坏,是与自己的事业追求不谋而合、休戚相关的,所以他对抗在新文化先知先觉者地位表示充分肯定,甚至提高到与孔子相提并论的高度,认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40年1月他发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写下了那段被后人广为传诵、视为定评的文字：“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的文字以几个“伟大”和“最”字形成一首完整的赞美诗，对他三年前(1937)提出的“鲁迅圣人论”做了进一步发挥和阐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毛泽东理想事业的一个阶段的完成。他以雄辩的历史事实将扫清六合，席卷八荒，混一宇内的赫赫武功，明白无疑地摆在了世人面前。然而，这只是他事业的新起点，他要在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上，以思想征服寰宇，成为孔子那样的“圣人”，完成他“君师合一，惟我独尊”的新功业。

为了这新的事业目标，他一次次掀起思想改造的骇涛巨浪，不惜毁掉中国社会极为需要的数十万、上百万最发达的头脑。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从50年代初拉开序幕的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改造，与此相配合的是对大学的改造，将大学中的人文学科这个创造独立思想的机关解散。毛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其意甚明。继此之后，1957年，以所谓“旧文人”为对象的反右运动全面展开，原来被共产党视为盟友的其他党派的知识人受到彻底清算，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文化人，如声称“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专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政”的罗隆基之辈大部被肃清；及至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毛的打击之下已经元气殆尽——或噤若寒蝉，或气息奄奄，于是矛头转向曾为其出力扫荡党外知识分子的党内知识分子。党内党外知识分子全被肃清之后，毛个人的“圣人”地位，以“全面专政”的方式在表面上确立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以“罗稷南设问”为标志，毛对知识分子——鲁迅不过是其典型代表——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那就是：要么闭嘴，要么做囚



鲁 迅

徒，在他的“圣人”事业面前，一切阻力都必须彻底清除，即使他从前推崇备至的鲁迅也不例外。不过，对于鲁迅，由于他已是不会说话的古人，不会对现政权再做批评，而且他的“斗争精神”还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毛没有必要对他展开形式上的讨伐；相反，只要将鲁迅那“须仰视才见”的高大形象置于自己的权威之下，烘托之效立刻显现。毛将历经无数惊涛骇浪而炼就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谋略驾轻就熟地再运用了一次。

果然，这一目标在“文革”初期就按照毛的愿望顺利实现了。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日，毛亲自掌控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社论。《红旗》杂志社论以《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为标题，写道：“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人民日报》则在《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社论中写道：“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奋

勇前进！”这两篇社论精神高度一致。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将鲁迅与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关系完全改变了，鲁迅不再是开一代风气的先觉者，不再是毛泽东的精神先驱，而成了热爱领袖，活学活用领袖著作的先进典型，成了毛泽东麾下“俯首甘为孺子牛”，时刻听从领袖召唤，领袖指向哪里就战斗到哪里的文艺小卒。

这个格局的形成受到两个关键人物的推动。一是郭沫若。郭在历史上曾与鲁迅展开论战，被鲁迅称为“才子+流氓”，但在新政权建立后逐渐被捧为文化班头，鲁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辉旗帜”。郭沫若发表题为《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的文章，说：“鲁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一个提交申请，一个批准申请，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这位大才子笔下已经清晰地出现了。然后，郭氏又以鲁迅生不逢时的不幸及自己生逢其时的幸运托出毛泽东的伟大：“今天我们的时代比起鲁迅在世的当时，在一切条件上都有天渊之别了。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选集、毛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看到毛主席，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啊！”最后，郭氏以设想的形式巧妙地将鲁迅置于毛泽东麾下：“鲁迅如果活在今天，他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的高峰。”郭沫若不愧为嗅觉灵敏的政治家，才华横溢的文字高手，贬抑与吹捧之间做得不露声色，一气呵成，手法之娴熟，令人叹为观止。

另一位是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对许广平来说，她在建国以后显然已从毛对以往思想文化权威的攻势中体会到一种趋势。早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就对马克思发出了挑战。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对马克思：“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

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这里的“我们”实际含义是“我”，即毛本人。在这样咄咄逼人的事态面前，许广平不可能不明白，保护鲁迅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地、知趣地让曾经被毛誉为“圣人”的鲁迅甘拜下风，以免遭遇被贬黜的尴尬。所以，1966年10月她在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文章中写到：“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就是鲁迅和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最高指导原则。而鲁迅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文化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最勇敢的战士，一名伟大的旗手。……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指引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样浅显易懂的“文革”语言，表层上展现的是具有典型时代特点的恭敬与虔诚，而在本质上则是主动地退避三舍，以求保全鲁迅。中国有句古语：“识时务为俊杰”。许广平“贬抑”心爱的鲁迅当然是“识时务”之举。在当时大调子已经定下的环境氛围中，除了随着时代的音符唱下去，唱出“主旋律”，还有其他选择吗？即使心有不甘，又能怎样？但在客观上，许广平以鲁迅代言人的特殊身份贬抑鲁迅，以烘托毛的权威，其效果是他人难以比拟的。

依靠出神入化的谋略，毛泽东为“圣人”理想所做的奋斗迅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结出了丰硕成果。林彪给毛戴上“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四顶桂冠，标志着“君师合一，惟我独尊”的伟大目标已经实现。然而，对于这速成的“圣人”之业，毛的心中仍然萦绕、盘桓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感觉。1970年12月18日，他接见美国著名作家斯诺时，针对这四顶桂冠，心情复杂地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他虽然将四桂冠之一“导师”改成了“教员”，但对这“教员”桂冠的钟情是显然

的,因为这 Teacher 与“圣人”的本质相同,那就 是 抚育苍生,参天地之化育。当然,他所要教化的绝不是几十个孩子,而是按自己的意愿训育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就在这次会见中,毛谈到“文革”和个人崇拜问题,问斯诺,如果没有崇拜,你会高兴吗?毛的这个问题,从他的“圣人理想”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圣人与教主都需要个人崇拜。但对于斯诺,这一点似乎并不能理解,在西方近代文化史上,个人崇拜与邪教是一致的。所以他向毛指出“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败”的道理时,毛木然未有任何反应。(参见《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年《文汇报》2007 年 8 月 18 日)

不过,毛泽东即使已被捧为神,显然也隐约地感觉到,实现他的“圣人”理想,决非易事,绝没有他从事政治和军事斗争老本行所具有的那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从容,更没有驾轻就熟地施展阶级斗争艺术时所具有的那份“胜似闲庭信步”的自信。1971 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重读《鲁迅全集》,似冥然有所感悟,于同年 11 月 20 日对相关人员说:“我劝大家再看看鲁迅全集……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这话说明,他此前确曾自视为“圣人”,但同时也说明,时到此刻,他不得不承认,“圣人”并没有做成,他的“圣人”梦想并没有圆满实现。

然而,不管口里怎么说,他内心深处却一刻也未放弃“圣人理想”,而只要毛的这个梦想一日未了,他人就不敢颂扬孔子和鲁迅,即使后者曾被毛称为“现代圣人”。就像 1959 年庐山会议时,林彪对受到批判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在主席面前,我们任何人都不要想当英雄!林彪不愧为一代枭雄,对毛的了解显然高出他人一筹。后来林彪出事,孔夫子被无辜地与林彪捆绑在一起,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批判对象,似乎向人们说明,在毛泽东面前,任何人都不要称“圣”,就是孔子也不例外;鲁迅的“圣人”地位虽是毛泽东本人“封”的,但其现代“圣人”的称号只能出自毛泽东之口,而不能出自他人之口;如果出自他人之口,就意味着对鲁迅“圣人”地位的公开承认,构成对毛的威望的威胁。可为佐证的是,

直到文革末期的 1976 年,鲁迅的胞弟周建人还不得不继续放低姿态,贬抑鲁迅,称:“鲁迅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共产主义无限向往,这正是鲁迅‘韧’战精神的思想基础。”(《学习鲁迅“韧”战的革命精神——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可以说,从建国之始以至毛故去,鲁迅始终是领袖政治棋盘上的鲁迅,一个被现实政治作为棋子使用的鲁迅。

活在毛泽东时代的鲁迅必然成为囚徒

在中国几千年演化的历史上,每一个新生政权都面临巩固政权的难题。这个难题的解决的首要条件,自然是解决整个政权赖以存在下去的物质生产问题。如果没有起码的物质基础,任何政权都必然不能持久。取得物质资料生产者在生活资料和精神道义上的支持,至为关键。解决之道,千头万绪,要害是与民休养生息,恢复民生。在这个基本条件之外,最棘手的问题是解决对新政权构成(显然的或潜在的)威胁的社会力量问题。在新格局的利益分配中,当权者必须妥善安置为新政权出力、立下巨大功勋的武将文臣,使其各安其分,不得僭越。

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可是据长期追随毛、曾做过他的秘书的李锐研究,毛从马克思那里只学到四个字:阶级斗争;对民主的理解只是“要让人家说话”,对别人的恩赐而已;他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说明他无法律观念。(李锐《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炎黄春秋》2006 年第 10 期)另一方面又嗜权如命,公开对人讲,“我是不让权的”,直到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都不曾放手;同时迷信自我,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明言“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郭宇宽《胡耀邦,生前办过〈理论动态〉》《炎黄春秋》2007 年第 9 期)这些特点说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毋宁说是中国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最高产儿。因此,他为巩固新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能跳出中国传统吏治文化的窠臼,突破专制传统的藩篱。

在处理“武”的力量方面,鉴于政权已经易手,原来敌对阵营的投降将领,即使心有不轨,在

失去民心的处境中已不可能再兴风作浪，所以，即使对于他在理论上认为是一切反动势力代表的清朝末帝溥仪，以及在战争结束前列为“战犯”的傅作义、杜聿明等蒋介石集团的得力干将，也往往表现出相当的宽容；相反，对于那些为他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在民众中有着崇高声望的战友，却是处处设防，稍有不满，即行严惩，毫不留情。

治国从根本上是士大夫的事业，对于士大夫阶层的政策，从根本上关系到新政权的安危。毛当然明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然而，但凡书生，思维能力就相对发达，就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倾向，不管其从前立场如何。尤其是20世纪初叶以来，经新文化运动对启蒙思想的传播，成为现代思想标志的“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已为众多知识分子所接受，虽然这一启蒙过程为外敌入侵造成的民族救亡所打断，但其影响仍不可小觑。尤其是，海禁开放以后，大批中国学子负笈海外求学问道，回国后成为一股冲击中国皇权专制文化传统的重要力量。在接管中国以后，精于国情的毛对于这一切洞察秋毫，了如指掌。所以对于书生一直坚持非经改造不可使用的态度。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批右倾，“文化大革命”，最后釜底抽薪以求彻底解决，将应该接受教育的青年学生赶到乡村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本质是文盲化和愚昧化——这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目标只有一个：显见的动机是钳制舆论，巩固政权；深层的动机是完成不朽的“圣人”功业。

不过，正如乌龟可以随时将脑袋缩到脖子里面逃避外面的危险一样，知识分子可以随时将思想隐藏在脑袋壳里，以表面上的言听计从掩藏内心不服与对抗。所以，毛对于自己多次发动的改造运动所产生的效果并无十分的信心，以至为后世留下两句玩世不恭的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愈多愈愚蠢”。前一句可谓深得中国传统愚民策略的“精髓”，与孔孟圣贤之徒的一贯精神若符契合。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一句则流露了毛在多次思想改造不能完全奏效时所表现的无奈和妒恨之情。

毛在建国之初面对的文人力量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原来追随他打天下的文人，如郭沫若、邓拓等，二是天下纷争过程中处于游离、超然状态的中间文人，如梁漱溟、陈寅恪等，三是敌对阵营中倒戈的文人。这三部分人中，第一部分文人经由延安整风，对毛的谋略和手段早有领教，已成驯服之物，是毛推行其文化策略的依靠力量；第二部分人数最多，这些人多数饱读中国典籍，同时又多接受现代西方文化的洗礼，是这个时代中国最大的文化承载体。由于这些人接受的自由主义传统教育，与毛的“圣人”理想相左，所以成为毛的思想改造事业的主要对象。第三部分力量相对较小。

毛对这三部分力量进行打击的次序有先后，但态度和策略则是一致的，即：或者俯首称臣为我所用，或者自我消失。前一种类型以郭沫若、冯友兰为代表。郭沫若在建国不久的国庆庆典上，代表党外人士向毛献礼致辞中，已有“您是我们的导师，我们永远跟您走”之类的称臣之语，后来更多次以“我是毛主席的一名老学生”之类的谦卑之词表示臣服。冯友兰之卑躬屈膝，更是世人皆知。后一类型，一部分人选择可杀不可辱的自戕，如老舍、邓拓等，一部分则选择沉默失语，忍辱含垢、苟全性命，如小说家沈从文改行研究中国服装史，史学家陈寅恪三叹“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之后，选择“颂红装”——撰写《柳如是别传》——的“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年”。

不过，由于这些书生在政权易手之前已经成就大名，在读书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一部分人中即使少数人对毛的意志明确表示不服，也没有遭到杀戮。最典型的例子是梁漱溟。1953年9月，梁漱溟与毛发生争论，遭到毛声色俱厉的痛骂，被毛骂作“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不见血的杀人犯”，与蒋介石的用枪炮杀人相提并论，但仍然能苟全性命，最后寿终正寝。由此看来，鲁迅如能活到当时，大概也不过如此。但以鲁迅惯有的与当局不合作的性格，他必定做出屡屡抗上的举动，甚至写出类似“好个国民党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那样痛快淋漓的骂人文字来。如此说来，他活着的话，大概只有进监狱做囚徒一途。

其实，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对于自

己的命运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经预测到了。他在1928年发表的演讲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已经将道理解释得很清楚。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的职业本能却使他对现状永远处于不满状态，总要批评社会，与政治不断冲突，成为政治家的眼中钉，其最终结局不是被排挤出去，便是被杀头。对文学家而言，唯一的选择就是“逃”——逃到国外去，逃不掉便被杀掉。鲁迅一生坚持与当权势力不合作，以其特有的凌厉风格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抨击，虽遭当局压迫甚至通缉而不至陷于灭顶之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租界的存在——他那《且介亭杂文》可以为证——为他提供了逃身之处。

更富有寓意的是，鲁迅对历史上革命成功以后文学家命运的观察：“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的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挤出去不可，或者割掉他的头。”这样的话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是预测未来的谶言？巧合的是，在他死后，后人以他还活着设问，得到的回答，竟是他已料到的结局。

“假如鲁迅还活着”这个虚拟命题的意义

“历史不能假设”，是很久以来许多人信奉的原则之一，而“假如鲁迅还活着”却正是以不存在的“鲁迅还活着”的假设为历史推论的前提，因此，在许多人眼中，这似乎不应是一个史学研究认真对待的命题。

其实不然。“历史不能假设”这个原则只是指已经生成的历史事实的不可改变性。若就历史所具有的实用性的借鉴功能——所谓“读史使人明智”——而论，“假设”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和必要的，因为这种“假设”正是人们借鉴经验、避免错误的必要条件。“鲁迅还活着”，当然属于“假设”，但由此虚拟的“假设”所得到的“要么

闭嘴，要么坐牢”历史解答，却显示出极为丰富的历史和社会意义。人们从这个貌似简单的回答中看到的是，历史在彼时走向了一个延续旧传统弊端的错误方向。这个错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其恶例，一直延续两千余年，在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本应得到彻底改造，却未能得到改造，相反又死灰复燃。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毒素再次沉渣泛起，甚嚣尘上，犹如一盆污水，熄灭了新文化运动先觉者们历经艰辛才点燃起来的思想启蒙之火，中国社会由此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完全背离了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当时的中国有没有可能走向历史要求的正确方向？怎样才能走向正确方向？后来走向错误方向，原因何在？能否避免？如果说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所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难道说中国人民活该遭受那“要么闭嘴，要么坐牢”的折磨？活该要历经十年人为浩劫的苦难？如果说，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历史研究还有何意义？

中国人历来强调“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鲁迅这样的文化思想巨人，无论是被迫沉默还是做囚徒，都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怎样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需要考虑“假若鲁迅还活着”条件下，怎样才能使他既不沉默又不做囚徒的问题。这从根本上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设计，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旧制度向现代新制度转变中不可回避的根本性的难题。解决了这个难题，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了中国现代性改造中的大问题之一——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改造。这就是“假若鲁迅还活着”这个似乎有违“历史不能假设”旧例的“假设”所显示的重大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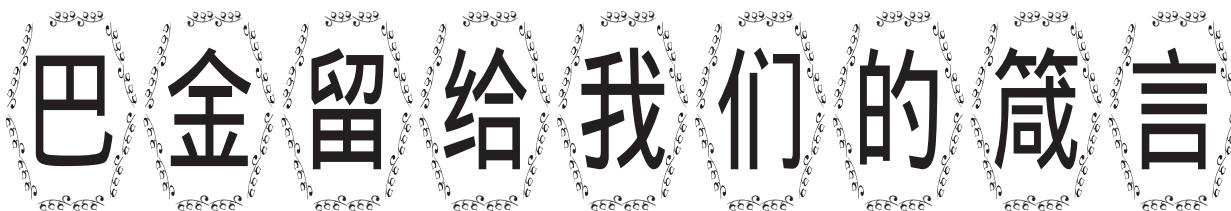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启 事

《炎黄春秋》1999年至2006年尚有少量刊物(不全)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或前往购买。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城铁四惠东站B口往东20米报亭。

联系人：朱亮，电话：13552967836



● 袁 鹰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原《离骚》

巴金老人远行转眼又已三年,我总记得最早见到他的情景。回想起来已是近六十年前的事,1949年6月5日下午,上海解放刚一星期,八仙桥青年会礼堂坐满了文化教育科学界知名人士,出席上海开埠一百年未曾有过的一次盛会。统率大军解放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长陈毅将军便装到会,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讲了一两个小时,他那豪爽坦率的态度,真诚实在的讲话内容,加上诙谐风趣的四川口音,洋洋洒洒,谈笑风生,使会场上自始至终欢声不断。上海知识界人士见过许多世面,从国民党政府军政大员、欧美各国要人到中外名流学者,“阅人多矣”,却是第一次面对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陈毅市长的风度,完全出乎他们想象之外,许多人从此成了“陈毅迷”。在吴有训、陈望道、茅以升、潘震亚等几位教育家、科学家接连发言之后,主持座谈会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请巴金同志发言。巴金腼腆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第一句话便说:“我虽然也是四川人,却是不会讲话的四川人。”顿时全场忻然,陈毅市长也哈哈大笑。

这一天我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尽管在初中时代起便读过《家》、《春》、《秋》和《灭亡》、《新生》,是巴金的热诚崇拜者,为他笔下那高大墙门里腐朽的封建气氛引起哀伤和愤恨,也被那种反抗旧社会旧制度的勇敢行为而激动鼓舞。我也早知道他原先住在法租界霞飞路,“孤岛”时期离沪

去内地,抗战胜利后又回上海。我正进报馆当记者,却从未敢去冒昧打扰这位大作家。那天八仙桥盛会上,是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位崇拜已久的前辈,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他不仅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而且是那么谦恭平和,坦诚朴实。

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恢复了中国报纸传统的副刊,副刊的灵魂是作为头条的杂文,改版之初,我们约请多位老作家支持,叶圣陶、茅盾、夏衍等前辈都热情支持,纷纷赐稿。巴金先生从上海也寄来一篇《“独立思考”》,是有感于教条主义的棍子妨碍人们独立思考,必定影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贯彻,正是当时思想文化界一个重要的问题。文章不长,但点明了已经开始盛行的痼疾:

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硬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他们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听到处都在唱他们听惯了的那种没有感情的单调的调子,他们就满意地在套子里睡着了。

他们的棍子造成了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好像声势很浩大,而且也的确发生过起哄的作用。可是这种棍子并没有打掉人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事实上单调的调子中间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不过教条主义者没有听见或者不去听罢了。有些在套子里住惯了的编辑同志喜欢把别人的文章改来改去,一定要改得可以装进套子才甘心,但是写稿的人仍然要从套子里钻出来。打闷棍,头一次也许有用处,我再来,别人早已提防了。谁都知道,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教条代替不了“独立思考”。

在中国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是占大多数,他

们对大小事情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并不习惯别人代替他们思考,但是他们也不习惯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却喜欢暗地里吱吱喳喳(这倒有助于教条主义者的虚张声势)。所以“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他们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他们需要“鸣”,也应当鼓励他们大“鸣”。要是他们真的大“鸣”起来,教条主义者的棍子就只好收起来了。

(《人民日报》1956年7月28日,署名余一)

文章不长,语调平和,毫无剑拔弩张的火气,却是言近旨远,以小见大,说的全是真话,体现了巴金为人为文的一贯风格。在五十年代教条主义之风正盛的时候,能够说这样一句见血的话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未必能对他所抨击的人起多大警示作用。在某些自诩为马列水平很高的人那里,对这类杂文根本不屑一顾。我们副刊编辑部倒是一直以作者对编辑改稿的批评戒,注意不要硬把别人的文章装进套子。后来巴金同志还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一篇《论“有啥吃啥”》,听说在上海还引起一阵波澜。可见得说真话并不容易。

二

十年动乱结束后第二年冬天,我同两位同事去上海,邀请文艺界人士座谈,揭露和批判“文革”中为林彪、江青合伙炮制的“文艺座谈会纪要”特别是为害十年、余毒很深的“文艺黑线专政”谬论。我们连续开了两次座谈会,一次是文学界的,一次是艺术界的。12月10日那天,上海已经很冷,巴金一早就来到东湖路招待所,和柯灵、王西彦、李俊民、孔罗荪、杜宣、黄裳、草婴、茹志鹃、包文棣等同志先后热烈发言。他们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四人帮”党羽们种种非人道的摧残。巴金更是首当其冲,受到的伤害最重。但是他们在发言中都不谈自己的遭遇,而是愤怒地声讨“文艺黑线专政”论粗暴否定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成就,对文艺界施行残酷的迫害,充满伤感地提到一些不幸过早离世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名字(请见附录)。巴金讲话不长,但很有分量。他认为“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是余党犹在,余毒深远,我们千万不能手软,一定要除恶务尽。他后来将发言补充成一篇三千多字的



中国文联副主席巴金

文章,在12月2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除恶务尽,不留后患》。他以自己解放后的经历,驳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荒谬和危害。他指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文艺界盘根错节,作恶多端,不彻底把它砸烂清除,隐患无穷。他讲话声调并不高昂,也未举一个实例,但是我们都能体会到这位在十年动乱中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作家心头的隐忧。

1978年底,我忽然收到表兄潘际炯从香港寄来一份港版《大公报》,打开一看,在他主编的副刊《大公园》上,赫然有一篇巴金新作《谈〈望乡〉》,展读之下,真有意外的惊喜。日本电影《望乡》,在北京和上海上映,虽然已经过“手术”,受到观众欢迎,仍然引起不少的波澜,主管部门的官员竟然出面公开反对。巴金在文章里支持电影,批评“禁映”的声浪。他的文章虽只在香港进步报上发表,影响仍然不小。从电影《望乡》这件小事,可以看到他对国家民族所受灾难是那么哀伤痛心,对造成这场旷世灾难的封建专制遗毒和“左倾”思潮是那么憎恨厌恶,更引起我们的心灵的强烈震撼,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无动于

衷。这位“不会讲话的四川人”,讲的是发自肺腑的真话,是实实在在的话,是人民群众的心里话。

从《谈〈望乡〉》开始,到《“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前》、《老化》和《怀念胡风》等篇,巴金先生以病弱之躯,断断续续写了七年半,一共写了一百五十篇散文随笔。老人自谦为“五本小书”,但是实际上它们是一部大书,一部蘸着心头流出的鲜血写成的大书,一部站在历史高度光照时代的大书。五本书都是普通的题目,偶然想到的杂感,文字短小,大部分只有一两千、两三千字,但是,每一本,每一篇,字字句句,都浸透了作家对历史和时代、对国家和民族的真挚的爱和沉重的责任感。读这些散文随笔的感受,不同于读他早期的许多作品,而是他发自肺腑的呼唤,他呼唤我们同他一起,回顾我们大家走过来的崎岖道路,回顾几十年的难忘岁月。他呼唤我们用自审、自省和自责的心情去反思那被扭曲的历史。

后来几年去上海看望巴金先生时,我虽然知道他仍在不停笔地写一篇又一篇《随想录》,也读到那些充满了深刻的真知灼见、洋溢着真挚的人间至情的文章,但为了不引起老人过多的感慨,我有意识地克制自己。然而,每次都是他自己先谈到《随想录》,表示还要写下去,哪怕每天只能写几十个字、一二百字。他还有许多许多心里话要说,还有许多许多债要还。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神情是严肃的、真诚的。他毕生都是这样一个严肃、真诚地对待历史、对待生活、对待朋友、对待自己的人。

《随想录》的一百五十篇文章中,写得最多的是十年灾难,犹如一场长长的噩梦,时时搅乱他的心,搅得他不得安宁。然而,在他笔下出现得更多的字眼,不是控诉,不是声讨,而是——欠债,还债!

人怎么能忘记自己的过去呢?你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难道真是永远正确吗?你难道一生不曾负过债?难道欠下的债就不想偿还?最好还是先来个“小结”吧。

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这一生的收支总账,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账是赖不掉的,但是这些年我们社会上有一种“话说过就忘记”的风气。不仅是说话,写文章做事也都一样,一概不上账,不认账。

屈原在两千多年前悲怆地低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巴金的“欠债”感,正是来源于对人民的深沉的爱。他再三再四地说:“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我常常沉重地想,这位饱经忧患和创痛、为人民贡献了巨大的、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的老人,他到底欠了谁的债呢?难道不正是那些制造十年疯狂、凌驾于人民之上、作威作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欠了十亿人民的债吗?难道不正是那些挥舞着种种名目的鞭子、棍子和帽子,对巴金和许许多多同巴金一样的人进行连续不断的诬蔑、陷构、迫害、打击的阴谋家、刽子手、造谣密告者,欠了巴金的债吗?难道不是那些妄想阻挡车轮前进的螳螂式的小丑们,欠了历史的债吗?

巴金说得好,欠债总是要偿还的。那些真正欠了债的人,不管他们如何费尽心机,终究逃不脱历史的判决,被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但是,也还有为数不少的人继续在过逍遥日子,他们不仅不上账、不认账,而且继续增加新的债务,毫不觉得脸红心跳;反而是一位受尽创痛的老人,却在无休无止地、鞠躬尽瘁地还债,这岂非是非真理的大颠倒!

《随想录》从1979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第一册,其后二十余年,陆续出版单行本、合订本、精装本各种版本三四十种,还有英文、法文、日文和朝鲜文译本,总共印了多少册,难以数计。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上已难见踪影,想买也买不到了,若是哪一次书市或者义卖活动中偶尔出现几本,绝对会立刻成为读者争相购买的抢手书。作者用生命写下的书,越过时间的风雨,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愈来愈被人们认识,愈久愈显出金子般的光芒。

十五年前的初夏,报社老同事离休后应聘到华夏出版社帮助策划编辑工作的夏宗禹兄来商量为《随想录》再印一种线装本,作为巴金老人九旬大庆的贺礼。我极力赞同,认为是绝妙的好主意,《随想录》已有过多种版本,只缺线装本了。当时距老人寿辰11月25日只有五个月,我担心地问:“来得及吗?”宗禹兄说华夏出版社全力支持,杭州富阳古籍出版社乐意承担,力争11月中旬成书。这种线装书,若是从经济效益着想,肯定是要赔钱的。但是出版社和印刷厂出于对巴

金老人的衷心尊敬,出于对说真话的《随想录》的感佩,义无反顾地承担下来。也许正是基于这种真挚的心情,一连串繁琐细致的编辑、校对、照相制版、印刷、装订工作,都在有限的日子里几乎是倒计时地一一有效有序地逐步完成。宗禹兄一次次奔走于北京、上海、杭州三地,仆仆风尘,不计疲惫。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心愿:一定如期将这份华礼在老人华诞之日送到他的书桌上。这位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千千万万读者,献给多灾多难的民族的老人,他最需要的不是什么豪华的庆典,不是什么颂词和蛋糕,而是同人民大众心心相印、息息相关的书。

到11月上旬,大家的心愿终于成为现实,新颖的线装本《随想录》如期印出来了,印刷厂派出专人专车,将第一批书从富阳赶送上海,送到武康路,送到巴金老人手上。据在场的宗禹兄电话中告知,老寿星抚摸着书册,连声说“谢谢,谢谢。”兴奋喜悦的心情难以描述。他将第一套样书送给了题写封套书签的冰心老人,嘱咐夏宗禹兄尽快送到北京,他在扉页上写了几行字:

冰心大姊:

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的九十朵红玫瑰,更谢谢您的题字。现在书印出来了,看见您的字仿佛见到您本人,我真高兴。托人带一套给您,请您接受我的感谢,分享我的快乐。

巴金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宗禹兄在电话中转达巴老给冰心老人的信,说将用最快的方式将这第一套书送到北京,希望我尽快送到老人手里。当时尚未盛行快邮专递,他托铁路局京沪特快车乘务组同志带来交给我,我拿到书后,立即奔赴西郊谢府。当时已届九十三高龄的冰心老人前两个月因病住院,才回家休养不久,身体还比较虚弱,一见线装本,高兴得不得了,反复摩挲,不住地说:“太好了!太好了!”她戴上老花眼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巴公在扉页上写的短简,才读一行,抬头问我:

“他怎么知道我要送九十个玫瑰?我的缎带刚刚写好,作协的人明天才来取呢。”说罢,就催家里帮工的那位大姐展开书柜上那两条红缎带,上面写着:

巴金老弟九十大庆 冰心欣贺

老太太童心未泯。她不知道送九十朵玫瑰的信息几天前已经传递到上海了。

巴公在书里夹着一张照片,是当年7月在西湖休养时所摄,老太太将照片竖在面前,左看右望,高兴地笑起来:“你看他笑得多开心!”停了一会,又轻轻地说:“他活得太累太苦了!”

我静立书桌边,不禁恻然,默默咀嚼这句话的分量,将心交给读者的人,也必定赢得读者的心。

还是老太太打破屋里的沉默。她将五本线装书翻了又翻,爱不释手,又低声自语:“可惜字小了一些,老年人看有点费劲。”我接过话头:“将来再出一种大字本吧!”可惜这个想法至今也未能实现,我常常想,要是真有机会出一套供老年读者(这样的读者群如今越来越多)阅读的大字本《随想录》,该有多好!

四

晚年的巴金老人,时刻萦绕心头的是两座博物馆。他写文章不断呼吁,在会议和朋友间谈话时一再提起:一是现代文学馆,记载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而灿烂的路程;二是“文革”博物馆,记载中国人民经历的那场旷世劫难。

1986年6月15日,他写了《“文革”博物馆》一文,郑重提出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的希望,他说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他相信所有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练的人是不会沉默的,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害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巴金说: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定:绝不让我们的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的民族彻底毁灭。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牢记住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况,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这十

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真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写这篇文章的两个多月前,他在一篇题为《纪念》的随想录里记下同一位朋友的对话,已经提到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事。他认为二十年之后痛定思痛,应该严肃地对待那十年岁月,严肃地对待自己,想想我们自己犯了些什么错误,大家都应当来一个总结。应该把那一切丑恶的、阴暗的、残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东西集中起来,展览出来,毫不掩饰,让人们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记住,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事:

为了那可怕的十年,我们也应该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一二十年来,许多有识之士公开写文章,大会小会上发言,热烈响应,衷心拥护巴金的建议,不为别的,就因为这是千千万万“文革”受害者共同的心愿。它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灾难都是深重的,残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而且损害不止一代两代。十年中,从中央到基层的绝大多数干部都被打倒,轻则罢官、靠边,重则受到打击、迫害,许多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许多身经百战的老帅老将,被摧残得非死即伤,许多忠诚正直的爱国民主人士,许多誉满中外的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教师、工程师横遭诬陷和凌辱,许多勤勤恳恳的干部,被整得非病即残、家破人亡,这笔血债不该永远记住吗?这十年中,从城市到乡村,都遭受大动乱的祸害,经济濒临崩溃,工矿机器停转,大片田地荒芜,“宁长社会主义之草,不长资本主义之苗”,铁路公路交通混乱,亿万黎民百姓忍饥挨饿,人心惶惶,青年学生不读书、不学习,耽误了大好青春,危害了两三代人,这无法计算的损失难道比八年抗战轻吗?不应该让子孙后代牢牢记住吗?

二十年过去了,巴金老人垂涕陈词也为我们许多人热切向往中的“文革”博物馆还在虚无缥渺之中。虽然早就有人一再提醒对“文化大革命”宜粗不宜细、不要纠缠旧账,可是,“文革”十年(或者更长一些)是涉及全民族命运因而无法绕开的历史,它已在亿万人民心头留下深深的烙

印,制造了至今也未消除的灾难。历史可以原谅,但绝不能忘却。个人的责任、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宜粗不宜细。但是历史的是非,历史的责任,历史的教训,却是宜细不宜粗的,越是细致、具体,才越能深刻、准确、永志不忘。巴金说得好:“我们应该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

十年动乱,祸害深远,波及亿万家庭,几乎人人心头都有一本血泪账,几乎千千万万家庭都可以建一座小小的“文革”博物馆。一段段难忘的经历,一次次悲恸的生离死别,一道道刻骨铭心的伤痕,几本残缺不全的日记,几封浸透泪水的信简,一批批被践踏焚毁的藏书,甚至小小的用具、文具、玩具,都会留下“文革”动乱的痕迹,记录下伤心的记忆。“文革”已经过去三四十年,它们都时时在我们的心头发出隐痛,时时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一段岁月!只是自己记住、家人记住、子孙记住还是远远不够的,要让每个人的遭遇、每个人的记忆成为社会的、民族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每个能拿起笔的人士都应该拿起笔来,记下那十年大动乱的一切的一切,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记下那在冠冕堂皇的革命言辞下所有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记下那在唬人画皮后边的妖魔面目,记下那在漂亮外衣里面的狼心狗肺,记下那“到处莺歌燕舞”的虚伪宣传后面的饥饿、失业、贫穷和混乱,记下那“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走五七道路”等等庄严口号下种种迫害干部、蛊惑青年的政策和措施,写成文章,编成书籍,用文字和图片把那一切记载下来,白纸黑字,洗不清也擦不掉的。

值得欣慰的是,近二三十年来,我们读到不断出版揭露和记录“文革”十年的回忆录和其他书籍,冲破樊篱,走上书市,走到读者手中,进入人们心里。最早的是周明、刘茵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到近几年,还在陆续问世的有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马识途的《沧桑十年》、叶圣陶、叶至善的《干校通信》,王仲方的《炼狱》等等。还有那些记叙追述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潘汉年等一大批老革命家重大冤案的书籍,林林总总,数不胜数,这里随手拈来,只不过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它们都拥有大量的读者,即使印数不多,也被人们争相传阅。许多人都是从那里找寻各自的影子和逝去的岁月,也都能从那

里直接或间接地反思“文革”的教训,去思考这一场浩劫究竟是怎么发生和发展的,如巴金先生所说的“为什么在中国土地上会发生那一场空前未有的民族大悲剧?”

这不是实际上已经用文字和图片形式建立了许许多多文字的“文革”博物馆吗?从流通的角度说,比起一座固定的建筑,它们可能起着更便捷、更活跃、更广泛的作用。巴金先生说得对,那些在“文革”中得到好处的人,可能至今还会心心念念梦想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他们自然是不会赞成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的。确实有人一直对建立“文革”博物馆抱着保留或者非议的态度,一直以种种似是而非或冠冕堂皇的借口加以阻挠和反对,也仍然有那样的人滥用手里那点权力去违反宪法公然拦截一篇文章的发表,禁止一本书刊的发行。不过,他们真要那样做,即使得意于一时,终究也要失败,那是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的真理。

巴金老人去世前一二十年中,我每次去上海,总要去拜望。有时他去西湖边休养,有时他住华东医院治疗,我也都拜托小林女士代致问候。在武康路寓所见到时,老人总是亲切又细心地询问近况,关怀备至。有一次他问起我的写作打算,问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是不是多一些时间。我回答:虽然不再上班,每天也还有一堆杂事做不完,有不少题目待写,还有些编刊物、编书的任务,写作的时间并不多。巴老听了,同往常一样,并没有多讲话,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要赶紧写,不然来不及。”只有九个字,却给我重重的一锤。我牢记至今,时刻不敢稍有懈怠。不敢言老,不敢轻易搁笔,总觉得还有可做的事,还有应该说的话。写的文章并不多,质量并不高,只是常用巴金老人留下的箴言提醒自己:讲真话!

[附录]:感谢上海友人,寄来一份“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上海文化艺术界人士名单,他说这名单并不完整,或者说只是略为“知名”的人士,肯定还有遗漏。抄录这份三四十年前已经离开人世的名单,仍然止不住惊心动魄,不寒而栗:他们究竟何罪何辜,一个个如此惨烈地倒在兽性的摧残杀戮中!让我们这些劫难后的幸存者,永远地记住他们的名字吧:

李平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历史学会

副会长。1966年6月20日在家中开煤气罐自尽,终年59岁。

叶以群:文艺理论家,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艺月报》副主编。1966年8月20日跳楼身亡,终年55岁。

姚启钧: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66年8月4日跳楼身亡。

傅雷:文学翻译家,上海市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1966年9月3日与夫人朱梅馥同时自缢,终年58岁。

杨嘉仁: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1966年9月6日与夫人程卓如开煤气罐自尽。

李翠贞: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1966年9月9日开煤气罐自尽。

应云卫:戏剧家、电影家,曾任上海市影协副主席。1967年1月16日自尽(另一说猝死于游斗的卡车上),终年62岁。

顾圣婴:钢琴演奏家,上海交响乐团独奏演员,1957年获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金奖,以后多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1967年1月3日在家中与母亲、弟弟一起自尽,终年30岁。

孟秋江:新闻出版家,名记者,曾任《大公报》副社长,香港《文汇报》负责人。1967年3月16日跳楼身亡,终年57岁。

陆洁:电影编剧,拍摄过《渔光曲》、《狼山噪血记》等影片,上海电影厂、上海电影局顾问。1967年8月2日被迫害逝世,终年73岁。

关宏达:电影演员。1967年12月20日被迫害逝世,终年53岁。

余鸿模:出版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1968年3月17日被迫害逝世,终年60岁。

彭柏山:作家,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1956年因“胡风事件”受到错误处分,调厦门大学、河南农学院工作。1968年4月3日在郑州被迫害逝世,终年58岁。

金仲华:新闻出版家、国际问题专家,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1968年4月3日自缢身亡,终年61岁。

常溪萍: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1968年5月25日跳楼自尽,

终年 51 岁。

黎照寰 :教育家 ,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校长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68 年 9 月 16 日被迫害逝世 ,终年 70 岁。

上官云珠 :电影艺术家 ,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演员。1968 年 11 月 22 日跳楼自尽 ,终年 48 岁。

陈又新 :音乐家 ,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1968 年跳楼自尽。

吴湖帆 :国画家。1968 年被迫害逝世。

孟君谋 :电影实业家 ,上海电影厂制片处副处长 ,上海科学电影厂副厂长。1969 年 1 月 10 日被迫害逝世 ,终年 66 岁。

舒绣文 :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 ,上海电影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主要演员 ,中国影协常务理事 ,全国政协委员。1969 年 3 月 17 日在狱中自尽 ,终年 54 岁。

郑君里 :电影艺术家 ,上海海燕电影厂导演 ,作品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林则徐》、《聂耳》等。1969 年 4 月 23 日在狱中被迫害逝世 ,终年 58 岁。

顾月珍 :沪剧表演艺术家 ,上海努力沪剧团团长 ,上海市剧协理事 ,上海市政协委员。1970 年 1 月 12 日跳楼自尽 ,终年 49 岁。

慕容婉儿 :电影演员 ,电影翻译家 ,上海电影厂翻

译。1971 年 1 月 26 日被迫害逝世 ,终年 50 岁。

浦熙修 :名记者 ,曾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 ,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办公室副主任。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1970 年 4 月 23 日被迫害逝世 ,终年 60 岁。

闻 捷 :诗人 ,中国作协理事 ,上海作协理事 ,甘肃作协副主席。1971 年 1 月 13 日开煤气罐自尽 ,终年 48 岁。

王造时 :法学家 ,复旦大学教授 ,全国政协委员。1971 年 8 月 5 日被迫害逝世 ,终年 60 岁。

齐 衡 :电影演员 ,上海电影厂演员。1972 年 12 月 17 日被迫害逝世 ,终年 60 岁。

魏金枝 :作家 ,上海作协副主席 ,《收获》、《上海文学》副主编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1972 年 12 月 17 日被迫害逝世 ,终年 72 岁。

周信芳 :京剧表演艺术家 ,上海京剧院院长 ,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 ,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剧协副主席 ,上海文联副主席 ,上海剧协主席。1975 年 3 月 8 日被迫害逝世 ,终年 80 岁。

丰子恺 :画家 ,美术和音乐教育家 ,文学家 ,上海美协主席 ,上海作协副主席 ,中国画院院长 ,上海文联副主席。1975 年 9 月 15 日被迫害逝世 ,终年 77 岁。

(责任编辑 萧 徐)

广 告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 苏医械广审(文)第 2008040039 号 京医械广备字第 2008050153 号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服 务 中 心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 16 号
电话: 010-64071474 64074641 64002810
传真: 010-64055026
邮编: 100009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6 号天恒大厦 508B
电话: 010-84608848 传真: 010-84608847
邮编: 100027

SW 声望听力 网址: <http://www.sw-tl.com>

解决听得见 听不清
耳聋耳鸣的烦恼

吴晗

学者官员双重身份的悲剧

• 苏双碧



吴 晗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学家，早在学生时代，就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以《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等几篇用功很深、颇有建树的考证文章奠定了他成为明史专家的基础；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又使他从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走进民主运动的队伍，并成长为坚强的民主战士，以至于成为共产党忠实的朋友。这种历程又为他展现了中共掌权后的宽广仕途——他曾担任北京市副市长。

吴晗本人对当市长和当学者究竟是什么态度？论者在剖析吴晗的思想倾向时，总是各执一端。有的认为他乐于享受“高官厚禄”；有的认为他想当学者、教授，当官是被迫无奈而为之的。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有点简单化。吴晗本意确实想

当学者，一心一意研究历史。但既然工作需要，他所信赖的共产党让他当官，他也是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的。那么，吴晗为什么会出现多次辞官的现象呢？下面我想就吴晗的几次辞官和几次要求单纯当学者的情况进行一些分析：

吴晗为什么辞官

吴晗当副市长开始确实是服从大局，才接受周恩来的劝告的，当官并不是他的本意。1949年11月，吴晗应邀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纪念活动。途中他听到自己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消息，立即给周恩来总理打了一个电报，要求不当北京市副市长，想“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这倒不是吴晗的谦虚，早在西南联大搞民主运动时，他就和闻一多约定：“等到民主政治实现，便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作。”他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他说：“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有办法了，我们自认为可以功成身退了，天下事不与我相干了，可以退回书房，随心所欲去钻牛角尖，翻古书，自得其乐了。”这是他为自己绘画的“自得其乐”的前景。因此，1948年在石家庄见到毛主席时，他特地申明“不想当官”。北平解放时，他回到清华大学，任军管会副代表、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职务虽多，但仍可以和研究史学以及和教育工作挂上钩，而且仍住在学校里，和他原来的设想没有太大差别。

现在，这个副市长职位打乱了吴晗对前程的思路，然而木已成舟，更改也难。吴晗回国以后，周总理亲自找他谈话，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到革命工作的需要，从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到巩固政权的需要，说明不能功成身退，革命不能半途而废。从大局出发，从周恩来的关心和帮助出发，吴晗必须顾全大局，服从革命的需要。他的“副市长”职务是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上任的。

对此，吴晗也说他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思想通了，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他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亲自给吴晗做工作，对吴晗是一种殊荣，思想

通不通,他已无回旋余地,只有“愉快”接受党交给他的工作。

吴晗是个尽职尽责的干部,他既然答应当副市长,就应当把副市长的工作做好。他工作很努力,从不“偷懒”;但工作总不如意,思想并不愉快。首先,当了副市长,每天都得到市里上班。市领导和同事都劝他从清华大学搬到城里住,他总是左推右推迟迟不搬,担心自己离教育事业、离历史研究越来越远。他工作了一年,总感到“手忙脚乱,心虚胆怯”,工作“不知从何下手”。于是,吴晗就以“能力薄弱”和“知识的缺乏”为由,恳切地给彭真、聂荣臻写了一封信,要求辞官,信中说:“经过一年的学习,长期的考虑,我向你们提出请求掉换工作岗位,准许回到教育工作岗位上去。”从这封信的内容看,吴晗还是没有完全适应当副市长的工作,心里还迷恋着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市委领导自然不会同意吴晗的请求,亲自找吴晗进行“恳谈”,希望他“留任”。吴晗最终也只能服从市委领导的意见,继续留任;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由于吴晗是党外人士参政,他总感到组织上对他照顾多、严格要求少。这是吴晗最受不了的一个思想疙瘩,也是他后来再提出辞官的原因。

1956年3月,吴晗在郊区养病期间,又给彭真、张友渔写了一封长信,明确提出“今后的工作,我希望能重作安排。市代表大会,下次议程将要选举市人委,我恳求不要列名”。“现在我提出撤除市人委和民盟的工作,请予以考虑。”吴晗再次要求让他去“钻故纸堆”,即研究历史。他说:“在故纸堆里做些研究工作,我向你们保证,一定可以做出对下一代有贡献的成绩来。”他对当学者的向往十分强烈,辞官绝不是虚设之词。不过,这也绝不是唯一的辞官理由,更主要的还是对工作现状不满,埋怨自己的工作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原因之一,如因材施教方针的提出,中教部、教育局怎么提的,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在当时提出因材施教的方针,师资条件是不具备的。吴晗认为,他作为一个管教育的副市长,竟不了解方针提出的根据,这怎么能够做好工作。原因之一二,他认为是机构庞大头,上有中宣部、教育部、二办,市里有市长、副市长,区里有区委、教育科,谁都可以发号施令。吴晗认为这样庞大的机

构,裁减他一个副市长,只会有好处。这两个原因都是体制使然,并不是吴晗的主观意志能够克服的。

1954年,他在给彭真的一封信中,也流露出对工作不尽人意的地方,他写道:“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地是忙乱。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住重心。”“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用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的,哪些是做错了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做对了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的,为什么错,如何改正。”这些当然也是他一再提出辞官的原因。和吴晗工作相处过的人,都知道吴晗十分敬业,事必躬亲,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但他希望工作有人布置,任务有人验收,对和错有人指点。因为是民主党派参政,和中共党内的干部不一样。党内干部有党组织直接监督,有人进行考核;而参政干部往往受到尊重,生活上受到关心。吴晗不习惯人家把他当外人,当客人,更不喜欢对他特殊优待。正如他在信中写到的,他说:“生活被照顾到无以复加”,而工作上“有奖无惩”。

有一次,和吴晗一起进餐的党内干部外出开会,只有吴晗一人用餐,行政人员就给吴晗减了菜。后来一起用餐的薛子正副市长知道此事,认为这样做有厚此薄彼之嫌,就向彭真汇报此事。彭真认为吴晗在清华兼职工作较忙,生活上更要多照顾他,随即将此事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作了汇报。几天后,毛主席亲自约刘仁、张友渔和吴晗到中南海去谈。毛主席问了吴晗的工作情况,问他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鼓励他要大胆工作、安心工作。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一语道破天机,他在一个小型的会议上问张友渔关于吴晗的吃饭问题,并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重视做好党外民主人士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好,生活上也要照顾好,一定要使他有职有权。”有职无权是参政干部最不愿意正视的现实。

还有一件事,即1959年吴晗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近一年来,吴晗生活不如以前充裕,往年购买公债都是一千元,这次只买了五百元;把自费订阅的书报杂志也减订了一部分。主要是夫人袁震生病、看病、住院、买药,特别是进口药很贵。吴晗是行政六级,工资300多元,收入不算少,但发工资时扣药费、扣出差费后只剩下90多元,入

不敷出。吴晗身边的工作人员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决定给吴晗一次性补助500元,吴晗没有接受。但领导上非常关心此事,专门对他的生活进行研究,规定了袁震看病住院的报销办法。

所有这些吴晗都很领情,也很感激。但吴晗是个硬骨头,他绝不会被困难压垮,更不会因为少吃一点菜而有什么想法。因为减少一点菜,竟然惊动了市委领导,惊动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甚至会使吴晗过意不去,感到不自在。

吴晗辞官,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长期隐伏在心坎里的心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1948年到石家庄时,就向毛泽东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给吴晗的一封信中,表示“同意”吴晗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大约也就是毛泽东谈到的这个“时机”问题,吴晗在副市长任上曾多次申请入党,都没有得到批准。对此,吴晗很苦恼,但他没有灰心。他在1954年给彭真的一封信中说:“因为我不能参加党,党对我是客气的,优容的。”吴晗认为这种“客气”和“优容”对自己简直就是个伤害。他希望入党,和大家一样为党工作,只希望严格要求,不希望“客气”和“优容”。他在信中恳切地写道:“我没有放弃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能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这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肺腑心声。他虔诚地要求入党,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的入党动机很明确,一是得到教育,二是做好工作。他认为对他的客气和优容、无微不至地关怀、工作要求不严格,都是因为自己不是党员造成的。长期没有批准他入党也是他不安心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者和官员的变数

吴晗是个学者、历史学家,这是众所公认的,包括毛泽东也是更多地把吴晗当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来看待的;但出于政治的需要,有时也把吴当成官员当成政治人物看待。学者和官员之间是有变数的。

1954年,毛泽东考虑到宋人司马光主编的

《资治通鉴》应该有个较好的标点本,以便于干部阅读,而清人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也应当改绘。这两项工作都很重要,谁能担当起这个任务?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吴晗,并亲自把这任务交给吴晗。此时吴晗在毛泽东眼里当然是个学者。这两项工作在首都学术界的支持和配合下,在吴晗的主持下,按质按量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此外,毛泽东关心的一些历史问题,包括对朱元璋的评价,历史上的边界等等,以及其他一些毛泽东有兴趣的历史问题,也经常找吴晗晤谈。

1959年4月,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对剧中出现的南包公海瑞大加赞赏。随后,他的秘书胡乔木根据主席讲话精神找到吴晗,约吴晗写有关海瑞的文章。胡乔木之所以找吴晗写文章,自然是因为吴晗是个明史专家。由此引发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都属于明史范畴,是学术性的著作。

而当毛泽东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必须找到一个能把矛头直指彭真、刘少奇的突破口,吴晗是首选人物。这样一来,原先约写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以及《海瑞罢官》就都由学术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成为大毒草。此时,吴晗成了被揪出来的“官”,彭真也成了包庇吴晗的“黑帮”。很明显,只有拿吴晗这个副市长开刀才能联系到邓拓,才能联系到彭真。他们都同属北京市的“官”,可以上纲到“黑帮”、“反党集团”。设若吴晗只是个学者,不是个官,没有同属这个官的组织系统,至少用不着毛主席亲自出面指挥组织批判吴晗的文章,亲自宣布《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此时就把吴晗学者的属性剥得精光,变成一个“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可怕政治人物了;但这并不是历史的真相。所以,1965年12月22日,毛泽东对彭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真不以为然,据理力争,他对毛泽东说,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毛泽东和彭真的争论,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没有“罢官”这个要害。这时毛泽东已听进了康生等人关于《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的说法,当然听不进彭真的说法,但对吴晗的官位还是很在乎的,据说当时毛泽东曾对彭真说: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

在要罢吴晗的官时,此时他还想给吴晗保留一点官位。不过这也是说说而已,如果真让吴晗去当县长,那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们都还记得,当吴晗读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有两个反映,一是姚文是“有来头的”。这个“来头”对吴晗的威胁较姚文本身要严重得多。在这个威胁面前,吴晗无力招架,只有任凭宰割。二是姚文过于牵强附会,所引材料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如果从学术角度看,吴晗完全可以写文章驳倒他,但姚文昭示的吴晗的问题是政治而不是学术,是从政治上置吴晗于死地,而不是讨论《海瑞罢官》之学术得失。不过,吴晗的政治悲剧就自身来说,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

吴晗似不太明白,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形成的历程并不一样。吴晗专长是明史研究,经他在探索中形成的观点,往往是学术研究的结晶,自不会轻易放弃和改变的;而政治是非观则不同,政治是非观往往是受别人或周围环境变异而形成的,本身充满着许多变数,盲目坚持或放弃都可能导致失误。例如,他在和国民党统治者进行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或者叫做判断是非的标准,那就是:“凡是共产党作的一定是有好的事,国民党干的一定是坏事。”这个观点的形成,对吴晗正面负面的影响都很大。正面影响,就是吴晗义无反顾地支持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在北平的反饥饿反内战中,等一批进步青年转送到根据地去,他的住宅成了地下党人的联络站,而他自己也被列入敌人追捕的黑名单中,到处躲避敌人的追捕。这些斗争,使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革命事业的坚强战士。而负面影响,就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思想,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任职期间,对党和毛泽东所犯的一些过错,误认为这些都是共产党做的事,都是正确的。如对反右派、“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他都误认为都是对的,而且积极参与其中。这虽是迷信和盲从造成的,但犯这种错误的起因却是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片面认识所致。这种错误认识,使吴晗从思想上到政治上造成许多失误,甚至局部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

“难于改变”的学术见解

如果说吴晗不想当官,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还可以有许多解读,但说吴晗是个学者却是顺理成章,他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比如,对朱元璋的评价,年轻的时候,读明史就对朱元璋有个不太好的看法,他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认为朱元璋晚年得了“老人狂病”。后来写《朱元璋传》,几个版本都能找到这个思路的痕迹。毛泽东读了吴晗两次呈送的《朱元璋传》稿本之后,第一次批评吴晗“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所据当是指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对朱元璋的评价贬之有过。吴晗虽然对毛泽东的批评十分重视,但也只接受诸如有关彭和尚的归宿问题,并以此考证结果向毛泽东的批评作出交代。关于是否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吴晗并无所谈及。后来,毛泽东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的1954年稿本后,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晚年应该写得好点。”吴晗为更好地解读毛泽东的批评,自知理论水平欠缺,曾花大力气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特别是毛泽东著作。但如何吸收、消化并运用到修改《朱元璋传》中去,仍不得要领。他在搜集、分析、研究史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而对朱元璋的历史评价几乎是依然故我。

当然,吴晗并不是故意怠慢毛泽东的批评,而是他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符合毛泽东意见的思路,以为写历史重在史料,只要史料充分,论从史出就可以了。吴晗并不知道政治家和学者对同一学术问题的评价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政治家的评价的标准和出发点是要考虑对现实的得失和影响,而学者的标准主要是史料的准确性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性。这个不同的标准,铸成吴晗沿着自己的学术见解越走越远,而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却理解不到点子上去,未能作出正面交代。

毛泽东要吴晗对朱元璋的晚年写得好一点,吴晗却跳不出原来对朱元璋的评价的框框。他在学生时代写《胡惟庸党案考》时,就认为朱元璋是“一个十足自私惨刻的怪杰”,“疑心”过重,“赋性猜嫌”,“深恐遭知识分子所讥刺”。朱元璋“礼贤下士”是“装”出来的,及至大事已定,就“屡兴文字狱”。吴晗认为朱元璋“设学兴教”,实际上是“进用宋讷一流刻薄寡恩的教师”,造就出一批听

命唯谨的新知识分子出来，作皇帝个人的驯仆。及至吴晗准备写《明太祖》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给朱元璋定位。根据朱元璋诛杀功臣、搞特务网、兴文字狱等等表现，他认为朱元璋是得了“老人狂病”。这个发现，成了吴晗对朱元璋评价的基调。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要他放弃或改变这些早已形成的观点是不容易的。当然，他也不会想到把如何评价朱元璋和现实中的某些个人联系起来，因为过去已经有过教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曾经以写朱元璋影射蒋介石，造成史著不科学，使自己对其著作十分厌恶。上世纪五十年代重新修改《朱元璋传》时，他只能力求客观地评价，该肯定的、该否定的，都按自己思路来评述。从下面事实也可说明吴晗并没有真正接受毛泽东对《朱元璋传》的批评。

在 1965 年版即新版对《朱元璋传》的最后画龙点睛地对朱元璋的历史功过进行了评价之后，特地罗列了朱元璋的五条罪状：一是说朱元璋逐步变质，叛变了农民革命，反过来镇压农民革命的“罪恶”。二是说朱元璋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残酷的刑罚，大量地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三是说朱元璋定下的皇明祖训束缚、限制

了此后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四是说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五是说他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许多荒诞的神迹，欺骗、毒害人民。

显然，吴晗是想尽量对朱元璋评价客观些，褒贬都比较鲜明、突出；但五条负面评价分量还是很重的，其内容基本上还是按朱元璋犯“老人狂病”的思路来写的。你看，大量屠杀功臣、大兴文字狱、大搞特务网、限制政治上的任何革新，压制新思想，大肆宣扬荒诞神迹，欺骗毒害人民。这些显然不是一般过错，简直是罪过。朱元璋晚年，疑心很重，对谁都怀疑，对谁都不信任。然而，仅是不信任也无所谓，不用他就是了。但朱元璋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先不信任，继之就罗织罪名，再继之就是大开杀戒。凡是被怀疑的，不管有没有证据，一概诛杀，造成了历史上开国皇帝大诛功臣的历史惨剧。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都是有历史根据的，就史论史。吴晗本着一个历史学家尊重史料、尊重史实来写历史，保留了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对待历史的态度。

（责任编辑 萧 徐）

按需出版

2004 年我公司在国内率先与出版社合作开展按需出版业务。5 年来引领行业潮流，已为 300 多位国内作者出版了学术专著、回忆录、游记、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也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华人作者出版了著作赠送亲属友人。精美的按需出版图书深受广大作者欢迎，成为品味高雅的礼物和更有价值的纪念。

按需出版是新的数码出版方式，具备四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难题。(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投入过多印数过多造成浪费。(4)出版周期短，一般在 1—2 个月。重印在 1—2 周。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老辈遗作；书法、绘画、照片、奖状复制；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集、画册；单位或个人旧书翻新重印；单位少量用书。

印数：100 册以下最合适。

继续征稿（50 本起印）

资金投入：自费。以 50 本（大 32 开）为例，基本费用 200 页 2000 元，300 页 2800 元。如需加增录入排版、装帧设计制作，则共为 4000~4500 元上下（含 2 页彩插）。具体价格视稿件形式、种类、字数情况确定。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需符合我国出版法规。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作者享有著作权。

正文纸张：70 克胶版纸（黑白）、128 克进口铜板纸（彩色）。印刷质量：上乘。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 1 号楼 1509 号，邮编：100192，热线：13521531088 陶女士。

电子信箱（Email）：173736757@qq.com

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外地邮寄。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李叔同与《太平洋报》

● 张 悅

李叔同作为文化艺术的全才，在他出家之前，从事报纸的编辑事业也为人们留下了诸多值得记载的业绩，其中尤以他在《太平洋报》的经历为最。

开创文艺副刊新生面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刚从日本归国不久的李叔同兴奋不已。1912年春，他参加了柳亚子等创办的“南社”，并成为《太平洋报》的画报主编。在《太平洋报》任编辑期间，他与柳亚子、苏曼殊、高天梅、叶楚伧等交往密切，并在《太平洋报》供职时期，又创造了一项中国的第一，即以崭新的漫画式的表现手法开创报纸广告艺术画的新局面。早在19世纪，中国的报纸也有广告画，但均为固定的，商业气息浓厚的图案，而李叔同首先在《太平洋报》上自己绘作，并以漫画式创作手法艺术性地发布广告，开创了中国报纸广告形式的新局面。

在《太平洋报》社供职时期，李叔同与文艺界人士广泛交往。这其中又有两位特别值得一提。一是陈师曾（原名陈衡恪），号槐堂、朽道人，江西修水人，早年留学日本。他以园林小景、写意花鸟和风俗人物见长，著作有《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染苍室印存》及《北京风俗图》等。李叔同与陈师曾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已相识。他们在日本一起参加过文艺团体“淡白会”。李叔同在1912年4、5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太平洋报》上连续发表了陈师曾的十多幅作品，使陈师曾在全国造成了很大艺术影响。漫画家丰子恺在《我的漫画》一文中也说：“我小时候，《太平洋报》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寥寥数笔，余趣无穷，给我很深的印象。”陈师曾于1912年5月曾赴上海，李叔同在《太平洋报》

上还特意作了报道，同时又在5月初八日刊出陈师曾大幅半身照片，曰“朽道人像”。现存有一首李叔同的《题陈师曾荷花小幅》，小序曰：“师曾画荷花，昔藏余家。癸丑之秋，以贻德泉先生同学。今再展玩，为缀小词。时余将入山坐禅，慧业云云，以美荷花，亦以是自劭也。丙辰寒露。”词云：“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后来李叔同在杭州出家，出家前，他曾将一包篆刻作品交杭州的西泠印社封藏在社内的石壁之中。这些印章大多是友人的作品，其中也有一些是由陈师曾所作。

李叔同在《太平洋报》时期还与苏曼殊有过交往。《太平洋报》同人孤芳在《忆弘一法师》一文中说：在《太平洋报》里有两位出色的画家，一是当时已作了和尚的苏曼殊，再一个就是未来的和尚李叔同。这两位画家的为人与画风各有特色，也十分令人感慨。苏曼殊画山水，其取材多古寺闲僧或荒江孤舟，颇具一种萧瑟孤僻的意味，这与他当时那种“浪漫和尚”、“怪僧”的性情极不相符。而李叔同呢？他性格清淡、稳重，但所绘之作，用笔雄健遒劲，也与其性情不符。

柳亚子在《苏曼殊研究》有一段情节。柳亚子是这么写的：“在1927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紫罗兰杂志》第二号上，有顾悼秋的《雪蠟上人轶事》，记画《汾堤吊梦图》，及在盛泽郑氏著书两事，此两事均不甚密合。《汾堤吊梦图》的事情，大概是如此：太平洋报社的广告主任是李息霜，住报社三楼，有一房间，布置甚精，息霜善画，画具都完备；有一天楚伧不知如何趁息霜不在报社时，把曼殊骗到此房间内，关了门画成此画。但未必是完全硬骗，盖楚伧索曼殊画，曼殊恒以无静室及画具为辞，楚伧引彼至此房间内，一切都完备，且言，如嫌外人闯入，可以关门，于是曼殊无所藉口，不能不画了。”关于此事，叶楚伧也有诗序记录，叶楚伧的

诗及小序写道：“余访午梦堂旧址后，归抵海上，曼殊适自日本来。余于《太平洋》楼上，供养糖果，扃置一室，乃为余画《汾堤吊梦图》。及今展观，无异玮宝。”诗曰：“池上人寻午梦，画中月照孤坟。难得和尚谢客，坐残一个黄昏。”这幅《汾堤吊梦图》被李叔同发表在《太平洋报》上，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叔同自己的一幅用隶书笔意写成的英文《莎士比亚墓志》，时人称这两件艺术作品为“双绝”。苏曼殊也写小说，其中《断鸿零雁记》最享盛誉。李叔同又负责把这部小说连载在《太平洋报》上，并配有陈师曾为之而作的几幅插图。作为李叔同、苏曼殊的共同好友，柳亚子认为：“以方外而列入南社籍者，……逃释归儒之曼殊，与逃儒归释之弘一。”如今人们说李叔同、苏曼殊为“南社二僧”，其源头可能即来之于柳亚子的评说。《太平洋报》虽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但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终于1912年秋停刊。不久，李叔同来到杭州的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担任艺术教师。6年后，即1918年夏李叔同出家。他出家之年也正是苏曼殊逝世之年。后人为了纪念苏曼殊和弘一大师，分别在杭州孤山北麓、虎跑后山建立了“曼殊大师之塔”和“弘一大师之塔”。二塔隔着西湖遥遥相对，让人生出无限的遐想。

热心支持文学教育

李叔同的好友杨白民在上海创办城东文学，并办有一份颇有社会影响的校刊《女学生》。该刊于1910年创办，由杨白民亲自任编辑。

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就与城东文学的刊物有了接触。1907年农历二月十日，李叔同在东京致函杨白民：“谨启：屡承惠学报，课暇披阅，至为忻慰，敬谢敬谢！嘱写之件，月内当寄奉左右。匆匆。白民先生 弟袁顿首 中二月十日”信中所指“学报”，当指城东文学的某种刊物。因未指明刊名，具体为哪份刊物不详。但在他留学回国前，就已经在



李叔同

《女学生》上发表文章。在1910年4月《女学生》的创刊号上有李叔同《艺术谈(一)》；1911年4月在《女学生》上发表的《艺术谈(二)》；1911年7月又在《女学生》上发表了《艺术谈(三)》。这些文章，应该是专为城东文学的学生而写的。同样是在《女学生》的第3期上，还刊登了李叔同的一篇题为《释美术》的文章，并注“来函”。文章再次以详尽的事例阐述了“美术”与“手工”的区别。

1912年春夏，李叔同任职于《太平洋报》后，他也在报上对于城东文学有了更多的关注。李叔同在《太平洋报》创刊的第一天(1912年4月1日)就在副刊

“文艺消息”栏中发表了新闻稿《城东文学制作品》：“南市竹行弄城东文学，杨白民先生独力创办。其学科成绩卓然，占上海女学第一位置。即所作各种美术品，亦精妙古雅，冠绝侪辈。如刺绣之琴联、屏条等，尤为学界同人所称许。又城东讲习会会员诸女士，工书法者极多。所书之对联匾额，悬列四壁，每为专门家所赞赏云。”1912年4月16日，李叔同又在《太平洋报》上刊出《孟俊女士书法》。以上二文，一则将城东文学的学科成绩列上海女学的第一位；一则将孟女士的书法视为中国新生代的绝佳代表。实可谓推崇之极。

李叔同曾在城东文学任文学课，他居然也把学生的作文选刊在《太平洋报》副刊上。1912年4月8日至5月17日，他先后选刊了城东文学学生的作文，又加了他自己的评语。他说：“南市城东文学讲习会员皆于国文深造有得……”又说：“城东文学讲习会开办仅数月，成效斐然可观。校长杨白民君，热心教育，于此可见一斑云。”1912年4月25日，他在报上发表《城东文学国文之一斑》，按语说：“城东文学国文屡介绍于本报，昨又以数篇见示。持论奇警，说理精激，是真能发挥城东特色者。”5月17日，《太平洋报》再次刊出《城东文学国文一斑》，并刊出长诗一首。李叔同在《太平洋报》上刊出城东文学的消息还很多，诸如《平明会》《城东文学第十次游艺大会之先声》《城东文学书

画研究成果展览会》等。李叔同也为城东文学刊登招生广告，又登出《城东文学制品出张部的广告》。

可以想见，如果李叔同继续在上海办报，他必将会一直以全力支持杨白民的办学，并给予城东文学以巨大的助益。另一方面，城东文学也以李叔同为荣。《民国日报》在1918年7月18日（即李叔同即将出家之时）报道过城东文学的音乐会，写道：“南市竹行弄城东文学于阴历本月二十七、八、

九三日开音乐会。兹探悉，内有演奏乐器，如西洋音乐大家比都文、哈特、克莱孟脱等所著之《沙那梯尔》《沙那太》《罗思毒》等名曲，均经音乐家李叔同先生选世界名曲，编撰歌词。并有胡朴安先生编歌、刘质平先生制谱，未演惨剧《亡国恨》，中述朝鲜亡国痛苦，言文歌词，慷慨激昂，纯以乐歌为主云。”可见，李叔同与城东文学的关系实非一般。

（责任编辑 萧徐）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问史求信集	阎长贵王广宇著	58.00	8.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著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思	28.00	6.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揭秘	杨天石	60.00	8.00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雷颐	29.80	7.00
王明传	戴茂林	38.00	7.00
党史札记未编	龚育之	32.00	7.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苗采青等	59.80	9.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国史札记	林蕴辉	40.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著 何怀宏译	20.00	5.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6.00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傅国涌	30.00	6.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煌	21.00	5.00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闫健编	35.0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锐	18.00	5.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28.00	7.00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代购代邮

《苏共亡党十年祭》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深刻剖析了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文章针砭时弊，“实话实说”，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

《潜规则》一本伟大的普及读物。作者对历史准确的剖析，为我们打开了中国传统历史真实游戏规则的密码。

购《潜规则》或《血酬定律》的读者均可获得作者签名。

《问史求信集》这是一部由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阎长贵、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合著的问信文革史研究著作，书中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回忆和记录下来，供读者参考和研究。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一场突破禁区与僵化的思想解放运动，身处核心地带、参与和直面大讨论的亲历者，以第一手资料回顾 30 年前的讨论内幕。

《走出个人崇拜》神化领袖，搞个人崇拜，先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浮现，并泛滥成灾，如苏联 30 年代——50 年代兴起的个人崇拜，导致肃反扩大化灾难。中国 60 年代——70 年代个人崇拜的狂潮伴随文革悲剧的发生。作者对昔日政坛上的领袖们，以人生的视角做出新的考察和反思……

《直言》尝忆 50 年代，为鼓励放胆直言，毛泽东多次谈及，共产党员应有六不怕：不怕扣机会主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六者除头颅犹在，其余皆已身历。自谓因祸得福，筋骨耐劳，心志耐苦，世事洞明，胆气犹壮。今年 80 有余，回首平生，行止无愧天地，得失从不萦怀，素与“左”倾无缘，足以自慰矣！来日无多，请问尚有何眷恋？关怀莫过后来者，忆旧休忘左祸殃，但愿一言堂永绝，神州遍地百花香。

——李锐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是一部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书，但不同于个人回忆录，书中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作者将了解的情况如实写出来，留给今人和后人探讨。

彭德怀对“高彭联盟”的申诉

● 林蕴晖

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因上书毛泽东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这一冤案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得到平反。但是，彭德怀与1955年被定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关系却一直未得到澄清（有关“高，饶反党集团”的来龙去脉，请见拙作《国史札记——事件篇》2008年8月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谈到“高，饶问题”时说，高岗“有四个大区的支持”（指东北是高岗自己，华东有饶漱石，中南有林彪，西北有彭德怀），这就暗含着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活动得到了彭德怀的支持。当然，这个说法的第一人并不是邓小平。事情要追溯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当时，毛泽东在批彭德怀时，就曾说：“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形成这个集团的时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间，1951至1953年三年形成的。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287—288页）此后，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不能为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平反时更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

众所周知，1962年6月，彭德怀为了对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种种罪名进行辩诬，曾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上送了一份长达82000字的申诉书（后被称为“八万言书”，“翻案书”），内容分为五个部分：“关于庐山会议问题”；“关于高饶联盟问题”；“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我的历史



1947年3月 彭德怀司令员在延安保卫边区动员会上讲话

过程及其几个问题”；“关于军事路线问题”。1993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传》的第681页中说：“这封长信，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分内容已于1981年12月整理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披露。”而正是这个涉及“高彭联盟”甚至是“彭高联盟”的部分未予收入。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将彭德怀“八万言书”中关于他与高岗交往的过程摘抄于后：

第一次是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进行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高岗以中共中央军委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高级干部会议，会后，高岗在与彭谈话时，突然把话题转到彭真在东北犯错误的事，紧接着说彭真“是接受了少奇同志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幻想国民党不会进攻，以后国民党进攻了，又幻想抵抗一下就会和平，这就完全陷入被动”。彭回应说：“少奇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论‘和平民主新阶段’讲过了一点份，有时也有一点偏。”

第二次是1952年4月底在沈阳，高岗向彭“说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是如何接待他的，又说斯大林怎么拉他看电影，还说‘斯大林是不喜欢刘(指少奇同志)的，同时对周(指周恩来同志)的不积极抗美援朝也是不喜欢的。’我说，那就不是事实，谁喜欢谁关系不大，只要中国人民喜欢就行。高又说，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事务主义，政治路线不明确，对于抗美援朝这样大的事情没有个全面计划，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切事务都是被动的，毛主席也不喜欢他。我说，周公这个人，吃得少做得多，耐劳耐怨，平易近人，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有广泛的人事关系。至于工作上有事务主义，是他的缺点。高又说：‘斯大林要撤彭德怀的职。’我说：‘这可能是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没有打好的原故吧。我现在很疲劳，撤销我志愿军的职务休息一下也好。’”

第三次是“1952年夏天，我在北京医院割瘤子出院以后，就住到中南海了。当时中央书记处有人提出要我当参谋总长(可能是周恩来同志提的)，我当时拒绝了这个工作。……因此我向主席提议让高岗来当参谋总长。同时也提出邓小平同志，因为他同军队内的联系比较多些。当时主席是称赞了邓小平同志，并说因工作情况抽不出来。……当时主席问我：‘高岗这个人就没有缺点吗？’我说，高岗就是对犯过错误的同志视恶如仇，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狭隘性。”

第四次，“大概在1953年9月4日左右……高岗来我处，谈了些财经会议的经过。他说：‘过去财政问题上有许多错误，对薄一波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斗争。可是他坐在那里好像满不在乎，看来对人民没有什么感情。’我说对于财经工作我们现在的经验还很少，还需要相当时间才能把经验积累起来。高又问我对财经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我说：‘没有摸过，外行。’”

第五次，“在1953年12月里(大概时间)，军委准备开一次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军委准备的报告草案，在主席处进行了讨论。在讨论时，高岗说这个报告草案没有思想性。主席当时指示‘以彭为主，请高加以修改。’我当时表示以高为主(高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我参加。最后主席又重复说：‘还是以彭为主吧。’”大约过了三天时间，彭到了高岗家里，准备看一看修改的

怎么样了。高说还没有看，“接着高又把小桌上放的是什么文件给我介绍了一下。其中有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华北土地工作会议讲话和少奇同志在延安作的‘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记录等。他问我看过这些文件没有？我说，没有看过，现在的文件实在太多了。但是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我听某某同志提起过，‘有点偏’。高接着说，是呀！偏到资本家那边去了。他又说让我看看这些文件。我说，现在没有时间看。”

“可是，第二天高岗带着秘书到了我的住处。他一进门就说‘对报告草案没有多少修改，今天谈了以后再修改。’……他在这里又提起少奇同志来，他说：‘刘少奇这个摊派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刘澜涛安在华北，某某某安在华东，林枫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而代之。’我当时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我说，少奇同志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的。我当时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那是1937年，我和少奇同志由临汾回延安开会，在运城兵站住了一晚。当时少奇同志给我介绍了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及工作能力，那次对我印象极深。高又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我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他又举少奇同志的讲话来作例子说，‘军队干部在战争时期是要坐第一排的，现在是和平民主新阶段时期，就要让别人坐第一排了，难道这也是对的吗？’我插话说有些老干部当时听了很不舒服，其实那是打譬喻说的。高抢着说：‘这不是走火，也不是譬喻打的不好，而是有意打击老干部。刘的讲话是影响了华北和东北的工作，松懈了战争准备。’我说，你有机会时，可以在书记处把你的这些意见说一说，或者个别向主席谈一谈。高说，还不是时候，只要自己心里有个底就行了。我当时对高岗的这些话也产生点怀疑，但是当时没有向他提出来，事后又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这是严重错误。高岗又提到了中央决定增补中央候补委员，说军队方面大概

是五个人，并问我哪些同志合适？又说某某和某某看来是可以的。我说某某可以考虑，但是具体名单须同军委副主席们商量后再报给中央吧。”

接着，彭德怀讲述了他与高岗发生的一次争执。彭写道：

1953年12月，正在召开军队系统的高干会议期间，我参加了由主席在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少奇同志首先提出：“主席外出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并提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周恩来同志再三推辞。高岗赞成“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朱德同志也说“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我第五个发言，当时我很激动，心里想：就是轮流的话，轮到你朱总司令或高岗时，就敢肯定不出问题吗？所以我当时说：我不赞成日常工作轮流主持，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主席当时说：“怎么样？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当时少奇同志仍在推辞。我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什么推辞的呢？最后，少奇同志同意自己来主持了。

第二天晚饭后，高岗来到我处，他的脸色很难看，似乎在生气。他先问了问高干会议的情况，然后就转到了昨天在主席处开会的上面来，他说：“你昨天为什么赞成由刘少奇代理，而不同意我的意见呢（或者说是由他代理，而我没听清楚）？”他说这话的时候，看来是责问我的样子。我当时就冒火了，突然说：“这是我个人的认识！”他见当时没有什么便宜可得，也气势汹汹地走了。我当时想，这次得罪了他，以后不会再来了，不来拉倒！因为我素有一个不怕得罪人的坏习惯。

彭德怀检讨自己对高岗攻击刘少奇的一些不寻常的言语，没有及时“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基于上述，彭德怀对“高彭联盟”，“彭高联盟”的说法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认为与事实不符。他以沉痛的心情向中央申明：

以上我同高岗来往的经过和谈话，是抱着以对党忠实的态度来回忆和写出来的，自问是真实的，可以作为中央对这个问题分析的参考。再者，揭露高饶反党联盟的是陈云同志，他可能了解其中底细，因此陈云同志是最好的见证人。邓小平

同志是第一个到我处谈高饶联盟问题的（关于邓小平找彭谈话的情况，彭德怀回忆说，在高干会议结束前一两天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来到我处，即提出了高饶反党联盟问题，问我的看法怎样？我当时就把高岗近来的大概情况如实告诉了邓小平同志。），看我当时是否将高岗的言论和行动向邓小平同志作了如实反映的？而且在高饶反党联盟未被揭露以前，主席外出时，我就反对书记处工作轮流主持，而同意少奇同志主持，这也可以说我究竟同高岗有什么关系，事情也比较明白。

笔者所以引用如此多的文字，目的是要还彭德怀这位从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功勋卓著，一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共和国元帅一个政治上的清白。弄清这一历史事实，也向人们表明中共历史上的党内斗争，教训多多。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6期目录

书屋讲坛	全球视野中的“外部性”和普世道德问题	陈彩虹
口述历史	出世的精神 入世的文学 ——马悦然教授访谈录	万之 整理
流年碎影	“活得比你还好” ——世纪老人曹任远印象	述 强
	名士轶事四则	裴毅然
	悼念约翰·霍普·富兰克林	刘绪贻
裁书刀下	对陈漱渝《不可尽信的回忆录》的鉴别	罗 飞
说长论短	只有“民主”才配称“万岁” ——驳几种贬低民主、反对民主的论点	吴 戈
	理念 VS 威权——颜回去卫之一	王 蒙
书屋品茗	读《上学记》有感——从姚从吾想到冯友兰 《顾颉刚日记》中的钱钟书	桑 叶
	叶公超批废名	张 霖
域外传真	“路西法效应”与“耶路撒冷审判”	陈建军
灯下随笔	砖石有声 古雅深沉 ——谈谈汤玛士·雅可比关于中国的作品	赵 刚
	关于“孩子的教育”	王 杰
	凝视整个天宇的芳心	韩一宇
	为了中文的明天，中国应叫停英语热	涂 昕
	香港的《字花》与文学的可能	毛 翰
思史佚篇	清末民初社会和平转型	张春田
	重寻“五四”	傅国涌
	图书馆与知识分子	林贤治
		王 昊

邮发代号 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 6.00 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五十年代历史学家的命运

王维江

随着毛泽东(1893—1976)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对逝者的纪念和对苦难的追忆才成为可能。文学是政治的晴雨表:五十年代的毛泽东利用文学——批电影《武训传》和批俞平伯(1900—1990)及其《红楼梦研究》——作为发动更大规模政治运动的试探,七十年代末的反思和批评文革的小说——刘心武(1947—)的《班主任》和卢新华(1954—)的《伤痕》——则成为开拓新时代的先锋。

历史学家的反思虽显得迟缓而谨慎,但持久而深入。1982年,纪念著名历史学家陈垣(1880—1971)先生的《励耕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注1}面世,这是对逝去已久的史学大师的怀念和致敬,也是史学界记忆和反省时代到来。建国前的陈教授长期任教于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建国十年(1959)之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五十年代大学者思想转变的“一个典型”。^{注2}主动由党外学者变为党内学者,这一转身,无论对其本人还是对其同辈来说,都不是一件小事。此时首先选择他来追思,当不是偶然。

三年后,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1903—1987)先生出版自传《韧的追求》,^{注3}而推动该书出版的是在国家出版局工作的包遵信(1937—2007)先生。同一时期,包先生正紧张编辑着那套后来轰动学术界的《走向未来丛书》。这说明,历史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治伤疗痛,它还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只有敢于“向后看”——真实回顾,才能真正“向前看”。^{注4}时至今日,尽管对五十年代的一系列运动史的研究还存在难度,但一大批亲历者所写的回忆录,正在夯实着这一研究的基础;一些那个时代的施虐者,如陈伯达(1904—1989)、徐景贤(1933—2007)、吴法宪

(1915—2004)等,也留下了为自己辩解的文字。这些动机各异、内容庞杂的资料,使今天的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渐渐成为可能。本文尝试以回忆录为史料,以历史学家为考察对象,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

“征服者”党内史家

在1949年之前,学术只是政治工具。党内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首先不是被看作是学者,而是“革命家和战士”。^{注5}文艺界的周扬(1908—1989)如此,哲学界的艾思奇(1910—1966)如此,文学和历史两栖的郭沫若(1892—1978)也是如此。他们的学术实践,首先要为革命理论的建构服务。明显一例是四十年代延安时期,毛泽东构思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涉及到对中国历史社会形态的判断,由此也引起党内学者的激烈争辩,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胜负:

一九四二年,我在与郭沫若辩论屈原思想时,无意间说过一句冒失话,表示要奉陪西周封建论者辩论到底。言语中流露出浮躁情绪,……伯赞是十分坦白的人,他气得简直要跳起来,一度不断地挖苦我。……抗战时期,我们在重庆的一班朋友们就知道毛主席是主张西周封建论的,知道延安理论界、学术界的见解也以西周封建论为主流。^{注6}

此为侯外庐先生晚年的回忆。文中提到的两个人——郭沫若和翦伯赞(1898—1968),都是自二十年代就加入中共的“革命家和战士”式的学者。他们赞成毛泽东的西周封建说,那是懂政治和讲政治的表现,^{注7}而不赞成这一说的侯外庐

和范文澜(1893—1969),则显得太书呆子气,尽管后者的革命资历和理论修养在党内更胜一筹。当时和建国后各人的政治地位,明显是由其政治态度和水平所决定的。学术只是一袭华美的袍,即使上面爬满了虱子,也没人敢指出,只能私下议论。1950年1月5日,时任出版总署编译局第一处处长的宋云彬在私函中痛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和时任文化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兼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

给剑行信。最近《进步青年》刊载他的作品,前日送来稿费六万五千元。信中奖励他一番,谓郭沫若、茅盾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其实亦非过奖。近来茅盾写作每况愈下,几不堪入目。郭亦一味浮滑,不成东西。^{注8}

有趣的是,无论是作为批评者的宋云彬,还是作为被批评者的郭、茅,其经历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是二十年代的老资格党员,后来与党失去联系,1949年初皆以著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身份厕身于新政协。他们为什么对学术的看法如此不同呢?或许原因在于,宋与党失去联系之后,变成真正的民主人士;郭、茅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来就没跟党见外过。换句话说,郭、茅已是党的学术的化身,而宋只是被统战的对象。

作品变得“不成东西”,并不能证明江郎才尽,反而烘托出作者高人一筹的政治“才情”。宋云彬毕竟是书生,1957年获赠一顶右派帽子,不算意外。郭沫若的政治面貌变得比马列还马列,恐怕并非出于信服和坚持,而是看准风向,定向投报。1950年3月《光明日报》副刊《学术》版载文,称殷代墓中有奴隶殉葬,致郭“大怒”,直斥对方“不懂马列主义”。^{注9}郭沫若本具谦和的脾性,公开场合如此厉色,自然有其政治用意。这种用意,不用说挑战郭沫若的学术界无名小卒不知就里,哪怕如党内大儒侯外庐也常懵懵懂懂。1953年,他与毛泽东秘书、党内理论权威陈伯达有如下一段谈话:

一次,他找我谈话,记得胡绳同志也在场(当时任中宣部秘书长),话题中心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他先要我谈看法,我知道他主张西周封建论,和我的观点分歧甚大。……没有等我稍作说

明,他就听不下去了。……陈摇头道:“你说秦始皇不属于封建帝王吗?”这几乎是用课问小学生的方式要我回答复杂的学术问题,实在恼人,于是我干脆回答:“不属于。”他听了哈哈大笑,接着说:“你走得太远了!”^{注10}

“你走得太远了!”——这里的“远”,当然是指侯外庐距离毛泽东的观点越来越远,而陈伯达提醒侯外庐走得太远,显然是指其政治不正确的危险性,而不是学术观点上的错误。陈伯达四十年代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他当然知道毛泽东的想法。所以,党内史学家的政治地位和官职,不是由其学问大小决定的,而是由其政治水平决定的。这就不奇怪,一个学术界的大人物——郭沫若、一个党内的大秀才——陈伯达,同时都是毛泽东“西周封建论”的坚定赞成者!这更不奇怪,在建国以后,郭沫若会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界的领袖,陈伯达会成为党内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

与此相适应的是两人的官职:郭、陈分别担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同时,郭沫若还担任历史研究所一所的所长,陈伯达兼任马列学院副院长和《红旗》杂志总编辑。历史所三所的所长是范文澜,他是延安时期帮助毛泽东完成了很多重要文章的历史学家。侯外庐担任了二所的副所长,成为非党员、著名史学家陈垣的副手。如果侯外庐和范文澜不太书呆子气,他们的政治仕途和学术职位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学术领域如此,主管学术的宣传部的科学卫生处,^{注11}其领导人也都是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如胡绳(1918—2000)、于光远(1915—)。^{注12}可见,建国后能够坐在学术领导岗位上的,都是经过了长期历史考验的党的人,不仅政治上可靠,而且学术上也能积极紧跟毛泽东,这是他们始终处在中心位置并拥有学术上绝对话语权的首要条件。

统战对象 党外史家

正如在政治上中共有坚定可靠的盟友一样,在学术界,中共也有一大批朋友。建国以后,党内学者占据了政治和学术的中心位置,党外学者该如何安置呢?毛泽东是构筑统一战线的高手,手

法飘逸灵活,也令人琢磨不透,对待同一个统战对象,他可以动用的手段方式,别人无法模仿,也不允许模仿。毛泽东与章士钊(1881—1973)的交往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毛主席对章士钊好,并不意味着党内其他人也可以像他一样。当时在中南海工作的一位干部,过去曾是章士钊的学生,他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信中对章推崇备致,章士钊看了很高兴,就拿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对这位党内干部写的这封信却很不高兴,后来就把这位干部调出了中南海。^{注 13}

毛泽东的这种行事风格,不仅给党内干部和学者造成压力,而且也让被统战的对象心理紧张。除了像陈寅恪(1890—1969)这样的史学大师对政治可以无动于衷之外,党外绝大多数的学者们,与党内学者一样,同样面临着重新认识和适应形势的问题。不能认识和适应者,会很难受,甚至自毁政治前途:

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每谈必多感慨,恨无辞以慰荐之也。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注 14}

“亚老”为柳亚子(1887—1958),1945 年重庆谈判期间,他成为“毛润之老友”。作为新政协的座上宾,看过无数政治风云的亚老既“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实在耐人寻味:为何而“兴奋”?为何而“牢骚”?政权在握,当然有“征服者”的“兴奋”,然一旦发现不被人当做自家人,自然又“牢骚满腹”。心情不好,还会拿弱者来撒气:

同赴北京饭店,开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常委,晤衡老、泽老、映老、初老、伯钧、卓儒、家驹、志远、辰伯、志超(辛)、光旦等十余人。余提议开除梁漱溟,决议由秘书处撰文申斥,并声明断绝关系,差强人意。^{注 15}

此时的党外学者,更像 1949 年之前热衷进取的政客,这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谁也不甘遭受冷落,因为建国前他们本来就不是纯学院式的教授。在政权更迭之际,他们不能忘怀自己的“革命历史”,由此更在乎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不是一

句文人好面子可以了结的:

王造时来信,哀恳提名新政协,言辞凄婉,谓我与衡老二十年交谊,且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国会参加新政协,有何面目见人。^{注 16}

如果说张申府(1893—1986)的“大病”,并不在于“革命先进”而背“沉重之包袱”,病因实在于 1948 年的《呼吁和平》一文;那么,王造时的“心病”则类似于柳亚子。既然作为民主人士已经拥有辉煌的资本,1949 年后,就是该将资本兑换现金时候了。一大批曾经亲炙过西方政治理论的英美海归在新政协前后的表现,与本土学者毫无二致,这是为什么?恐怕还在于这时的党外学者太热衷于政治上的进取,轻视了学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和学术独立性。

只有对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认可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被欣赏的人物,才有可能避免被边缘化。这样的人,不一定有民主党派的背景,只要他是著名的学问家,就行。如此,他才能够被安置到教育、学术机构的高位上,甚至与党内的学术领导平起平坐。陈垣先生不仅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同时被任命为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他被重用的秘密,就在于他政治上的睿智。北平是 1949 年 1 月解放的,三个月之后,陈垣就发表了致胡适(1891—1962)的公开信:

胡适是他的老友,也是他学术上“直谅多闻”的诤友。胡适离开北平南下的前夕,还写信同他讨论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的问题,并说“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陈垣在信中表明,今后要“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并说:“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注 17}

陈垣真是懂政治的高手,对新中国的政治形势有着清醒而超前的估计,他知道胡适在中共心目中的位置和象征意义,他也料到胡适迟早会被清算。五年后的那场人人过关式的批判胡适运动,让胡适的许多留在大陆的学生和朋友——如俞平伯(1900—1990)和顾颉刚(1893—1980)——遭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学术困难,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预见。作为胡适亲密朋友却安然无恙,就在于陈垣对政治形势的把握,他从一开始就表示完全接受新的意识形态,并愿意用这套新

的意识形态指导自己今后的学术研究。毛泽东看中的,正是陈垣身段一放到底的态度以及这一态度所具有的强烈示范效果,一大批的非党员学者诚心诚意地走上了陈垣所示范的道路: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注18}

(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阅《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此为苏联建国史最标准之教本,简要精当,得未曾有。^{注19}

解放前一年,在报刊杂志上写了些国际评论性文章。当时侈谈中立外交。解放后一看,觉得愚蠢无比,全都付之一炬。点把火,比较轻而易举,去掉旧的思想意识,则不那么简单了。不过,“一炬”总算弃旧图新的象征吧。^{注20}

正因为没有“革命先进”的资本,也就没有患得患失的“包袱”,真诚接受思想改造,这正是新政权所希望看到的结果。而这些书呆子的真诚,无意中倒是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相应地,也保持住一定的学术独立性和尊严,由此他们获居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安全的中间地带。从这个角度讲,陈垣是识时务者,而陈寅恪则太刚性。本来这个所长职位是留给陈寅恪的,但他对马克思史观的不屑一顾,不仅使他的学术研究步履艰难,而且也铸成个人生活的悲剧。陈垣的学生、著名书法家启功(1912—2005)对此深有感触:

近现代史学界有“南北二陈”的美誉。对那一位陈老先生我也是非常尊敬和钦佩的。但现在有些人评价他时,故意渲染他怎么坚持不过问政治,不参加政治理论学习,不介入党派等,好像他的伟大不在他的学问,而在特立独行、超脱政治。而对陈老校长则不同了,因为他解放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殊不知陈校长加入了共产党完全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他身为辅仁大学和师范大学合并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只有在党内他才能更直接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地对北京师范大学负责,这种良苦之心是多么难得啊!^{注21}

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现象还不算严重。从历史学领域来看,在党内史学大家们占据了领导位置之后,党外史家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就在中国科学院历史一、二、三所成立之后,大批党外著名史家也被调入,如燕京大学

出身、留美归来的翁独健(1906—1986)先生,如国内传统史学方法培养出的著名学者蒙文通(1894—1968)先生,还有胡适的学生顾颉刚、甚至汪伪时期任过伪职的著名史家谢国桢(1901—1982),其他非中共党员的白寿彝(1909—2000)、韩国磐(1919—2003)、唐长孺(1911—1994)和谭其骧(1911—1992)等先生,都被调入中国科学院。“白寿彝和翁独健两位还一度担任历史所研究室的主任。”^{注22}

当然,能够不被边缘化的前提,进而突围靠近权力场,除了对新的意识形态的认同,还要在具体工作中像工人农民那样,服从上级领导,陈寅恪的学生、留美归来的周一良(1913—2001)先生就迅速而彻底地完成了思想转变:

我当时思想,就是怕分配到图书条件差的边远地区,无法从事研究。经过学习、讨论、检查,终于树立起服从需要、任何地方任何工作都是革命的思想。这样想通以后,我坚决信奉不变,始终如一。实际上指导了我以后几十年的行动:服从需要,不讲价钱,作驯服工具。^{注23}

周先生进入新北大之后,还担任了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周先生的幸运,显然与北京大学有关。像北大和中国科学院这样的学术机构还能够容纳一流的学者,其他高等院校的领导就难得有这样的雅量,比如,周一良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校友王钟翰(1913—2007)就远不是那么幸运:

50年代,我的第一部结集《清代杂考》得以出版面世。自此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客观、主观方面的特殊原因,二十年内,我从未发表过一篇文章。^{注24}

王钟翰以为,建国以后他的不幸遭遇,与他从北大被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有关,而这一调动之所以会发生,在于他政治上的中立消极:早在30年代,大学校园内的中共地下党员曾与他有过接触,他虽然讨厌国民党,但也不想加入共产党;1949年后,民盟的缔造者之一、著名的张东荪(1886—1973)教授又想拉他加入民盟,他又拒绝。建国后的他学术上才刚刚起步,他实在也不具备被统战的政治价值。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的到来,他因言辞不慎被打成右派,就不仅是被边缘化了,而是整个失去了在政治和学术上的位置。不幸的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难以避免这

一命运。

“弃妇”脱党的史家们

对于一个长期在白色恐怖中生存的党而言，叛徒是党的最大的威胁，因而受到的惩罚也最沉重。在战争年代，一些学者或信仰发生改变，或与组织无法再度取得联系，这些因各种原因脱党的学者被边缘化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党外学者。

最有名的例子大概属于张申府。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张国焘（1897—1979）、周恩来（1898—1976）和朱德（1886—1976）都是他领入党内的，可是他本人却在1924年退出了共产党。1942年他加入民盟，1948年中共在军事战场上高歌猛进的时候，他却著文《呼吁和平》。建国以后，他不仅政治上，而且也在学术上彻底边缘化了。他早年的学生赵俪生（1917—2007）先生对此有相当沉重的体会：

张申府经常都是政治性的，这是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他总是被吸引到时事中去，总是想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向历史负责。他也总是倾向中共这一边，即使他不是中共党员时也是如此。他不像梁漱溟，他没有一个遗世独立的头脑。^{注25}

这是1987年，71岁的赵俪生在美国访问时与舒衡哲访谈时说的话。在他看来，尽管从思想上、感情上张申府都站在中共一边，但仍然无法得到原谅。原因很简单，党不能原谅一个先是退党、后又帮着国民党说过话的人。饶有趣味的是，赵俪生引用了汉朝的一首叫《弃妇》的诗，来形容张申府与中共的关系：

死亦无别语 愿葬君家土

倘化断肠花 犹得生君家^{注26}

赵俪生用这首诗来形容张申府对中共的态度，或许也是用来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状况。他用来形容其老师张申府的词——“弃妇”，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呢！这位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拒绝在组织上加入中共，却也“总是倾向于中共这一边”，并在抗战时期参加到中共队伍中。1939年因病赴西安治疗与党失去联系。虽然他很幸运地在解放战争时期邂逅清华老同学、此时已在军管会任职的陈其五，从而得以重返革命队伍，并进入培训干部的华北大学，结识了学校的

领导范文澜、艾思奇，教授刘大年（1915—1999）、何干之（1906—1969），还得以担任艾思奇的副手。但是，离开了党的这段经历，使得他难以重新获得信任。一次偶然的顶撞领导，就让他永远失去了进入学术界权力中心的机会：

有一天，讨论到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并办理登记的问题。有人主张，不管年龄老少，全要亲自前来报到。于是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注27}

成仿吾（1897—1984）是郭沫若创造社时期的战友，一位激越的革命家。在胜利者即将接管旧世界的时刻，赵俪生竟然当众指责成仿吾“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三天之后，他就被调离华北大学，发往山东，赵俪生当时的感受是——“我被开除了。”^{注28}这里的“开除”寓意复杂，他是觉得自己被开除出“无产阶级”的队伍了。

感到自己是“弃妇”的，还有著名诗人、美术史教授常任侠（1904—1996）。这位大学者虽然没有加入中共，但在抗战时期已是中共的密友。不幸的是，他在1945年赴印度担任国际大学的教授，1949年回国之后，他的老朋友郭沫若、吴晗（1909—1969）、徐悲鸿（1895—1953）、田汉（1898—1968）都已身居学术艺术界的高职，他感到自己被冷落了。当获悉自己只是被聘为专任教授而没有官职时，他在日记中记道：“贫农又变为雇农矣。”^{注29}如果说失落的仅仅是学术界的官位，那倒也不难化解，因为常任侠骨子里还是学者，更难挨的是政治上的不信任，反复地被要求听取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辅导报告，那无疑是在反复提醒他，你已是一个新时代的落伍者！不仅思想上，而且组织上落伍，而双重的落伍者，连被统战的资格也没有，剩下的，只能是去做向隅而泣的“弃妇”。

注1 陈垣：《励耕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该书于1987年再版。

注2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8页，北

京三联书店 1995 年。

注 3 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 1985 年。

注 4 学术界的“向后看”,与中央的“向前看”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反差。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题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正显示了政治人物对待历史(尤其是文革)的不同态度。——展望未来!

注 5 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收在《〈阎王殿〉旧事》,第 1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注 6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 139 页。

注 7 郭沫若不用说了,即使是较为单纯的翦伯赞,在三十年代就已放弃了学者的独立思考精神。参见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第 5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注 8 宋云彬《红尘冷眼》,第 171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宋先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加入中共,后与党失去联系,建国后以著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身份受邀参加政协会议。

注 9 同上,第 186 页。

注 10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 252 页。

注 11 将“科学”与“卫生”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处”,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划分,所以到 1954 年,“卫生”从“科学”中分离出去,主管学术的称之为“科学处”。

注 12 龚育之《胡绳琐忆》,收在《〈阎王殿〉旧事》,第 146 页。

注 13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 111 页,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7 年。

注 14 宋云彬《红尘冷眼》,第 115 页。

注 15 柳无忌、柳无非编《自传、年谱、日记》,第 34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注 16 宋云彬《红尘冷眼》,第 144 页。“衡老”,即沈钧儒(1875-1963),号衡山。“七君子”之一。

注 17 陈智超《陈垣先生传记》,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求真务实五十载》,第 65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注 18 《杨翼骧先生学术系年》,刊在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 464 页,中华书局 2002 年。

注 19 金毓黻《静悟室日记》,九,卷 151,第 6888 页,辽沈书社 1993 年。

注 20 《杨生茂自述》,刊在杨生茂《探径集》,第 354 页,中华书局 2002 年。

注 21 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第 104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注 22 林甘泉《五十年的回忆和思考》,收在《求真务实五十载》,第 2 页。

注 23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 46 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注 24 王钟翰《清心集》,第 94 页,新世界出版社 2002 年。

注 25 (美)舒衡哲(Vára Schulz)著、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第 184 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 年。

注 26 同上。

注 27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第 13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注 28 同上,第 138 页。

注 29 沈宁整理《春城纪事 1949-1952》,第 44 页,大象出版社 2006 年。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萧徐)



《观察》的身价

——售价、稿费、发行量及其他

● 李 钧

引子 通货的气球到底能膨胀到多大？

既然生活在“地球村”,就不能不关注“村”里的事。08年大事不少,但最让我触目惊心的却是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其官方2008年7月公布的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2000000%,货币的纸面价值已经大大低于纸的价值;无奈之下,津巴布韦于7月21日发行单张面额1000亿津元的钞票。但1000亿津元还不够买一个面包或支付一天的公交车费。所以一些津巴布韦人士要求发行面额更高的钞票。有报道称,黑市上1美元可兑换8亿津元。我深深祈愿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能降温,因为这实在不是“笑谈”——那里的人民一定到了不能聊生的地步。

1000 亿元该是世界上面额最大的钞票了吧？不！这个世界纪录要归匈牙利，这个国家在 1946 年 6 月 3 日发行过面额为 1,000,000,000,000,000,000,000 帕戈 (100 quintillion, 10 的 21 次方, 十万万亿) 的钞票。排在第二位的是前南斯拉夫曾发行过五千亿“戴纳”的钞票。这样说来，津巴布韦的千亿元面钞只能排在第三位。

至于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则发生在一战后的德国。1923年德国的纸币马克流通量达到 496×10^6 的18次方，价格指数由1922年1月的100上升到1923年11月的 10^{13} 的13次方(十万亿)。从1922年1月到1924年12月，德国货币和物价都以惊人的比率上升。例如，一份报纸的价格从1921年1月的0.3马克上升到1922年5月的1马克、1922年10月的8马克、1923年2月的100马克、1923年9月的1000马克、10月1日的2000马克、10月15日的12万马克、10月29日的100万马克、11月9日的

500 万马克、11 月 17 日的 7000 万马克。在 1923 年底，200000000(两亿)马克只够买一个面包。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每月上升 2500%。工人们的工资一天要分两次支付，到了傍晚，一只面包的价格等于早上一幢房屋的价值……这该是何等惶恐的日子呀！

中国虽然没有创造这样的“世界之最”,但相关数据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中国面额最大的钞票是一张面值六十亿元的纸币,那是1949年5月10日由国民政府的新疆省银行发行的……关于中国在1946-1949年的通货膨胀,坊间有着种种的传说,比如扛一麻袋金元券去理发等等。但作为一个研究者,不能以此为据。恰好,储安平主编的《观察》自1946年9月1日创刊,至1948年12月被查禁,大体上处于这一时期,它的身价:售价、稿费、发行量及其他关于经济危机的文字,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的经济是如何全面崩盘的——这似乎也是一个王朝之所以灭亡的重要注脚吧。

《观察》“售价”两年飙升 1800 倍

《观察》是1940年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刊物，上接三十年代的《新月》，下启五十年代台湾的《自由中国》，使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得以传承；是分析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标本。

《观察》由储安平主编,创刊于1946年9月1日(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创刊号每份售价500元。由于由“全国第一流学者教授专家六十余人执笔”,又由于抱着“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观察”办刊宗旨,文章观点犀利,涉及政治、经济、时事、文化、文学艺术诸领域,不啻为中国社会的风向标,因而深受读者喜爱。但是物价飞涨、经济危机却构成了强大压力。至1948年8月第

四卷第二十三、二十四合刊时，售价已涨至350000元。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后，售价又在半年里飞涨20倍。最终因违禁而在1948年12月24日停刊，算下来，两年零四个月时间里，售价飞涨了1800倍。以下表格可以看出其售价飞涨的速度：

时间	期号	售价(元)
1946.9.1	第一卷第一期	500
1946.10.26	第一卷第九期	600
1946.12.28	第一卷第十八期	800
1947.2.8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1000
1947.3.1	第二卷第一期	1500
1947.5.31	第二卷第十四期	2000
1947.7.5	第二卷第十九期	3000
1947.9.27	第三卷第五期	4000 注
1947.10.18	第三卷第八期	5000
1947.12.13	第三卷第十六期	6000
1947.12.27	第三卷第十八期	8000
1948.1.10	第三卷第二十期	9000
1948.1.17	第三卷第二十一期	10000
1948.1.24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12000
1948.2.7	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20000
1948.2.28	第四卷第一期	15000
1848.3.13	第四卷第三期	25000
1948.4.3	第四卷第六期	30000
1948.5.8	第四卷第十一期	40000
1948.6.12	第四卷第十六期	50000
1948.6.26	第四卷第十八期	70000
1948.7.3	第四卷第十九期	80000
1948.7.17	第四卷第二十期	150000
1948.7.31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200000
1948.8.7	第四卷第二十三、四期	350000
1948.8.28	第五卷第一期	一角五分(金元券)
1948.11.6	第五卷第十一期	五角
1948.11.13	第五卷第十二期	二元五角
1948.12.11	第五卷第十六期	三元

注：第二卷二十四期因内容增加而暂时调至过4000元。

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0.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抛去已贬值的部分，换算一下就可以得出，《观察》第五卷第一期的售价折合旧法币是450,000元，而第五卷十六期时折合成旧法币至少是9000,000元法币，也就是说，其“售价”是初创刊时售价的1800倍。

其实，《观察》在1948年冬停刊，还没有赶上金元券贬值最严重的时候。据历史研究，自金元券发行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0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解放前

夕，上海银元一元可换金元券16亿，各地纷纷拒用，遂以银元代替流通。如果《观察》不停刊，其售价将会飚升到一个何等地步呢？！

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封，同人被捕，出版第五卷第十八期后停刊。其实此前储安平已预感到《观察》有被查封的危险，他在第四卷第二十期(1948.7.17)发表的《政府利刃 指向〈观察〉》一文中指出：南京《新民报》已被“永久停刊”，政府不久即会指向《观察》及“真理社”这样的自由主义团体与报刊的。

《观察》1949年11月1日复刊，编辑部迁至北京，改为半月刊，开始了它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次复刊是自1949年5月起就开始运筹谋划的。由于蒋介石政权的败局已定，加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因而储安平对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政权深感钦佩。储安平向中共提出复刊请求，经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促成，周恩来批示，《观察》终于在北京重新面世。复刊后的《观察》的售价在半年里一度增至初始价的六倍，但随即回落。这从一方面表现出新政权对物价的稳定措施已初见成效。

时间	期号	售价(人民币/元)
1949.11.1	第六卷第一期	500
1949.12.1	第六卷第三期	1000
1950.1.1	第六卷第五期	1200
1950.2.1	第六卷第七期	1500
1950.2.16	第六卷第八期	2000
1950.3.16	第六卷第十期	3000
1950.5.1	第六卷第十三期	2500

但是此时的《观察》从作者到文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复刊号“本社同人”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写道：“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大流氓，一意孤行，逞强作乱，撕毁政协，迫害民主。他只顾他一己的权势，无视国家的前途，纵容他的皇亲国舅，家奴党棍，到处搜刮，吸吮民脂，对于人民苦痛，漠无所动，还要昧尽天良，舔着美帝的屁股，残杀本国的人民，使人切齿痛恨。”这种革命话语恐怕绝非出自储安平之手。《观察》第六卷第二期(1949.11.16)开始增设“社论”，这一期上的社论是《师法十月革命的原则性——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联合国大会上的斗争》等，让人觉得它已变成了一份“革命刊物”。另外，这一期上还有费孝通的《知识分子与

《政治学习》等文章,已初露“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先声。果然,第六卷第六期(1950.1.16)就有了焦孟甫的《论知识分子的改造》和费孝通的《什么叫搞通了思想》等文章。不仅如此,早在第六卷第四期(1949.12.16)就开设了“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专栏”,刊有社论《斯大林教导了我们》,另有编辑部文章《斯大林的生平》、郭沫若的诗歌《我向你高呼万岁》。郭沫若的诗写到:“斯大林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此时的《观察》已不再是“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观察”,而变成了新政权的一面战旗,一面战鼓,一只号角。至1950年5月16日,《观察》出至第六卷第十四期,在封二上发表“改组声明”:“《观察》出版至本期止,即告结束。此后本社同人将加入新组织的《新观察》半月刊工作。”

《观察》的稿费及印张的增减

《观察》的稿费在三年里有过十余次提高,单从数额上看,共提高了近百倍。其中的主要原因绝非杂志高盈利的回报,不过是物价飞涨而随行就市罢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危机。但是,其稿费的提高速率却远远低于其售价的提高速率。

时间	期号	稿费(千字/元)
1946.9.14	第一卷第三期	政论稿酬由千字4000元提高到千字8000元
1947.10.11	第三卷第七期	第九次提高,千字60,000至80,000元
1947.11.22	第三卷十三期	稿费将提高到千字80,000至100,000元
1947.12.27	第三卷十八期	稿费将提高到千字100,000至120,000元
1948.3.13	第四卷第三期	稿费提高到千字200,000至300,000元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稿酬了吧!可叹的是,这些稿酬连能否让作者借以糊口都谈不上,更难以作为“幸福生活”的参考指数。

面对困难,《观察》可以说做到了处心积虑、精打细算。一方面是开源。杂志广告渐少,就只有再提高售价。另一方面是节流。比如第三卷第十七期(1947.12.20)的“编者报告”说,投稿者若要求退稿,则必须随稿附回寄信封及邮票;另外希望定户能寄还信袋,以便再利用。于此同时,杂志停止赠阅以减少开支;原来执行的“文到即付”稿费支付法也暂停……可见其运营资金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为了缩减开支,《观察》还通过减少印张来维持。实际上,《观察》自创刊起,纸张质量就远不如《新月》那样精美。但是套红、彩印、制图等技术的运用还是显示了十余年间印刷技术的进步。但是为了节约开支,《观察》不得不将其印张由24页压至20页(第三卷第十八期,1947.12.27),再减到16页(第四卷第二十期,1948.7.17)、12页(第四卷第二十一期,1948.7.31)的最低印张——还不及其最盛时期的一半印张。在《观察》采取的措施中,还包括取消套色彩印,大量减少图片,以缩减制版费;及至最后阶段,杂志不得不取消了精印的封面(第五卷第九期,1948.10.23),印刷用纸降低为粗糙的再生纸,纸张上时有残存的字迹隐现……如果有人曾浏览过民国时期的报刊,就会发现,只有在抗战最严峻的1940年前后王平陵主编的《文艺月刊》中曾使用过类似劣等的纸张。

《观察》对于经济危机的文字记载

处于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观察》自然会多有抨击之声。

首先是读者来信反映了平民的抱怨。《观察》第三卷第十一期(1947.11.18)载读者来信《白报纸的浪费》,说“双十节”各报出特刊,卖不完的报纸“便卖给收旧报纸的人,拿去作为包花生米等用。听说一张整张而不破碎的旧报纸,即值四五百元。”一张报纸的“废品收购价”达到这样高的程度,足见其货币贬值的程度。第三卷第十四期(1947.11.29)载北平读者赵质君来信说:他在王府井一皮货商店里,见一贵妇人以七亿五千万元购买一貂皮大衣,开出三张支票。而赵质君的月薪刚上调至一百五十万元。要想买此大衣,不吃不喝也要四十一年零八个月才能凑足。感叹严寒袭来,穷人衣何在?第三卷第二十三期(1948.1.24)刊登《观察文摘》,其中有陆志韦的《今年的起码希望》,称当时的棒子面一万块钱一斤……从中不难看出民生的艰难。

其实抱怨物价飞涨的不仅是平民和小职员,即使大学教授这样的精英人群,也叫苦不迭。第四卷第四期(1948.3.20)载署名“光·谋”的《读者投书:武大两教授病逝》,文章写道:“编者先生:

武大真不幸,最近连死了两个教授。一个是工学院的刘树桢教授,因为心脏病死于武大医院,临死时家里仅留有二十多万国币,但刘教授家里还留有一妻一儿二女,都是亟待救济的。假如不是武大师生的捐助,恐怕刘教授要光身入土。可怜!可痛!……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在一个正常的国度里,国宝人师,是多么令人尊敬,令人重视呵!可是时至今日,教授死了,如果没有穷学生们的捐助,便会光身入土,这个世界太惨酷了!中国人的心太毒辣了!……唉!这是谁在作孽,谁的罪恶?与上文联系,如果一万国币一斤棒子面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刘树桢教授死时,家里只有二十斤棒子面。随后,武汉大学教授袁昌英在《一颗微妙的心》(《观察》第四卷第七期,1948.4.10)中说:1937年“七七事变”前,一千八百元值一斤二两金子,而到了1948年,一斤二两金子只能买十来捆柴。第四卷第十八期(1948.6.26)又有武汉大学教授刘涤源的《物价狂涨!物价狂涨》一文,第四卷第十九期(1948.7.3)报道各地抢米风潮刮起;第四卷第二十期(1948.7.17)载笪移今的《物价涨风的新阶段》……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情形,恐怕只能说是“怨声载道”啦。

在艰难的时事中,创办一种严肃杂志无疑是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的。《观察》在创刊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创刊号刊发的《我们的志趣和态度》就指出了这种困境:“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动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之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大的读者……”但是,为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他们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充分显示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

令人感佩的是,《观察》不仅坚持下来,而且发行量直线攀升。储安平在《风浪·熬炼·撑住——〈观察〉第三卷报告书》(1948.2.7)中说,

《观察》杂志第一卷的销量是八千份,第二卷是一万六千份,第三卷是二万四千份。《吃重·苦斗·尽心——〈观察〉第四卷报告书》则指出,开支在半年里上涨20倍,售价上涨13倍,但第四卷的销量却由24000份提高到50000份,其中固定的定户有16086名。不仅如此,他们还推出了“观察丛书”,包括: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潘光旦《政治学罪言》、朱自清《论雅俗共赏》、费孝通《乡土建设》和《乡土中国》、塔塔木林《红毛长谈》、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等。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

储安平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办刊的过程中深知胡适那句“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含义,因此他特别注重交往与沟通。但是在强大的经济危机和国忧民瘼面前,储安平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在《观察》第五卷第十一期(1948.11.6)上,发表了著名的《一场烂污》一文,谈到金元券在70天里打了个对折,认为这是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令国人大失所望,他说:“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连最温和的自由知识分子也愤怒起来的时候,这个政权注定要覆灭了。——历史又一次验证了这一点。

《观察》是一面观察历史的镜子

通观《观察》“身价”的外部观察,人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印象:

首先,经济危机是政府塌台的前兆。无论是一战后的德国,还是1949年的国民政府,其通货膨胀都是因为长期的兵燹战乱、穷兵黩武。何况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从未在政治、军事上真正统一过,因此币制也就混乱。40年代末,在解放区流通有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等,国统区有法币、东北流通券与金元券。各地为支付军费开支而无节制地印发纸币,其通货的混乱与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经济危机之中受害最大的是民生。一般来说,当国家处于经济危机时,政府应当通过减免税收、平抑物价、提高就业等措施使人民得以生存,但是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国民政府,根本来不及实施有效措施挽救

民生,相反却漫无休止地增加苛捐杂税,以至坊间戏称“民国万税”,林语堂嘲讽“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余屁无捐”。这也就难怪储安平做出了“一场烂污”的断语。这样的政府不塌台,真是天理不容。

其次,通货膨胀多与战乱有关,而《观察》认为“战争无正义”。《观察》与自由主义一样,适于和平建设,每遇到极权当道或战乱频仍,则无用武之地,正如丁文江所说,自由知识分子往往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观察》恰处于战乱与极权统治之中,其式微与停刊是必然的事,似乎并非最值得可惜的事。不过《观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经典论述,比如关于“战争无正义”的判断,至今值得人们深思。这里不妨援引《观察》主要作者杨人楩《内战论》(《观察》第四卷第四期,1948.3.20)里的一段话:“战争是集体的犯罪,内战尤然。……一、生命的伤害——伤亡、疠疫,与屠杀;二、物质的毁灭;三、经济的崩溃;四、人权遭受蹂躏(贤如林肯,亦曾取消人身权);五、外力的干涉;六、文化衰落;及七、道德堕落。有些史学家认为战争有沟通文化的功用;内战却连这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它是发生在同一文化的民族中。道德堕落是无形的损害,然而也是最足以断丧元气的损害。参加内战的一方,为着要克服其敌人,不免要猜疑、嫉妒、虚伪、欺骗、阴谋,甚至有丧失人性的残暴。处于夹攻中的人民,为着生存不能不降低其道德水准,以期逃过炮火与猜疑的二重威胁。人生态度非流于厌世与玩世,便是投机取巧以苟活,敢于坚持一己的操守而与现实斗争的,定是少数中的少数。内战时期愈久,好人愈不易生存,留下的纵非全是坏人,却可能是些懦夫与乡愿。”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一切战争的确都是人类的内战,而所有内战都不曾解决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战争双方许下的诺言都难以兑现。文章的观点可能值得辩证,但是却符合中国传统的“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思想,值得人们三思。

再次,《观察》停刊的最终原因是国民政府舆论一律、禁止言论自由的极权统治。《观察》中许多文章涉及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对国民政府取缔民盟、镇压大学生干政,对民主选举、教育改革、币制改革等都表现了高度的关注。因为《观

察》是一个揭丑的媒体,所以不能见容于国民政府,当国民党在军事、政治上节节败退的时候,再也不能保留这个装饰性的杂志,直接对这个自由之声进行了封杀。孰不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当国人“道路以目”的时候,也正是火山爆发的时刻。极权统治者以封杀舆论的方式阻遏人民发声,其实这只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因为思想是无法扼杀的,正所谓愚民者自愚,古往今来哪一个推行愚民政策的政府不都在加速自己灭亡?!

第四,中国自由主义存在着“先天不足”。自由主义思想自严复引入,胡适将其发扬光大,罗隆基、储安平接续,乃至雷震在台湾赓续,一直处于战乱与极权统治之下。在既缺乏法律保障、自由经济与和平环境,又处于左右两股势力双向夹击的情形下,自由主义者偏偏左右开弓,导致左右失源;其精英主义性质也使他们缺少群众基础,言之凿凿却回应无声。因而自由主义可谓生不逢时,正如李泽厚所说:“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中国思想史》下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50页。)自由主义运作需要秩序,在无序的国度与岁月里,自由主义是“无根”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用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湮没(下转78页)

“文革”前的中学生思想教育

● 马昌海

“文革”初期的一些中学生,为什么成了政治及人身迫害的一种工具?为什么越过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作家王小波的一位曾任北京市工读学校校长的世伯,“文革”前曾在学校大讲“二十四孝”之“卧冰求鱼”听的学生毛骨悚然。结果在“文革”中,学生们强迫这位校长赤身趴在冰面上,留下了终身病痛。王小波说,这是他“自己吃了自己的屎”。“幸运的是他还未讲过‘割股疗亲’、‘郭巨埋子’,因而幸免于被刀片割肢和活埋”。

年仅14岁,原本没有打人资格的陈凯歌,在从众心态的驱使下,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是“自己人”,为了摆脱孤独的恐惧感,于是打了人。他打的第一个人正是自己在批斗会上的父亲,却博得了众人的喝彩!作家老鬼在其自传体小说中也真诚坦率地描述了自己对家庭、对两个姐姐特别是对其母亲杨沫(《青春之歌》的作者)残忍粗暴的造反行为。这些家庭亲情悲剧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构成了我们民族当代创伤性记忆的一个主题。“文革”的极度政治化将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推向极致,使被整对象的家庭受到深及心灵的政治株连。家庭出身被政治符号化,其对子女的影响作用被放大、固化。当一个家庭的政治标签被无限放大之后,家庭的其它功能也就模糊、淡化了。只要你家里有了政治运动的对象,无论家庭解体与否,你的家庭就会被污名化,其家庭成员、配偶和子女就要被迫与其划清界限。这就意味着要割断家庭成员心灵深处的情感联系,家庭关系完全异化。划清界限的具体标准是:一是要揭发其罪行;二是视之为仇雠,上纲上线批判。在那个愚昧、荒唐、悲惨的年代里,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的亲情悲剧比比皆是。

韦君宜先生说,那些已经成名的知青作家们,

“他们都写出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写出自己十六七岁时,是怎样变成了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成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到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还是不够”(见《黄河》1998年第5期)。一些红卫兵不仅打校长、老师,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还打自己的同学,而且下手十分狠毒。有的红卫兵还专门到各机关、学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住宅区去轮番打人,甚至跑到郊区农村去殴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等“四类分子”。陈凯歌回忆:“这种对人的肉体的直接冲撞、拷打、侮辱、虐待乃至杀害,使我在20年后犹自震惊而且百思不得其解。”当打人和暴行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标志、一种光荣、一种仪式、一种特权的时候,这些打人施暴者从小所受的是一种什么教育,难道还不应该彻底反思吗?

这一代“老三届”(1966年—1968年)中学生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教育成败得失的具体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狂热、偏执、狭隘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并在“文革”中以夸大、扭曲的形式充分表现出来。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当时的教育方针。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化革命化的教育。经过建国以后十几年的实践,这种教育已日渐系统和完备。它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上团课、参观、忆苦思甜、下乡劳动、参加军训等活动形式。还有许多歌唱党和毛主席,赞颂革命和建设的文学、音乐、电影、戏剧、美术等文艺作品。青年学生从小就受到革命和建设者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像英

雄那样的生活，为伟大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青年学生们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政治参与意识。这种教育还特别注重培养青少年的集体主义精神。国家是大集体，青年学生所在的学校、班级，少先队的中队、小队，团支部、团小组，都是小集体。在这种教育下，不仅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甚至个人的爱好兴趣，也要服从于集体的纪律。于是，万事依靠集体、服从集体，唯恐被集体所不容，甚至时时担心被集体所抛弃，就成为这代人至今仍然具有的鲜明特征。

“文革”前青年学生的头脑中普遍存在的“革命崇拜”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涵：①它确定了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②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③鄙视人权、人性和个性自由，个人必须绝对服从整体利益。④颂扬暴力，鄙视温和与妥协。⑤党和毛主席就是革命的象征。⑥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晚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绝对真理。⑦普遍缺乏民主与法制的观念。

“文革”前各类学校的首要任务都是强调政治思想教育的。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也就从文艺界延伸到教育领域。1963年10月，《人民教育》杂志发起了对“母爱教育”的批判，强调要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观念的灌输，指出阶级的爱、革命的爱和对领袖的爱绝对要高于亲情和师生、同学之间的爱，并且把人性爱的教育扭曲成了仇恨教育。一年之后，《人民教育》围绕这次“母爱教育”的讨论发表综述：“同伟大的无产阶级的爱比较起来，母爱只是渺小的，而绝不是什么伟大的。”在这样的一种教育氛围中，十几岁的中学生们开始形成日后红卫兵缺乏人性的情感模式：无情被视为革命的坚定性，野蛮被看作革命者应有的勇敢。当这样一种情感和道德观念形成之后，他们便怀着对革命的渴望和“砸烂旧世界”的豪情壮志，顺理成章地走向了“文革”造反的前列。义和团的农民是因为无知而被清朝皇室所利用，红卫兵则恰恰是因为受了教育而造反。

为什么“文革”初期“出窝黄蜂的第一群是青年学生”？罗点点写的《红色家族档案》（见《当代》1998年第4—5期或南海出版社1999年版）描述

“文革”前对中学生的思想训练，革命理想高于生命价值和个人尊严、高于个人自由及个人权利的人生观教育，使中学生们“像吃错了药一样上瘾”。这本回忆录与《少年凯歌》（陈凯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6）都特别描绘了一些女中学生的凶悍残暴，还有“文革”中的种种扼杀人性、回归兽性的暴行。“文革”使人性中最卑劣、最丑恶的一面恶性膨胀。无情地践踏、摧残人的自尊、良知、诚信、道义等处身立世的原则，甚至以折磨人为乐趣而获得快感。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行径，似乎是从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移植而来，其实还包含了中国特色的“国粹”（流氓无产者习气）。

顾准先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指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成了一种宗教现象。这种现象在“文革”中达到顶峰。一些红卫兵的胡作非为，与这种个人迷信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代人的忠诚实际上是一种盲从，是在缺乏先进观念和相关知识的前提下，丧失了正常的思考和判断力的结果。罗点点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最陌生的情感就是怀疑。”如果当年有人告诉我们，知识分子的灵魂就是独立思考，是怀疑和批判精神，这肯定会被当作大逆不道。推行盲从教育，使每个人忘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这首先是歌颂领袖的绝对正确，同时也是要求人们彻底忘掉和抹杀自我，绝对顺从。这种对党和毛泽东的忠诚和服从以及强烈的集体意识，是这一代青年人满怀崇高的理想主义并满腔热情地投入“文革”，成为冲锋陷阵急先锋的思想政治基础，也是他们而后被大批送往农村插队时，仍然能够听从召唤并服从安排的原因。总之，对于“文革”中红卫兵由于狂热、愚昧而对整个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所造成的严重的不可弥补的损害，“文革”前的17年教育是难辞其咎的。“文革”之初红卫兵的出现并非突然，他们正是“文革”前17年教育的结果，也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这种教育使被教育者存在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使他们将领袖的话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还盲从群体，盲从“形势”，由盲从发展而来的，就是“文革”时的狂热。他们整天高喊着大批判，却缺乏最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对流行的理论和口号缺乏批判精神（少数思想探索者除外），他们所使用的批判标准只是毛主

席语录而不是实践。他们用简单的、一元化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而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他们批判过“不好不坏、浑浑噩噩”的“中间人物”文学理论，在他们的心目中，不是同志，就是敌人，达不到同志这个标准的，即便是他的师长、同学、亲友甚至亲生父母，也是敌人，由此便发展出了他们的偏执。对待坏人坏事，对待一切“封资修”的东西，这种教育只教他们去仇恨、去打倒。于是他们认为：只要是反对敌人，无论怎样残忍都不过分，甚至唯恐自己不够残忍。他们以为不残忍就是对敌人恨得不够，就是缺乏阶级感情的表现，就是对革命和伟大领袖的不忠。

由于先天教育的缺陷，这一代青年人的国学基础薄弱，批判封建主义使他们不懂传统文化，不知道民族精神的家园在何方；他们对西学一知半解，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割断了他们与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联系，使他们难以融入世界文明的海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又割断了他们与世界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使他们只能教条地理解“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语录”，形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民粹主义的道德伦理心态。不懂得人类优秀文化的红卫兵们，怎么可能会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科学的批判怀疑精神？盲从产生的原因是知识和精神的匮乏，这不仅仅是一代人的缺陷。教育本身是具有连续性的，这一代人的缺陷，正是上一代人教育的结果。结果是作为教育者的老师们首先尝到了这种教育的苦果。红卫兵们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捣毁一切与“革命”不相容的文物、书籍，毫不留情地揪斗自己的长辈和老师，批判自己过去亲密的伙伴和同学，却不在意对他人所造成的伤害。他们讳言“爱”字，只能热爱党和毛主席，还有同志之间的阶级友爱，这是绝对高于亲情和友情的。至于同情、怜悯、温存、宽容大度以至有些人所说的“理解万岁”，则一概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属于被人唾弃之列。

从1964年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来看，“接班人”并不是指一般的“革命青年”，而是指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的各级领导干部。有权或有条件搞“一言堂”的也只能是领导干部，普通老百姓恐怕只可能对自己

的子女搞“家长制”，还不一定能奏效。虽然各行各业都有接班的问题，但在“文革”前后的这段时间里，“接班”这两个字却是指政治上的接班，也就是被提拔当干部，这几乎成了一部分人的专利：先进典型可以出自于不同的家庭，而革命接班人却几乎只能从出身于“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的青年中选拔。

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化思想的教育，强调青年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在提出“接班人”教育后达到了高潮，培养接班人的活动与青年学生在“文革”中的思想行为关系极大。它的直接后果是将学生导向了政治目标，并加强了只看家庭出身的“血统论”倾向。它还引发和加剧了学生中的权力意识和激烈竞争，当“革命青年”是没有名额限制的，而“接班人”却只限于极少数出类拔萃之辈。革命青年是一种称号，而“接班人”却是一种政治地位（掌权者）。“老一辈革命家们自信自己已经建立了千年王国，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都不容置疑”。而下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做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放在哪里哪里亮”的驯服工具，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忠于党和毛主席，关心国家大事，富于献身精神，渴望为革命建功立业，不怕流血牺牲，认真负责、积极进取、勤奋好学、吃苦耐劳，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等等，渐渐在一代人（起码是部分人）身上成为了现实，“被铸进了剑身”——这就是许多亲历者所说的，为“文革”做好了准备，在“文革”中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罗点点以其父罗瑞卿所遭受的迫害为例，谴责人世间所有的暴力和恐怖，摈弃鲜血培养的花朵。对毫无忏悔之心的恶人，难道不应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吗？中国人缺少忏悔的因子，当年那些有意无意作恶的人，没有多少出来忏悔。前些年《南方周末》开展以忏悔为主题的征文，只刊登了几篇就终止了。当年的打手、凶手们，有几个能“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呢？罗点点说：“文革中千千万万屈死的人，都只能使用一个没有主语的奇怪字眼——迫害致死。这是人类逃避法律责任最伟大的文字创造。”对当年千百万少不更事的男女红卫兵们无法无天、丧失理智的行为，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再追究其法律责任了，他们也是那

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受害者。但是,作为一个在地球上生存过的人,参与残害虐杀的人生经历终归是一段耻辱,是无法被后来的任何“光辉业绩”所抹杀的,只要有点儿良知,总会感到良心不安。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获得了诺贝尔奖以后,终于还是以某种形式披露了自己早年不光彩的历史。对于他最后的坦白,公众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或谴责其隐瞒太久,或欢迎其良心未泯,或原谅其年少无知,但恐怕没有人会认为那是值得隆重地大肆宣扬的光辉业绩。德国曾出现过祸害人类的法西斯,但德意志民族是有希望的优秀民族,因为其从上到下都具有深刻的自省和忏悔精神,所以才能从灾难的废墟中获得新生。前些年《南方周末》有篇回忆思想解放的先行者遇罗克被害的长篇通讯,提到过一个神秘的关键人物:片警(户籍警察)。陈凯歌的家被查抄是和一个住在同院的同班同学的举报有关,而当年的红卫兵们四处抄家、打人,把人送进北京一中劳改队和北京六中监狱,或遣送回原籍,是谁奉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指示,向不知情的红卫兵们提供了具体而准确的住址和姓名?就是那些未露面的片警!不然红卫兵们怎么会知道这些素不相识的“坏人”?“文革”是亿万中国人的集体作品,其发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再谈谈仇恨教育。我们从小心目中的地主,就是文学作品中的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冯兰池、何大拿、韩老六等(这当然是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典型化形象)。我们从小唱的歌,就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我们下乡插队到了农村,却发现还有另一种地主:有文化、有见识、精明能干、技术活干得好,工分挣得多。南方鱼米之乡的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往往讲的是1959—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多少人,那时的人们把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也归罪于刘少奇了。在旧社会什么人才能成为地主?除了贵族,多数大概是由比较能干的富裕中农和富农发展而来的;还有做官或经商后置了田产的,受到政府奖励的军功地主等等。北京人艺的话剧《狗儿爷涅槃》所演示的是:当地主是封建社会农民最正常的理想,这是由小农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马克思对此早就有过精辟的论述。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指出:对农民欺压最甚的不是地主,而是官僚和官僚制度,所谓“官逼民反”。引起农民造反的主要原因,也不全是所谓田

地都集中到地主手里了。据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统计:全国土地改革前,占农村人口4.75%的地主,占有全部耕地的38.26%,地租率一般为50%左右。农村中的阶级矛盾也不像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普遍地尖锐激化。我在下乡插队时就曾奇怪:一些贫下中农整天与地主富农嘻嘻哈哈,怎么没有一点强烈的阶级仇恨呢?当然,新中国的阶级敌人并不限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叛徒、内奸、特务,还有国际上的帝、修、反,后来又加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正是这种缺乏科学内容的简单的仇恨教育,与忠诚盲从和个人迷信掺合在一起,除了培养出疾恶如仇的品质,“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地冷酷无情”,还驱使红卫兵们满怀深仇大恨,对眼前的“阶级敌人”做出种种惨无人道的行径。在越过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之后,反而获得了以折磨人为乐趣的快感。这些负有“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满怀豪情壮志却不懂得人类优秀文化的青年学生,在“文革”初期就这样成了一批只会进行丑恶地盲目破坏而不会从事新建设的匆匆过客。事实上,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后期,许多人就已深陷于帮派斗争之中,嘴里说的是保卫毛主席,行动上却是在维护山头的利益和个人得失。于是,投机钻营者有之,趋炎附势者有之,卖身投靠者亦有之。更有一些红卫兵组织依旧闹派性、搞武斗、制造事端,还有的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甚至成群结伙打架斗殴。

事实上,红卫兵性格绝不仅仅只是属于那一代青年,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它是整个民族精神缺陷的一种体现。当年不正是父辈兄长的生存方式及处世哲学,才熏陶出一代红卫兵的性格吗?同时,红卫兵性格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作为历史精神的折射,已经成为历史的积淀,它甚至会或多或少地在每个人身上存留,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后人。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忽略这种精神的缺陷,不能让历史的阴影来遮掩我们审视现实的目光。

(参阅:定宜庄《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作者系北京服装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晨)

父亲被“审查”的日子里

• 张刃

1968年3月，在停课近两年之后，我们“升”入了中学。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那年我们应该读初中二年级，第二年毕业，这就是“六九届”的由来。若论文化程度，我们实际上只是读了六年小学。

父亲被“揪出来”了

开学不久，虽然有了文化课，但没学几天，又一次新的运动来临，叫做“一批三查”，重点是清理阶级队伍。这一次，我父亲没有逃脱厄运，我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

我父亲张高峰，曾是《大公报》记者，40年代写过一些有影响的报道，虽然自诩“中间偏左”，却从不为当局所喜。他被“揪出来”，罪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反革命老报棍子”。那年他整50岁。

当大字报从机关贴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大祸临头了，我们的前途也完了！学校收回了我刚刚得到的红卫兵袖章，我也被“清除”出革命队伍了。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绝望。

那天，机关的“造反派”来到我家，搜查我父亲的“罪证”。奶奶当时就吓得坐在那里不能动了（她的一位表嫂，是民国总统冯国璋的女儿，在1966年8月抄家风波中，红卫兵破门而入，老太太竟当场吓死了。事后人们都说她有“福”，没有受更多的罪），我和弟弟默默地看着那些人翻箱倒柜，不时地把一些东西装入袋子。当他们搜查到我的书桌时，不知为什么，我竟说了一句：那是我的东西。他们瞪了我一眼，居然没有采取行动。其实，所谓我的东西，也不过是红宝书、笔记本之类，至多有几本从旧书部买来的破书。我并不怕他们查出什么，只是觉得他们不该来搜查我。事后我有些后怕，倘若那些人蛮横起来，说“老反革命唆使小反革命对抗革命群众”，我一家不是罪上加罪了么？

由于大部分有可能成为罪证的日记、照片、资料两年前就已毁掉，“造反派”的搜查没有多少收

获。连我家仅留存的袖珍英汉字典和日汉词典也被搜走了，大约是想查证我父亲有无里通外国之嫌。

后来才知道，搜查证据只是幌子，查抄我家存款才是目的。住在我家楼下的王姓工友是主谋。他认定我家有钱，父亲没有彻底交待。其实，我家的全部存款是4000元，那是准备给我们几个孩子上大学用的。但在当时，那也是一大笔财产了。

“狗崽子”生活

学校也在“清队”，成立了由骨干红卫兵组成的警卫排，把“表现不好”的“狗崽子”关押起来，每天强迫劳动，并不时与其他学校“交流批斗”。那些“狗崽子”被打得服服帖帖的，受伤了也不敢吭一声。在校园里劳动还好，卖力气就行，押到外校去批斗最痛苦。从出校门开始，就要坐“喷气式”，两臂向后高高扬起，被两个红卫兵左右一手摁肩膀，一手掰手腕，以使头尽可能低下，这样一路走下去，人早已瘫作烂泥了。瘫在地上是不行的，连踢带打还须起来，站不住就跪着，手臂照样高高地后举，头则几乎触地。那滋味可想而知。面对那情景，任何一个“狗崽子”都明白不守“规矩”的后果，都自觉地矮人三分。社会上自杀的人又开始多了起来，成为文革的第二次高峰。我所在的合江路中学距海河只一街之隔，时常被同学喊去看死尸。一天，刚刚吃完早点，还没进教室，我又被叫去了。河滩上躺着一具尸体，皮肤惨白，大约是溺水时间过长，加之气温很高，曝晒之后，尸体鼓胀，有的地方破裂了，往外渗着液体，苍蝇嗡嗡地围着尸体转。俄顷，有一队人来到河边，拿出随身带来的标语，覆盖在尸体上，内容无非是“死有余辜”之类。有人用棍子捅那尸体，我想，这就是所谓“鞭尸”吧？忽听“噗”的一声，尸体被捅破了，恶臭和血水涌了出来，我的胃一阵抽搐，把刚吃的早点全吐了出来。

我们掉头就向学校跑去。

文革的头两年，我看到的死人太多了，淹死的、吊死的、打死的、不知怎么死的，没有一张脸是安详的。有相当一段时间里，我时时感到恐惧，感到血腥，并且常常被噩梦吓醒。

“造反派”继续在经济上下手，宣布停发我父亲的工资，每月按人口发生活费，每人8元。在当时8元是国家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低于8元就要给补助了。以那时的物价计算，按照国家规定的定量，每月要用4元钱买粮食，剩下的4元用于买油、盐、酱、醋、煤球、劈柴，至于添置衣物，就只能靠从这有限的钱里面省下来慢慢积攒了。

改发生活费后，我家经济条件骤然恶化，存款已冻结，只能精打细算了。当时的白面每斤0.185元，而玉米面只有0.1元，我们就尽量少吃白面，以节省每一分钱。蔬菜可以靠捡拾的菜帮、败叶，而肉食则没有白来的，只能少吃或不吃。煤是必须买的，做饭、取暖都离不开。我学会了蒸窝头、揉馒头、擀面条、炸花椒油拌面，当然还有切菜。但我不会做复杂的饭，特别是炒菜。因为当时无菜可炒，也就没学成。家里实在没有钱可花时，就开始变卖衣物。父亲唯一留存的一件狐皮大衣就是在那年冬天送到寄卖行去卖了55元钱，家里过了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春节。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姓王的“造反派”忽然病倒了，肺癌晚期，咽气之前还念念不忘“张高峰还有钱，他没交代。”真不知他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耿耿于怀。可惜他死了，留下孤儿寡母5口人，日子过得挺艰难。待我家日子好一点了，奶奶还常常接济他们。我却不以为然。

看父亲交代“罪行”

那段时间，我看到父亲总是不停地写材料，说累积盈尺绝不夸张，他右手掌边磨出的厚厚老茧就是证明。他所交代的社会关系，就分成共产党方面、国民党方面、海外关系、同学、亲戚等若干部分，所列不下百人。连我看了都觉得复杂，何况造反派。

后来听父亲的同事讲，造反派对我父亲没有施以更多的暴力，除了他记忆力强，能把几十年前的事情，时间、地点、人物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无懈

可击之外，还有一个大家不说的原因，那就是他“交代”复杂的过程像讲故事，谁都爱听，以至淡漠了“敌情”观念。

父亲还把《毛选》中40年代的文章读得烂熟，交代自己的历史时，常常很恰当地引用一段“最高指示”，以表明自己的交代、认识符合毛泽东思想，甚至早在当年就有按毛主席的思想办的意思，只是“不自觉”罢了。这一手很有效，造反派往往无话可说。

父亲写的交代材料我看过至少四种“版本”，文革后他被平反，退回的材料大部分都被他当作废纸处理掉了，我有幸保存了几册，时隔40年，读来也颇有况味。

交代材料不仅要讲述自己的历史，还要同时对自己的言行做出“深刻检查”，而且“上纲上线”，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

譬如，他交代抗战时期在战地救护伤员，向民众教唱抗日歌曲，就要批判自己“为国民党反动派保存了实力”，“为反动政府制造了舆论，毒害了人民群众”。

他交代揭露河南灾情，引发国民党下令《大公报》停刊，自己也被逮捕时，要检查这“实际上是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狗咬狗’的争斗”。

他交代反对内战，痛陈百姓疾苦的报道，要认识自己“敌我不分”，“把革命战争与反动派镇压革命混为一谈”，甚至是“向反动派献计，提醒他们统治不稳”。

他交代解放后商业报道中批评了做假和官商作风，是“暴露了社会主义阴暗面”，“给阶级敌人提供了口实”。

他交代三年困难时期卖掉自行车去自由市场买了若干食品，是“资产阶级活命哲学”，承认自己“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现在看来十分可笑，但当时不这样自轻自贱，就是不老实、不低头，是过不了关的。

影响一生的父子对话

文革中，父亲的问题成了压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我希望能够弄明白一点。于是，我与父亲曾经有过几次认真的对话，虽然断断续续或者类似

聊天,但印象极深,因为它不仅使我了解了书本上不写的历史,而且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

谈话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当年许多青年人都投奔了延安,您为什么跑到南京去了?”

“到延安、去南京都是为了抗日。‘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对全国发表讲话,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一致抗日。红军都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了,是国军的编制,中共也拥戴蒋为领袖。在我的头脑里,国民政府是正统,南京是抗日的中心,所以跑到南京去了。而且,实事求是地说,抗战初期,大部分的日军是由国民党军队抵抗的,许多重大战役都发生在正面战场。那时,共产党的影响还很小,至少以我的觉悟,没有认识到应该去投奔延安。”

“国民党三次逮捕您,都是共产党嫌疑,您真的与中共有联系么?”“我有许多中共的朋友,相交几十年,关系很好。但我确实不是共产党,没有那个觉悟嘛。国民党抓我、审我,我怎么承认?同样,现在说我是国民党,我也确实不是,更不能认账。”

“您写了那么多反对内战的报道,国共双方都不高兴,为什么?”“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不愿意再看到战争。内战爆发后,不仅是国共双方打,日本、苏联都卷在里面。苏联是公开出兵,日军则是被俘后又编进中国军队继续在杀中国人,这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此外,我在东北看到了太多的战争场面,老百姓是真苦啊。我完全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反对内战。现在看,错就错在没有分清正义与反动,以‘中间偏左’的立场片面地反战了。结果,写四平战役得罪了国民党,写长春战役又惹得共产党不高兴。这是我的局限性。但我从来没有反共的意识,我写的所有稿件,也从来没有按国民党的要求使用‘共匪’字样。我的许多朋友就是共产党,怎么是匪呢?称朋友为‘匪’,于情于理不通嘛!对国民党,我倒是说了不少坏话,甚至骂得厉害,这是事实。1949年初,国民党检控《大公报》10条罪状,有3条在我名下,说我‘毁谤政府’、‘夸大危机’、‘刺激学潮’、‘违反政令’称‘共匪为共军’等等,这是白纸黑字印在报上的。”

“您为什么要做记者,为什么选择了《大公报》?”

“我从上中学就对新闻感兴趣,觉得做记者可以把自己要说的话发表出来给大家看,而且可以替许多人,特别是老百姓说话。记者是自由职业者,没有那么多束缚,无党无派,超然、清高,特别符合我的个性。所以,我从中学时就开始给报社投稿,并且终于走上了这条路。至于选择《大公报》,是因为它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培养了一大批新闻人才,而且它是一张民办报纸,不受党派左右,做《大公报》记者是很自由的,我写什么稿子,怎样写,编辑部从不干预。现在看,也许正是这种‘自由’使我犯了错误。不过,说《大公报》是国民党的报纸,不符合事实。据我所知,在《大公报》内部,没有人标榜党派身份,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即使有,也是隐蔽的。”

“解放前夕,您本来是有机会离开大陆去做驻日记者的,为什么没有走?”

“国民党太腐败了,根本没有希望。当时,凡是一点头脑的人对此都看得很清楚,不会去给国民党‘陪葬’。我又有许多共产党的朋友,不能说没有影响。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是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的,我也如此。所以留了下来。”

以上这些谈话,发生在那特定的年代。在父子之间,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也是十分坦诚的。我至今能够记得很清楚,是因为它几乎构成了我对许多问题认识的基础,至今影响着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特别是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又读了许多书,经了许多事,见了许多人,反复印证了一些认识,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就是从那时起,我对报纸开始有了浓厚的兴趣。文革使我认识到报纸的作用,那里面不仅有政治,而且影响着许多人的命运。特别是父亲被揪出之后,几乎断绝了信息渠道,惟有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揣摸政治动向,因此,他格外仔细地读报。尽管那时的报纸上除了革命大批判文章几乎没有什么新闻,但从批判内容的变化中却能推测出上面的倾向、意图。例如当时的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就明显比《天津日报》超前、灵敏,父亲是每天必读的。

发现这个“秘密”的似乎不止我父亲,许多知识分子都瞄准了这两份报纸。因为发行量有限,一时洛阳纸贵。好在父亲熟识许多报贩,总能保证供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下午都要到天津劝业

场街角处一个熟悉的报贩手中去买报。至今清楚地记得他与我目光一对，迅速从压在下面的报纸里抽出一份用《天津日报》夹好的《文汇报》或《解放日报》递给我，我一言不发地交上事先准备好的零钱，扭头就走。那情景颇有些地下活动的意思，现在想起来都有些滑稽。不过我理解，父亲却因此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这段经历也影响了日后我对报纸的认识和兴趣。

“与工农相结合”

1968年7月，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许多厂矿工人组成工宣队，进入学校、机关、各种文化团体“全面占领上层建筑”。我借此机会，联系了距学校很近的红旗仪器工厂去“向工人阶级学习”，以躲避被人欺凌。

在那半年里，我天天和工人师傅在一起，而且学会了开机床。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长时间地接触工人，发现他们确实十分朴实。文化大革命闹成那样，工人师傅真是“抓革命、促生产”，干起活儿来依然十分认真，照样完成生产任务。那段时间，我除了去学校、图书馆，就是泡在工厂里，每天按时上下班，活得也很充实。几个月下来，我已经能够在车床上加工出很漂亮的零件。

那之后，我又和同学们到棉纺厂去劳动了三个月，成了细纱车间的挡车工，学会了纺纱的全部“手艺”。我们还到郊区农村参加了秋收劳动，到制鞋厂去做鞋，到马路上去值勤站岗。总之，工人阶级占领了学校，学生们却几乎退出了学校。

我的生活又一次出现了动荡。先是父亲下放干校，紧接着就是全家人一个个相继离城下乡。

父亲下放是我送他走的，那是1968年的12月，我16岁生日的第二天。前一天，我们已经把他行李交到机关。那天一早，天还没亮，我送他到机关集合。因为他属于“牛鬼蛇神”，不能与革命干部同行，排到了另一队。这支队伍的成员，每人的背包上都挂着一小块毛主席语录牌。父亲的那块写着“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冬日的清晨，寒风刺骨，他们这批五六十岁的老人，在造反派手执木棍的押解下，默默地走着，渐渐消失在晨雾之中。他们要徒步30里，走到干校去。

姐姐是从北京走的，到山西榆次县一个距县城80里，只有7户人家的村子去插队。她一去就是10年。随后，哥哥、母亲相继离开了北京。哥哥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母亲去了设在江西的外交部干校。

干部下放干校，在北京引起了一场卖家当的热潮。由于国家机关各部委一下子要走几十万人，而且拖家带口，北京的房子全部收回，许多家当又无法带走，只能当作废品处理掉。成捆成捆的书籍都是论斤两秤着卖的，4分钱一斤；大件家具给个十元二十元就算好的了，几元钱一只皮沙发也有。有人卖精致的高脚酒杯，听说一分钱一个，干脆不卖了，“还不如砸了听个响儿呢！”

疯狂的六九年

1969年初，党的“九大”召开前后，文革中兴起的宗教崇拜式的狂热达到了顶峰。最突出、最典型的就是跳“忠字舞”，它把前两年佩戴像章，高举宝书，敬祝仪式等形式主义的玩意儿发展到了极致。

“忠字舞”以“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为舞曲，表演者胸佩像章，手执宝书，边唱边舞，动作完全是程式化的。凡唱到“毛主席”必挺胸抬头，做仰望状，同时双手高举；凡唱到“心中”、“心里”则必双手捧在胸前，做奉献状。我们在学校里反复演练之后，走上街头，不必与谁联系，也不需要场地，只要能站几个人，就开始连歌带舞。我就曾在天津最繁华的劝业场、和平路的边道上舞过不止一次。

跳“忠字舞”是全民性的，无论男女老幼，人人要跳，随处可跳。可以想象，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简直是精神病集体大发作。如果你走在僻静的小巷，见到那么一位“舞姿”走形的老太太，嘴里念念有词，身体机械扭动，不吓一跳才怪。

“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那时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每天晚饭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老百姓们还没有电视——最新最高指示往往就在那时播出。只要一听毛主席又有新的指示了，不必通知，凡有单位的会自动去集合、游行。

庆祝程序是，集合排队，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锣

鼓、鞭炮、红旗、标语,加上扩音喇叭,浩浩荡荡上街去游行。很快,市区的主要街道就挤满了人群。大家像比赛似的一个比一个声势宏大,以致领口号的人每每喊哑了嗓子。游行队伍中,高校和工厂的装备最强,高音喇叭令我们的小喇叭黯然失色。在那种场合,男生的乐趣就是敲锣打鼓放鞭炮,恶作剧地吓一吓女生。当然,要悠着点,倘若被“左”派师生发现,搞不好给你戴个“不严肃,不认真,对毛主席不忠”的帽子。

记得最好笑的一次,我们到农村帮助农民收稻子,几天下来,大家累坏了,吃过晚饭就睡下了。半夜,军宣队代表来敲窗户,说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了。因为在农村,就不搞游行了,但“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你们听我念一遍。那军代表是山东人,很老实,竟站在窗根下,对着窗户纸给我们念了起来:“一个人有动脉、静脉……”,我们隔着窗户,听他那山东话把“脉”(mai)念作“mi”,心里一个劲地好笑,却不敢出声。念完了,我们才睡觉。真是难为了那位兵哥哥。

1969年初的“珍宝岛事件”,使本来已经恶化的中苏关系愈发紧张起来,给人们的感觉似乎很快就要大规模开战了。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因此需要练兵,需要挖洞。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拉练”这个词是怎样简化来的,大约就是“拉出去练练”的意思吧。每逢拉练,事先要准备好背包、水壶之类。那时都是实实在在的棉被,虽说不很重,但路远无轻载呵。因此,大家尽可能找薄棉被。我家有一个二战时美国军用鸭绒睡袋,轻且小,捆起再塞两件衣服,也蛮像回事。我以此充作背包,但绝不敢说出去,那睡袋印有两个大大的字母“US”,已经被一块绿布钉上了“补丁”。睡袋帮了我的大忙。拉练集合都在夜间,一般是10点以后。夜深人静,街道上空空荡荡的,我们无声地行进着,不准大声说话,就像真事一样。渐渐地走出了市区,路灯没有了,黑洞洞,冷嗖嗖,前面忽然传来命令“发现敌情,就地卧倒”。哗啦啦趴下一片,也不管趴的地方有什么,这是“战场”,不允许你选择,趴到泥水里、马粪上的只好自认倒霉。“通过敌人封锁,跑步前进”,于是就跑,脚下磕磕绊绊,有摔倒的,有掉鞋的,均遭到训斥。如此反复折腾一夜,天亮才“收兵回营”。

拉练对“狗崽子”也有“好处”,就是不必带

枪——木头枪,也不必带其他“辎重”。大约是怕我们有“不轨行动”吧。我们乐得轻松。

挖防空洞,我们就受到“重点照顾”了。红卫兵骨干都是领班,或者站岗放哨(不知“哨”什么?),我们则要全部进洞里去挖土。我们负责挖的防空洞就在校园里。不知为什么,总是在夜里干,莫非是白天容易暴露目标,我不知道,反正我干的都是夜班。那洞的大小最多容两人侧身而过,高度只能弯腰,若是挖土,则只能跪着。工作面太小,每班下去两个人,一人挖,一人往外运土。点一盏马灯,只能照亮尺把大的地方。我们大约挖了一个星期,深度不过三、四米,掘进也只有十几、二十米,就开始感到湿漉漉的要见水了。而且,前面挖着,后面就不断塌方。学校怕出人命,只好停工。后来几场大雨,那防空洞就全塌了,在校园里形成一个大坑。我们的备战工程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注销”了城市户口

1969年夏天,我们“毕业”了,去向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狗崽子”来说,去向只有一个——到农村去插队,别无选择。当时,为了把孩子留在城里,有许多家长与学校死磨硬泡。但我家没有,很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父亲还在“接受审查”,我们没有“泡”的资格。

插队已成定局,学校对我们也是“宽厚有加”。行前召开欢送大会,同时送给了我们一件“礼物”——我们都“光荣地批准加入红卫兵”了。对于这迟到甚至廉价的荣誉,大部分人表现得无动于衷。

我是自己到派出所去办理户口、粮油供应关系迁移手续的。值班民警看了看我的证明,一句话不说,拿过我家的户口簿翻到我的那一页,只一扯,就撕了下来,然后随手盖了一个“注销”章,就扔在一边了。走出派出所,我想,从此刻起,我就算在这个城市里“注销”了,再也不属于天津,而是山西农民了。当然,我也再不是孩子,而是一名“知识”青年了。今后的路是什么样?该怎么走?我不清楚。但有一点我明白:路要自己走,无论前面是什么,都要走。

那年,我刚刚过了十七岁。

(责任编辑 萧徐)

编 写 一 红 色 文 学 史 的 前 后

•
张毓茂

最近,黄修已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修已是我在北大时同班同学。我们都曾参与编写所谓“红色文学史”。该书当年曾被誉为“奇迹”和“创举”。修已的文章重提这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发人深省,感触良多。其实,这个“奇迹”和“创举”,不是孤立发生的事件。我想围绕编书的前前后后,也谈谈我今天对此“奇迹”的认识和反思。

我们于1955年秋初入学。因而我们年级被叫做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我和修已都在这个年级文学专门化2班学习。五年的北大生活,回忆起来,很温馨,也很苦涩。从1955年秋初入学,到1957年“反右”斗争,这两年里,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当时社会上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校内号召“向科学进军”,到处充满浓郁活跃的文化学术气氛。中文系与其它各系一样,荟萃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专家,他们学贯中西,学界泰斗,在我们年轻学子的心目中,是一座座崇高的偶像。教授们的讲授,千姿百态,各领风骚。有的娓娓而谈,如沐春风;有的出神入化,令人陶醉;有的标新立异,骇世惊俗。当然,也有的大学者讲起课来,实在沉闷乏味,催人入睡。那时候,确实有点百家争鸣的气候。

学生中的社团活动也很红火。北大校园内有诗社、戏剧社、美术社……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学生社团,我至今也说不清。只记得每到星期六,大饭厅外面的墙壁上,贴满了海报,都是在昭告某社请某某名家前来讲学的。听这种讲座,也要精打细算,因为太多,必须做出选择。我听过曹禺、冰心、艾青、雪峰、赵树理等作家、诗人和文艺批评家的报告。有些报告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

除了讲座,还有办刊物,也强烈吸引了同学们。好多刊物是学生自己办的,三五好友,志趣相投,就办将起来。全校有名的刊物是《红楼》(北大在沙滩时的校舍名为红楼,据说刊物以此为名,是表示继承“五四”民主传统也)。我也在《红楼》上发表所谓文章。其中一篇是模仿鲁迅《故事新编》体裁的小说《斩蛇》。是写汉高祖刘邦起义时装神弄鬼,以斩蛇制造神化自己的舆论,无非是想表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刘邦之流的政治野心家则是利用人民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已。想不到这篇小文章后来竟惹出大祸。“文化大革命”时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我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居然查出了这篇东西,大喜过望,把我定成现行反革命,是小吴晗,早就以历史小说反党,攻击伟大领袖,替反党分子彭德怀鸣冤叫屈。我提醒他们注意我写作的时间是1956年,那时彭德怀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的倒霉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我替他鸣的哪份冤屈!造反派们没词了,但造反总是有理的,他们就狂呼:“不许反革命分子乱说乱动!”人无先见之明,当年如果知道会惹这么大的祸,说什么也不敢写这东西的。

我和几个同学还办了一份手抄的小壁报—《小火星》。每期刊载的都是同学们写的小诗、小说、散文、短评和漫画。我是编辑之一,但漫画却是我独家作品。记得,当时《中国青年报》还曾专文报道过我们这个刊物。刊物真正主持人是一位姓邓的同学。他向我们说:“普希金在皇村中学读书时,就办手抄刊物,我们也办吧。”我们当时年轻,很自负,大约都觉得自己是未来中国的普希金。后来,据我所知,谁也没有成为“普希金”。那位姓邓的“普希金”毕业后去了新疆,在那里一家杂志社当编辑,这是后话了。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派斗争风暴起来,北大那种“百家争鸣”的学

术气氛,被冲击得荡然无存了。反右斗争前是整风运动,号召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据说能不能向党积极提意见,是考验跟党的感情是否深厚。我没提什么意见,倒不是我有先见之明,事先就知道这是“引蛇出洞”,是“钓鱼”,是“阳谋”。实在是我没什么意见好提,全部心思都用在读书上了。但对有些意见很赞赏,有共鸣,也跟个别同学议论过。如认为胡风不可能是反革命,很可能是周扬利用手中权力搞宗派打击……等等。“反右”后期整团时,给我一个留团查看处分。二十年后,北京大学团委通知我,当年处分错了,现在宣布撤销。抚今追昔,我还得感谢自己,假如当时不是埋头读书,也跟人家乱说一气,那后来的命运就更不堪设想了。

“反右”之后,全国又兴起“大跃进”运动。什么“深翻地”,“亩产万斤”,什么“大炼钢铁”,“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狂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北大当然也被卷入其中,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全被打乱了。湖光塔影的燕园里,炼钢土炉遍地,浓烟滚滚,火光熊熊……今天的人们,是无法想象和理解那时的荒诞和疯狂。与此同时,对教授们开展革命大批判,揭露他们“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伪科学的反动本质。我们崇拜的游国恩、林庚、吴组缃、王了一、王瑶……等老师,无一幸免。这种批判除了在学术上简单粗暴,以势压人,更夹杂人格的侮辱。这就是在文教战线上的所谓“拔白旗,插红旗”。编写“红色文学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当时55级有人提出,我们不但能“破”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也必定能“立”无产阶级的真科学,我们集体来写一部革命的《中国文学史》吧。这一创意非常符合当时大跃进的潮流,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编书运动开展起来。1958年暑期,1955级文学专门化的三十几个学生,在年级党支部的组织下,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七十七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此书一问世,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效应。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歌颂此一新生事物的文章,就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康生也给55级写信,给以表扬和鼓励。55级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几位年级代表,奔忙于各种会议,宣传成就,介绍经验,以此批判资产阶级伪科学……。

那么,“红色文学史”究竟“红”在哪里,亦即与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史有何本质不同。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有二:一是对民间文学的态度;一是强调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贯穿全部文学发展的历史。其实这两点都不是什么新创见。修已在他的《“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中已指出,“五四”时期以及建国初年,就已有不少学者“把民间文学扶上了中国文学的正位”。实际上并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大众,受奴役,被压迫,缺少文化,他们的所谓文学作品,虽然也为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但在得到文人作家加工提炼之前,是比较粗糙幼稚的,甚至无力抵制统治阶级腐朽思想的渗透,而夹杂低俗消极的成分。它们不可能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这本来是文学常识,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专家偏见。“红色文学史”要同资产阶级“对着干”,就连常识也不顾了,硬把民间文学抬高到主导地位。

至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也不是55级的发明,修已文章也指出,是从茅盾的《夜读偶记》中借用来的。在茅盾文章之前,在前苏联和中国的学术界,就现实主义问题展开过广泛的讨论。波兰作家扬科特,苏联作家西蒙诺夫,中国作家秦兆阳(化名何直)都发表了有影响的文章,对现实主义提出了质疑和新见解。茅盾正是看了这些文章之后写出长篇论文《夜读偶记》,在《文艺报》上分期连载。当时苏联学术界的权威观点是一部哲学史始终贯穿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茅盾是否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或启发,从而提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呢,这就不得而知了。但这一公式遭到了强烈的反对,除了修已文章提到的邵荃麟、何其芳等文学家反对外,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杨晦也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这一公式。特别是在最高权威毛泽东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之后,茅盾的公式自然就不能再用了。所以在“红色文学史”修改版中,“民间文学为正宗”和“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公式,都被舍弃了。这样一来,“红色文学史”与“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史很难说有什么不同了。本来我们用来写书的那点文学史知识,就是从人家那里学来的,反而又要批判、否定人家,这种数典忘祖的行为,

在那个荒诞的年月里却被当作革命壮举来称颂的。

五十年过去了,今日看“红色文学史”,那是地道的大跃进产物,与“深翻地”、“大炼钢铁”等并无本质区别。就其后果来说,确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首先,编书及其前后的大跃进活动,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不少课程中断了,影响学生专业知识学习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破坏了人才培养计划,使学生的成长遭到严重扭曲。对此,当时在教师和同学中就有抵制,但被作为错误倾向压下去了。其次,“左”的学风盛行,给学生以误导。粗暴简单,浮夸虚假,偏激狂热,成为一时写文章的风尚。杨晦先生鉴于55级学风不正,曾语重心长地告诫说,“你们搞这些东西,当心害了自己!”有的学生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口号鼓动下,表示要赶超游国恩教授。杨先生悲叹说:“你们在学术上20年赶上游先生就了不起了。”杨先生对“左”风的抵制,后来也遭到了打击,竟被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杨晦先生和北大中文系1955级》,见《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第249页)其三,在“左”的思潮冲击下,通过编书和其它活动,搞思想批判,也就是抓阶级斗争,不仅伤害了一大批专家学者,

也摧残了一些无辜的学生,造成同学中人际关系的紧张和扭曲。比如杨天石同学,今天已是中外驰名的专家。他就是由于业务拔尖,个性又倔强,虽逃过右派一关,却被当作白专典型,再三批判。这样的优秀人才,毕业时竟被分配到拖拉机手短期培训班,除了教工人的语文课,就是看守传达室,上课下课打铃。在55级又何止一个杨天石,有的比天石的遭遇还令人辛酸。

当然,由于在55级中所处地位、境遇和思想状况不同,老同学们今天对编书及大跃进年月的种种活动的回忆,也不尽相同。有人至今还赞叹当年的革命激情,怀念55级的风光和荣誉,说什么青春无悔。凡此种种,见仁见智,亦属正常。我想,假如请贾府的焦大和王熙凤都写回忆录,焦大眼中所见大观园的阴暗面,琏二奶奶是绝对讳莫如深的,不但自己掩盖,还要给敢于曝光的焦大塞上一嘴的马粪。其实,我和天石之流,就是55级的焦大,虽然嘴里塞的马粪已被掏出,但,凡有所言,也绝不可能余香满口的……是耶?非耶?姑且略备一说吧。

(责任编辑 萧徐)

(作者为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

喜讯:几千元出版老人文集!

出版个人或家族书画文集是中国读书人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但现在出版社出版周期漫长且价格昂贵,谁能帮助读书人便宜快速出书呢?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专门设立《个人出书网》为老人少量出书提供专业服务:我们有专门的采编人员上门协助编稿,有潜心敬业的老编辑审稿改稿,有专业的美工为您设计封面插页,想走入市场的我们还代为联系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出书范围: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文随笔游记,思想理论著作,老人书画文集等。

家庭出书: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贤评传,家庭收藏、家族照片等。

旧书翻印:文献资料整理重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服务流程:

作者说明内容与打算→公司计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协助整理完善稿件→电脑录入编排校对→作者大样初审→专业编辑审改→作者二审→协商设计封面插页与内页版式→制作样书→作者终审付款→印刷出版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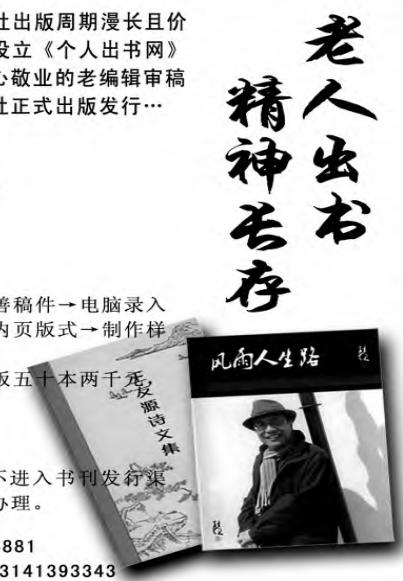
基本价格:大32开/封面铜版纸彩印/内页胶版纸单色印刷/胶装订:200页出版五十本两千元;300页出版五十本三千元;需文字录入与艺术设计者费用另计。

特别说明:

书稿内容文责自负,出版费用由出书人自行承担;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用于交流与赠送;要求正规出版发行的由我们编辑设计制作样书后代为办理。

咨询热线:010—68920114 68920182 涂主编:13693651386 13521186881
陈编辑:13521401621 13141251305 冯编辑:13718619470 张编辑:13141393343

详情请登陆《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路五号院博越商务楼6507室



投稿邮箱:grcsw@126.com
邮编:100089



重新开放中南海

● 丁东

中南海位于北京城区的中心，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地点已经六十年了。社会一直有呼声，要求中南海向公众开放，供游人参观。北京市的旅游管理部门前些年也曾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重新开放中南海。

现在的中南海具有二重性质，既是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政治运行中枢。从两个方面看，我以为都有开放的必要。

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看，中南海的前身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园林。当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平民百姓想进去游玩，自然是白日做梦。当然，光绪皇帝在戊戌政变后被西太后所困，幽居瀛台，想出中南海而不得，也体现了专制政治最残酷最黑暗的一面。在长达两千年的皇权专制时代，中国有皇家园林，贵族有私家园林，不曾有过公园的概念。直到清朝末年，上海的租界才出现最早的公园。进入民国，从1914年夏起，京城一些名胜陆续对公众开放，成为公共场所。1924、1925、1928、1929年，颐和园、北海、景山和中南海相继辟为公园。三十年代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建公园，至今为人们所怀念。公园是近代出现市民社会的产物，不论购票有偿享用，还是免票无偿享用，都是公共空间。把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辟为公园，让公众参观游览，是当今世界各文明国度通行的做法，也是遗产保护的应有之义。

公园的兴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公民权利伸张与收缩的晴雨表。我们说，文革是公民权利被践踏的时期，也可从公园的命运来验证。1971年后，与中南海一桥之隔的北海公园及附近的景山公园长期关闭。后来才知道，不是北海、景山本身出了什么毛病，不适宜游人进入，而是成了江青等权贵

的游乐场所。江青垮台以后，北海、景山公园于1978年重新向市民开放，受到一致的好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南海也曾经部分开放，周末供游人参观。北京市许多单位都曾有组织地分配门票。我在当时也参观过。当时的感觉是，不但观看了风景和文物，而且感受到执政者的自信和开明。可惜这种开放到1989年停止了，至今尚未恢复。现在如能开放中南海，其意义不仅是增加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旅游景点，而且是一种主权在民的政治宣示。对于中国公民来讲，既可履行保护文化遗产的义务，也可享受欣赏历史文化遗产的权利。这种公民权利，当然越早归还社会越好。

从政治活动中心的角度看，开放中南海也有很多好处，有利于增加政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今年二月，温家宝总理邀请十三名基层代表到中南海座谈，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他说，你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南海，不要拘束。大家都来自基层，其实中南海你们应该是主人，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中南海这个大门是向广大群众开的。我认为，不应当把这些话理解为总理的客套话。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国各界公民的确应当是中南海的主人。领导人的国务活动本身是履行社会公仆的职责，不应当形成高高在上，不可接近和神秘化的意味。领导人只有牢记这一点，才能形成执政的公信力。在制度安排上，也要切实体现中南海的大门对公民是敞开的，而不是关闭的。

其实，国务活动场所向公众开放，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我经历有限，曾经作为普通游客在堪培拉参观过澳大利亚议会的辩论，在渥太华参观过加拿大总督府，看到很多成人在那里运动，孩子在那里游戏。八十年代的经验表明，部分开放中南海并不妨碍领导人的国务活动和中央机关的办公秩序。现在重新开放，在技术层面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只要领导人有诚意，事情并不难办。

中南海曾经是公园

● 智效民

2000年上半年,《北京档案资料》连续刊登一组《中南海史料》。这些史料告诉我们,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南海就变成公园了。把皇帝禁苑与军阀官邸变成公园,是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的一个标志,对于当前的社会转型具有某种借鉴作用。

早在金、元时期,“太液秋波”就是“燕京八景”之一,当时太液池的位置就是现在的北海与中海一带。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皇城南移,为了丰富皇城园林景观,又开挖南海,使太液池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清朝建立后,几代皇帝都喜欢园林生活,于是他们在中南海兴建殿宇馆轩,作为避暑听政之所。相比之下,紫禁城则受到冷落。

辛亥革命后,中南海为袁世凯占用,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府。袁称帝时,以建立“新中华民国”为名,将中南海改为新华宫,并将原来的宝月楼改建成新华门。此后,中南海又相继成为黎元洪、曹锟的总统府和张作霖的大元帅府,它一直是平民百姓无缘涉足的禁地。

1928年北伐成功后,时任北平市公务局局长的华南圭致函北平市市长,要求对中南海予以保护。这件事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经过一番努力,中南海董事会于当年12月15日准备召开成立大会。该董事会筹委会为邀请公务局派员出席大会,特在邀请函中表示:

中南海系自远至清帝王苑囿之一部,其风景清嘉,宫室壮丽,为国内有名建筑。但其经费所出,无非我民众先代之脂膏,乃以供少数人之娱乐,实为我民众所不甘。民国成立以来,又为十数军阀所把持,藏垢纳污,罪恶丛集。今幸北伐告成,豪酋敛迹,而此历史上之园林不为民有,坐视荒废,殊为可惜。同人等谨遵先总理天下为公之意,佥以中南海应归市民直接管理,以绝罪恶之根株,以供游人之玩赏。因于本月十三日召集北平各届民众代表开一联席会议,设立中南海董事会筹备

处,以筹备真正代表民意、直接管理中南海的董事会。当决议于本月十五日(星期六)午前十时在南海大礼堂开董事会正式成立大会。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亦函请北平特别市政府、平津卫戍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共同成立“接收中南海办事处”,并准备让中南海“依中山、北海公园成例,从速正式开放”。随后,有关方面还希望“中南海为北平市民共同游憩之公园,永远开放,不收门费。”1929年4月,中南海董事会推举熊希龄为主席委员,李光汉为事务主任。不久,北平市政府也成立“整理中南海公园临时委员会”,负责中南海的有关事宜。至此,中南海向市民正式开放。

抗日战争中,中南海虽然还是公园,但许多殿堂被日伪机关侵占。据1938年《中南海公园事务报告书》反映,进驻中南海的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占据居仁堂)、“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占据勤政殿)、“临时政府侍卫处”(占据时应宫和喜福堂)、“司法委员会”(占据丰泽园)、“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占据锡福堂)、“国立医学分院”(占据运料门迤北)、“最高法院检察处”(占据丰泽园)、“满洲帝国通商代表部”(占据静谷)、“新民会新民青年实施委员会”(占据春耦斋)、“教育部直辖编审会”(占据怀仁堂)等机构。后来,上述一些机构搬出中南海,但又进来更多单位。于是,中南海被搞得杂乱无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决定进驻中南海。周恩来请毛泽东快点搬入。当时毛泽东并不愿意搬进去,他对周恩来说:“我不搬,我不做皇帝。”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对维修中南海的工人们说:“中南海自古人民建,人民修,但人民却没有享受到它的美丽。这次修成后,我们要请人民代表来这里做客观光,今后还要逐步让中南海成为人民游乐的场所。”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曾经局部开放过中南海。由此可见,尽快开放中南海是历史的要求。

中南海作为历史文物，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价值。因其相连紫禁城，清代皇家在此曾上演了许多历史大戏，高阳先生的《瀛台落日》精彩地再现了王朝的最后几幕大戏中让人无限感慨的往事。风流水转，到了1949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成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诞生，中南海从此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迄今正好六十年。

现代政府是社会的公共权力组织。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应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公器。办公场所向本国公民和外国宾客适当开放，有序参观，就是体现这种公器性质的方式之一。事实上，随着现代公民权利的普及和当政者社会公器意识的觉悟，许多国家的政治中枢都在考虑到安全和办公秩序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方式向公众开放。以美、英、法、俄几个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例：

美国总统府为白宫，始建于1792年，每周二至周六开放五天，如遇白宫有活动，则不开放。一般参观者可进入东厅、绿厅、蓝厅、红厅、国宴厅及图书馆等10多个房间。“9·11”后出于安全原因，参观者需要提前申请预约才有可能得到门票。很多中国游客都参观过白宫。

英国是君主立宪国家。白金汉宫始建于1703年，1837年以来历代英国国王都住在这里。从1993年开始，每年8、9月两月对外开放，游客可购票参观。英国首相府是唐宁街10号，内部未对外开放，外部建筑游客可以参观。

爱丽舍宫始建于1718年，1891年以来一直是法国总统府。从1989年开始，每年9月文化遗产日有两天对外开放，游客排队参观，残疾人、孕妇优先。各个历史名厅，都向游人展示。总统夫人还会抽时间接见来访游客，其中也有外国游客，但法国游客居多，有人也利用这一时机向总统夫人陈述民情。

俄国总统府克里姆林宫的历史更悠久，始建于1156年，几经扩建，成为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斯大林时代不开放，1955年后开放让市民参观。现在游客可以购票参观克里姆林宫，但不能进入作为总统官邸

开放政治中枢让公众接触公器

• 赵诚

的一号楼。

我在网上看到2006年参观过爱丽舍宫的中国游客的一篇文章。他说，“九月十六号是欧洲遗产日，很多地方都对公众开放，老婆说找几个地方看看，选来选去还是去总统府吧，中南海估计这辈子是没机会进去了，只好去法国的中南海尝尝鲜了。”这虽然是一种不乏苦涩的诙谐，也未尝不是国人希望开放中南海的表达。其实，这位网友忽视了中南海曾经早于爱丽舍宫开放过一段时间，1986年笔者曾进去参观，还在瀛台买了一盒冬青木的筷子作为纪念。可惜后来中南海关闭了，网友才发出这辈子没有机会进去的感慨。我想，国家如能决定重新开放中南海，和他具有同样心情的人也将有机会重新体验身为中国公民的自豪。

除了开放行政中心，还有就是开放议会。很多国家的议会开会，国民是有权旁听的。参观美国国会比参观白宫简单，不登记，不收费，不凭票，外国游客也可进，每周二至周五对外开放，遇有两院议会讨论问题，游客可在旁听席上，听议员们讨论，看议员们表决，选民们既可了解立法的过程，也可直观地看到所选的议员是否尽职。如果选民想参观议员的办公室，给本选区议员办公室打电话预约，议员办公室就会安排人员接待并陪同你参观。英国下院有专门的旁听席，议员在一层开会，旁听席在二楼，议会开会时，公众可自由进入旁听。首相在下院的位置距离旁听席仅有12.2米。法国国民议会也对公众开放，按法律规定议会开会必须是公开的，受国民监督，每次议会开会前，排在前10名的法国公民，出示身份证件就可保证进入旁听席入座，得到议员邀请的公民，在旁听席许可的情况下优先入场。我建议，中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也应当考虑以适当方式安排公民旁听，这将是彰显公民知情权一种方式。拥有知情权，才能更好地行使监督权，以监督国家机器的运行。

落实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有很多实事可做。开放中南海参观和让民众在全国人大会议时旁听，都具有让公众和公器正面接触的意义。

“斗争哲学”曾被认为是反共哲学

(外二篇)

● 曾彦修

看了《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月号上冯兰瑞的《和谐社会与宪政建设》一文,大胆提出“必须与传统的‘斗争哲学’彻底决裂”,可谓直言极谏,口不择言,令人佩服。这引起我也写这篇杂感。虽云“杂感”,恐怕也事关重要。我就下面三个题目谈谈。

一、“斗争哲学”曾被认为是反共哲学

抗日战争后,尤其是1939年国民党在全国搞“精神总动员”以后,它的宣传矛头,无论是党务系统与军事系统(俗称“CC系”与“复兴系”)的报刊宣传,都相当集中于反共了。他们提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口号。这后面两句的真意其实是专门反共的。他们相当强力地宣传一个东西,说共产党是专讲“斗争哲学”的,把一切斗坏,叫人民远离共产党。那时期被公认为“复兴”社与“CC”系的刊物《时代精神》、《民意》之类等,长期宣传的内容之一就是骂共产党只讲斗争哲学。

1945年初夏吧,国民党在陕北榆林这块地方的最高长官邓宝珊将军,他在西北军系统中资历相当老,所以,不管你杨虎城、傅作义对他似只能作弟子礼。也因此解放前夜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是傅作义,副总司令就是邓宝珊,他不能指挥一兵一卒,挂名性质。陕北的榆林地区在延安之北,日军始终未侵入过,颇为安定。但这地区的军政势力却甚复杂,有陕北传统的井家军队势力,还有马占山本人及其少数队伍等。但论起资历来,邓宝珊最高,所以他就一直是那个地区的最高司令。邓好像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榆林地区一切与西安、重庆的往来,均必须经过延安,因此,邓宝珊先生始终都与延安保持良好关系。

大概是1945年初夏,邓宝珊自重庆、西安返榆林,这是例行往来,为了礼貌,至多毛泽东见一见、吃一顿饭也就够了。可这次不同,大概为了解除将来的后顾之忧,在杨家岭大礼堂开欢迎大会(我几年间即住在大礼堂正对面的窑洞中,记忆中这礼堂对外似乎很少开过欢迎大会,另一次是1946年初夏,欢迎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三人委员会),我也进去了。记得似乎是李富春同志致欢迎词,邓宝珊致答词。邓在答词中,忽然说了一句“共产党是讲斗争哲学的”,台下小有骚动。但看邓仍很友好,无任何反共之意。散会下来,我们宣传部的几个人就议论开了(一般是叶蠖生前辈与田家英、吴允中及我等几人喜闲谈),说,邓宝珊怎么也讲起“反共”话来了?叶老前辈、赵毅敏似也在场,说,他是国民党高官,天天要看国民党报刊,看惯了,他也不懂什么斗争哲学,就随便说了!你们看他的样子不还是很友好的么?他莫名其妙,弄不清楚的。

事情就是这样,我记得清清楚楚,不知这会的档案尚有保存否。

解放后,1964年全国大批“合二而一”论,说宇宙间的一切均永远只有“一而为二”,而绝无所谓“合二而一”。照此,就水也没有了,人也没有了,其悖理有如此者。这不也就是只有斗争哲学一样的东西么?

二、要提倡和等待“自然而然革命化”

这话是从陈伯达那里听来的，说是毛主席对他闲谈时说的（陈伯达是毛窑洞中唯一可作闲谈的座上客）。陈谈话时间是1941年秋，地点是延安杨家岭一个岔沟里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这个机构是1941年夏中央新成立的“中央调查研究局”中的三个部分之一。据陈伯达告诉我们，是毛泽东兼此室主任，陈伯达任副主任。这机构大约共有六七十人罢。老同志有张仲实、于炳然、丁东放等，其他是“一二·九”到“三八”或后来著名的人有邓力群、田家英、许立群等。我与陈传纲几人在农业组，大体均是自选的。

陈伯达的领导，素来是无为而治，他只当甩手掌柜（“文革”小组长，他大概有点想做真掌柜的样子，几天就下来了）。陈不会讲话，更不会作报告。1940年吧，南洋顶尖侨领陈嘉庚来延安访问，开欢迎大会，陈福建同安人吧，语言不懂，要人翻译。翻译也得大人物才行，就由同是同安人的陈伯达来作。一场大会下来，几乎一句话也没有人听懂，但是掌声异乎寻常的热烈，因为当时大家对陈嘉庚都很尊敬。

陈伯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一个人埋头写文章，但他大概是在延安时期唯一一个可以由毛召入窑洞中作闲谈的人物了，所以他能从毛处听来某些别人听不到的东西。在政研室，1941年秋，晚饭后，他喜欢一个人在他的小窑洞中对人闲谈，没有题目，有些自述性质的小故事，如说在莫斯科，他曾被怀疑为托派；又说，人家读列宁著作，他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又被怀疑为国民党右派等。他讲这些，当然是自傲事件，表示自己从来不是教条主义。他这窑洞连同小过道坐十来个人了不起了。去的人自带小木凳，有点像设帐授徒似的。后到的人，只好明天请早了。有一次，我算抢到一个位置了，那次，听陈说，有一次毛对他谈起，我们有些同志太急了，强迫人家革命，不行的，革命怎么能强迫呢？有时候要等待，等待群众“自然而然革命化”。以上当然只是大意（讲的还要多，有些不便写），谁也没有笔记，只是“自然而然革命化”这几个字保证绝对无误。（当时在政治研究室的，据我所知，现在北京的就有邓力群、周太和、吴骏扬、詹武、夏鸣、史敬棠及我等七人。至于那天哪些人去听了，就说不出了）。

三、“见面先说三声好，好，好！”

1944年夏，王震与王首道二人率领几千人自延安出发，南下江南、岭南去建立抗日根据地。毛亲往东郊机场送行，作誓师讲话。讲话随即普遍传达。

这讲话内容很好。如说，共产党员既要有松树那样的坚定性，又要有柳树那样的灵活性。毛说，这次南下，不免要遇见一些我们留下的小队伍，小根据地，他们苦啊，他们的做法当然与我们在北方这么多年大不相同，见到他们时，千万不要随便批评，忘记了我们从前吃“钦差大臣”的亏，见面先说三声“好，好，好！”有什么意见慢慢提，客气点。以上当然只是大意，这个重要讲话的档案应还在。可惜1949年、1950大军南下时，事先就完全没有听到过这方面的教育，后来一到了广东（包括海南岛）、福建、云南等省后，不久即大批其“地方主义”，势如暴风骤雨，莫名其妙，甚至杀了些当地老干部。更怪的是，到了1958年广东还在批古大存、冯白驹两个老前辈的“地方主义”。我老早就在广州的刊物上写文，题目即叫《广东的“地方主义”是海外奇谈》，因为实在没有，连一点影子也没有呀！古大存在抗战后不久即到了延安，后任整风审干时期的中央党校一部主任，主管命脉，后又去东北，然后南下，他哪来什么“地方主义”呢。总之，南方各省的“地方主义”全是无中生有。尤其是广东，我解放初在那里几年，哪里有这个东西呢？反了一阵“地方主义”之后，1959年吧，叶剑英就被调走了。据说，叶临行前对少数人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非常沉痛，但又无可如何。

这完全与1944年夏，王震南下时的精神、态度完全不同了。历史上的教训还要回避，反“地方主义”不是“扩大化”，而完全是无中生有。

我们今后要避免重犯过去类似的错误，就不能把过去的事都一律裁弯取直，掩盖起来。写历史的任务恐怕决不是光写什么都是伟大正确，而是要把教训写出点来才有意思。

（责任编辑 萧 徐）

江一真“求真”

● 汪征鲁

今年春节期间，钟兆云兄托人捎来他与王盛泽合著的《一生求真——江一真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全书洋洋近七十万字，展读之下，竟不能释手。

江一真之于我是父执辈。五十年前，我在福州一中读初中时，曾与江伯伯大儿子江上虹、二儿子江上舟同学。他们虽是省委书记、省长的孩子，但都衣著朴素，平易近人，与同学们相处甚洽。上虹行侠仗义，身手矫健；上舟文雅内敛，品学兼优，都是同学中的一时之选。正是这个时候，政治风云突变，在反右倾的党内斗争中，江伯伯几乎在一夜间被打成“江魏反党集团”的头子。也正是这个时候，在民间，关于江伯伯体恤时艰，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终罹冤案的传言此起彼伏。老师和同学们也对日渐沉默的江氏兄弟愈加怜惜。人心不可侮啊！

之后，由于我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接触了不少福建地方党史的资料与著述，对江伯伯当年与“左”的错误抗争的事迹有了大致的了解。但毕竟是一个大概。这次拜读了《一生求真》，才窥得江伯伯的一生行藏，一位铮铮铁骨、耿耿丹心的共产党人跃然纸上，他一生求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风骨和气概、以及为之付出的人生代价，令我扼腕久之。

与“左”倾错误抗争

江一真同志是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与白求恩大夫、柯棣华大夫并肩战斗，为抗日军民救死扶伤。解放战争期间，在苏北解放区担任党、政、军领导工作。建国后，先后任福建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农垦部副部长，农业部党组书记、代部长。文革后，先后担任卫生部部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顾委委员。他一生的求真历程似有三部曲。解放

前，他是为了追求真理、追求解放参加革命的。这是其求真的第一部曲。这里不拟详述。

建国后十七年中、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后的若干岁月，其求真历程表现为与我党“左”的错误的抗争。这是其求真的第二部曲。在其任福建省委书记、省长期间，正逢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运动甚嚣尘上，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和我党的干部一样，最初也曾无条件地响应和实践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也为其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所燃烧，然当其弊端显现、民困时艰时，他最早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洞察一切，不顾个人安危，也不自量力，挺身而出，抵制这一错误路线。他在当时工作会议上的一些讲话中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意见。关于农业，他认为，公社化有许多问题错了。比如：一、胜利冲昏了头脑，把农民估计过高，过早否定了小集体、小私有，公社问题违反了客观法则；二、人为否定了价值规律，否定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法则，你就是我的，公私不分，这是挫伤群众积极性的根本一条，造成乱子的主要是这一点；三、过早过分强调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什么都包下来，超越了经济条件；四、把生产资料都归公，连手表、棺材都要，这些做法太过火了；五、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估计过高，其实大多数农民觉悟跟不上，他们的积极性遭到挫折，很多地方更是伤害了中农积极性。公社问题是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力、生产关系不适应，一切问题都出来了。总之，情况估计错了，就方针错了，措施也错了。关于工业问题，他认为，全省来说问题是大的，战线太长，重点太多，重工业太多，基建太多，上马太多；总的是急躁冒进，因此需要劳动力多，投资多，出现了像厦门那样有墙没顶、有房没机器、有机器没原料的事情。基建过多，生产也受影响，因为钢材只那么多，搞了基建就挤了生产。工业还影响了农业，抽水机动力都拿去炼铁，福建一个化肥厂也没有，没

为农业办一点好事。70万人搞工业，粮食运输、新建城市都要几万人为他们服务。工业上教训很多。等等。这些见解直到今天也还是真知灼见，掷地有声。他毫不隐瞒因这些错误而导致干群关系空前紧张。他指出，不少地方发现，生产队长、干部和群众站在一起反对我们。有的甚至恨死我们，说共产党变质了，朝中有奸臣。他还引用了平和县某些老百姓最为尖锐的议论，如“听党的话，大听大死，全听全死，不听不死”；“再不改，要来一个第二次革命”；“30年革命，20年打仗，10年解放的功劳，都被你们一年丢光了，再搞下去，东山炮再响，农民就要用人力物力支持国民党，你们要失败的”等等。得民心者得天下，倾听民间的呼声何等重要。后来，竟将“听党的话，大听大死，全听全死，不听不死”套在他头上，成为打成反党头子的重要证据。江一真还一再告诫干部，共产党人不怕犯错误，也难免犯错误，但要避免做“惯犯”。一次，二次，三次以上不接受教训，就叫做“惯犯”，叫做屡教不改。但在那一个时代，若不犯今天经历历史界定的错误，就要犯当时钦定的错误，就要犯罪。为此，江一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因之获罪，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

在江一真任农业部党组书记、代部长时，遭遇文革，他与文革动乱与四人帮集团作了殊死的斗争。文革甫结束，江一真身先士卒拨乱反正，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第一个指名批判汪东兴副主席两个凡是的错误。之后，在其河北省委第二书记任上，排除阻力，一往无前地平反冤假错案。凡此种种，书中述之甚详，此不赘述。

建国以后，自觉拥护和执行极左路线的党员干部不多，自觉抵制极左路线党员干部则更少，简直可以说是寥若晨星，绝大部分党员干部是因种种历史的原因盲从极左路线。而江一真堪称这寥若晨星中的佼佼者。他一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一生倾听人民的呼声，一生独立思考，总之一生求真，这使他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某些历史的局限性。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作者也不讳言传主的某些弱点和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局限性。如当身边的战友、党内同志、甚至夫人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时，他也彷徨过，动摇过，也作过违心的检查。在工作

中，江一真的缺点是，有时锋芒毕露、过于坚持己见，甚至还和第一书记唱对台戏；有时急于求成，未及做过细的工作。但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只能是苍蝇。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福建，八闽大地上其嘉言懿行长存口碑；在河北，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他在内的原省委三位主要负责人都调离该省，但在河北就地参加当时正在进行的十二大代表的选举，三位原领导人中只有他一人当选，且票数高达90%，为所有当选代表之最。等等，等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江一真退居二线，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为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他孜孜不倦地学习，深入社会调查研究，进入求真的第三部曲。这一期间，他在福建作了地方党史问题的调查，推动落实地下党问题的解决；在福建作经济工作的调查，为项南书记的“念山海经战略”献策鼓劲；在中国沿海地区作渔业调查研究，为中国海洋渔业的发展奔走呼喊；重视法治，上书高层推动中国健全律师制度建设；在中国特区调查研究，帮助海南特区“跑步”；直到生命的最后期间，他还提出并要求身体力行安乐死，死后遗体供给医学界的科、教、医选用，等等。他的求真从对极左路线的抵制与批判转向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向组织要“补助”

《一生求真》注重具体细节的描绘，使全书不仅骨骼健全，而且有血有肉，生动具体，其中许多细节深具典型性，一滴水反映出太阳的光辉。

如江一真、魏金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终生的朋友。但残酷的路线斗争中也被迫彼此划清界线，甚至互相揭发。当时，魏金水对江一真说：“我要上台揭发你。”江吃惊地问：“你揭发什么？”魏说：“还没想好。”江说：“反正就是那么一些事情。我也要揭发你一点，不然过不了关。”但又接上一句，“大家凭良心、党性说话。”这真好似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又是何等的辛酸和无奈，它刻画出了那个时代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后来在甄别平反时，江一真当着魏金水的面说：“对魏，过去我是有意见的，他不该在斗争中经不起压力，没有坚持做到‘五不怕’，特别是张（鼎丞）老代

表中央找我和魏一起谈话时,他还不说出真相,当时我确实有一肚子气。但是反过来一想,斗争的逼供信压力确实太大,也难怪,同时他所编造的那一堆材料也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而现在经过传达中央精神后,他已经觉悟过来了,认识了过去的错误,主动推翻了自己所编的那一堆假材料,因此我对他的意见也就消除了。”魏金水听后,泪光闪烁。在后半生,他们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又如江一真被批判后,他年轻的秘书张明俊也被勒令搬出江的住地汤井巷,接受隔离审查。江一真默默地送他至草地上,忽然大声说:“张明俊,我没想到这么大的运动你都顶住了,没有胡说八道,好样的。”这又是何等地悲愤,何等地欣慰,何等地希望啊!

又如在江一真平反后,被任命为农垦部副部长。他在离闽之际,曾致信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第二书记范式人,其中有云:“北方气候较冷,我全家都要补充一些冬装,希望能在这里得到解决。近年来因花钱计划不够,以至欠省委行政处500元债务,我拟用500元未到期的公债票来归还。”经叶飞、范式人同意,商业部门于是补助了60多丈的布票、30斤棉花,人事局从福利费中支出200元作补助。这里写的是江一真向组织上要补助,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封疆大吏”的两袖清风,实事求是,光明磊落,一生正气。这样画龙点睛的细节不在少数。正是这许多细节的真实与生动具体,使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由概念堆积的江一真,而是一个举手投足、喜怒哀乐的江一真。

江一真和叶飞

过去的一些传记中在表现当时路线斗争下同志与同志、人与人、批判者与被批判者、胜者与败者之间的关系时,每每绝对化,甚至黑白化、敌我化。其实,在那一个时代,由于个人崇拜下的极左路线,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无可选择地卷入那个路线斗争的怪圈,甚至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常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感叹。如十大元帅都难以幸免这种情况。1958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彭德怀、林彪等以“教条主义”的罪名整刘伯承、叶剑英、粟裕等。一年之后,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林彪、贺龙等又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将彭德怀

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林、贺因之被擢升。其中贺龙为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案组组长。然在文革中,贺龙先于彭德怀被迫害致死。1970年8月,林彪在另一次的庐山会议上犯路线错误,并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仓皇出走,机毁人亡于蒙古温都尔汗。朱德、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建国后的历次党内斗争,文革中无一例外因“大军阀”、“带枪的刘邓路线”、“二月逆流”等罪名被批判、甚至斗争。元帅尚且如此,况乃余子。于此,这个斗争的怪圈可见一斑。于是,一些人物传记中就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此书甲白乙黑,彼书甲黑乙白;此书扬甲隐乙,彼书扬乙隐甲;从而在党史人物总体认识上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当然,这类矛盾的性质是多类型、多层次的,要分别对待。应当说叶飞是罗织所谓的“江魏反党集团”的领导者、第一责任人。但这是大势所趋。在文革中,他又作为福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率先被打倒。于是,传记没有将叶江之间的矛盾黑白化或漫画化。它一方面对叶飞反右倾、反江魏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与否定,另一方面又对叶飞的错误和之所以犯错误作了用心良苦的解读。这方面列举的事例是有说服力的。

如叶飞和江一真并无宿怨,反而有一段关系十分融洽的美好时光。在劫波渡尽之后,江一真还回忆道:“1959年2月6日前,我和叶飞相处近十年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一贯对他尊重,我一直认为他有许多长处值得人学习,而他也一向认为我是一个有能力、有干劲、肯钻研的干部,所以他一直是支持我做好工作的。他曾经再三要我实际上担当起省委第二书记的责任,1959年初还支持我担任福建的省长。另外,过去他还两次同我谈过,将来要让我继任他的省委第一书记工作。”

又如在江一真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下放到三明钢铁厂后,江上虹、江上舟兄弟还留在福州上中学。假期回三明团聚,江上舟告诉父亲一个小秘密。叶飞的夫人王于畊阿姨有次请他们兄弟俩去家里吃饭,哥哥有疙瘩不去,他只好一个人去了。江一真说:“还是你懂事,你哥哥怎么能不去呢?有什么疙瘩?大人的事你们小孩不懂,也不要管,得对长辈要至始至终有礼貌。”

又如,该书所描写的叶飞后来对此案的甄别平反、赔礼道歉、反躬自省也是发自内心的。在

平反的常委会上，省委主要领导诚恳地说：“省委对江魏卢三位同志的错误斗争，以及对一些同志的错误斗争，首先由我负责任。因此，今天我在这里向常委全体同志，向中央，作检讨。我还准备在五六月省委扩大会议上，向江魏卢三同志，及向所有被错误斗争的同志表示道歉。”他承认并自我批评了自己作风不民主、有“霸王”态度等问题后，指出，江一真在1958年底、主要是1959年上半年，在工作中同自己有分歧，有争论，这是正当、正常的。“问题出在我没有好好倾听江和同志们的意見，没有把不同意见拿到书记处、常委会上好好研究，这是由于集体领导不健全，没有民主作风，我的家长制领导。因此，把工作中的不同意见，看做是路线上的分歧，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传记也不忘记下这一笔：江一真驾鹤西行时，家属遵其遗言不作遗体告别，只在火化前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送别式，许多老同志闻讯而来，叶飞也主动前来为老战友送最后一程。

关于叶飞在江魏问题上之所以犯错误的原

因，传记引原省委书记林一心话说：“我不认为叶飞是有意整江魏，他与江魏过去并不认识，既无宿怨，也没有私仇。他不过是随大流。不跟着反也不行，而且当时会上几乎完全一边倒，有几个人头脑不会发热呀！举国上下此起彼伏的各种运动，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叶飞难免眼花缭乱，即使有火眼金睛，在紧箍咒下也只能看错。搞运动既非叶飞的初衷也非长项。”

在河北省工作时的省委常委之间的矛盾亦可作如是观。当然，文革中与四人帮的斗争另当别论，那是法制与犯罪的斗争。

窃以为，该传记这一党内路线斗争、特别是中下层路线斗争的表现模式堪为治党史者法。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江一真一生求真，一生心系天下苍生，一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于先贤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责任编辑 萧徐）

广 告

大午温泉度假村

大午温泉度假村位于保定市徐水县，距北京110公里（京石高速徐水出口），是以大午温泉地热井为依托兴建的一处园林美景。

大午温泉地热井深3003米，井底水温62℃，出井水温56℃，日出水量达1200立方米。温泉是地壳深处经过几亿年的蕴酿而成，含有多种具有活性作用的微量元素，如钙、钠、镁、钾、锶等离子，有一定的矿化度。大午温泉水质卓越，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

大午温泉度假村地处乡村田野，绿树环抱，鸟语花香，清幽娴静，远离尘嚣，初入使人有世外桃源之感，可谓“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若天成”。度假村下设温泉贵宾馆、温泉佳宾馆、温泉游泳馆、温泉露天池及大午企业文化主题公园，馆内设休闲大厅并配备大、中、小型会议室，集温泉泡浴、按摩保健、休闲娱乐、会议接待、餐饮住宿、度假旅游多功能于一体，可观赏田园风光，品尝乡村野味。宾馆高档舒适，价格低廉，服务超值，适合工薪阶层全家出游，更适合离退休老人的休闲疗养。

“古有武陵源，今有大午城”，大午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诚实善良的大午人，欢迎您的光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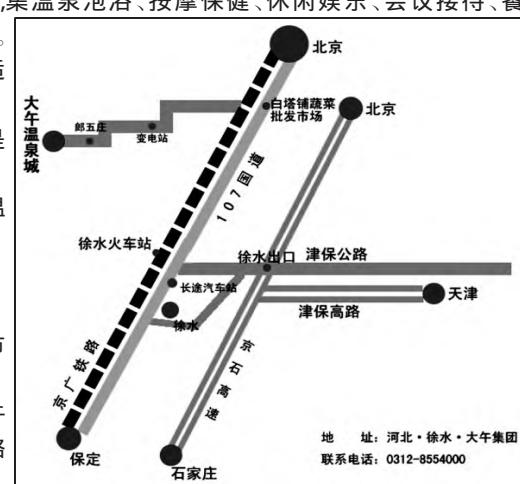
客房价目：大午庄园标间60元，温泉佳宾馆标间280元（含温泉门票48元）。

地 址：河北省徐水县河北大午农牧集团

联系电话：0312-8554000 8554999

自驾：京石高速徐水出口下，沿107国道北行至白塔铺蔬菜市场，沿大午集团指示路牌西行5公里即到。

火车：从北京西客站搭火车到保定火车站或徐水火车站。大午温泉度假村距徐水火车站5公里，距保定市25公里。保定市12路公交车直达大午温泉度假村。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重读《李鸿章传》

● 章立凡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上中学的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耳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细品之,则非梁任公之视角“不同以往”,乃敝人受哺狼奶多年,有幸恢复了人类的独立思考而已。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维新派眼中之洋务派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完成了这篇传记。是年二十九岁的梁氏,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间大有深意焉。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两者有着血脉上的传承关系。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两者的失败皆有其历史之必然性。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除撰写李鸿章的传记外,他还为老师康有为写了《南海康先生传》,并开始自号“饮冰子”。以“饮冰”自励,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两位先进作传,可视为对1860年“自强运动”至庚子之变四十年间历史的冷静反思。梁氏视李鸿章为

“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洋务派冀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改革以不触动封建制度为限,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技治主义”思维。对此,梁启超问道:“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尽管如此,梁启超仍认为:“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他列举李氏奏折中对国家前途的种种深忧切虑,肯定“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李氏的历史局限性:“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

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作育新民”,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为己任,这一任务历时百年仍未完成。历史常有轮回,当此“大国崛起”雄心万丈之际,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种“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时髦的说法已变成了“公仆”)当尽之责任”者,仍大有人在。不学必然无术,身处晚清变局百年后的“学习型社会”,社会转型仍未完成,学习的方向和方法依然不明。

弱国外交之辨

李鸿章谤满天下,始因甲午之役北洋水师覆灭,继之以外交连连失败,以“卖国贼”之罪名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时已逾百年。而梁启超记述李氏之轶闻中,谈及“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这倒很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可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做一注脚。

对李氏之外交风格,西人反倒有“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赞誉,但梁启超持相反评价,称之为“小狡猾之外交家”:

夫手段狡猾,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猾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

上述判断可谓切中要害,李鸿章式的中国外交,无非承袭两千年前的纵横家故智,既昧于世界大势,又无长远坚定之立场,惟偏重于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纵横捭阖为能事。作者分析李氏外交失败的教训说:

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

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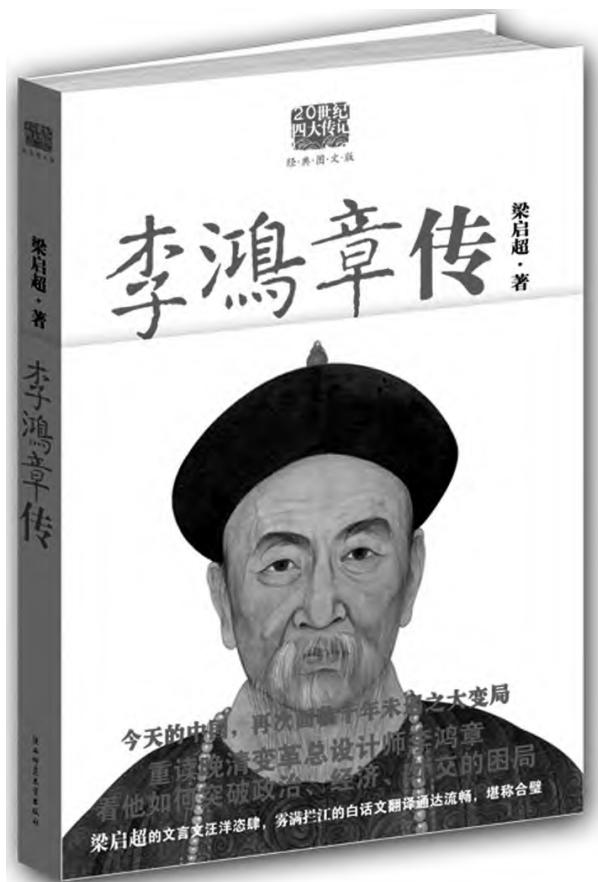
在汉语词汇中,“卖国贼”与“汉奸”似乎略有不同:前者的行为有一定的被动性,主要对其后果负责;而后者则有较强的主动性,意味着彻底的卖身投靠。中国士大夫饱读圣贤之书,无不知晓春秋大义,纵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晚清名臣,个个算得上一时人杰。但形势更比人强,列强环伺,兵临城下,不签字画押割地赔款,仅仅靠玩弄“战国策”式外交伎俩,是过不了关的,李鸿章逝世前一小时,俄国使节还来催逼在密约上签押。

弱国确无外交,强时未必有之。梁氏云“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确为灼见。清代出卖的国家权益,国民政府时代已开始收回,但被强邻陆续侵占的国土,如今已是彻底交割,永无回归之日了。

专制体制之弊

李鸿章以一介词臣入幕,平发捻、办洋务、创海军、主外交,位极人臣,其见识才具,远超同僚之上。但观其一生功业,论武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论洋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论外交,则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一言以蔽之,输在其背后的专制政治体制。作者试图从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入手,分析其致败的根本原因:

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



李鸿章立体书

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

他指出：“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上述视角，切中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之弊，也提示了晚清满汉民族矛盾最终演变为排满革命之根由。

关于“中国数千年政权变迁之大势”，梁启超从春秋战国说起，下至两汉魏晋唐宋元明，历数中国封建社会由贵族政体演变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之流程，指出：“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他将历代权臣分为贵族、豪杰、布衣、佞臣四类，“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

所谓“教义之浸淫”，作者指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尔后二千年，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至于“雄主之布划”，作者举汉光武、宋太祖以厚秩解功臣兵柄，以及汉高祖、明太祖屠戮功臣为例：“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导致群臣“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梁启超认为：“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之定义及分期，学界历来众说不一。中国秦代以后形成的封建主义，与马克思看到的西欧封建主义是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贵族领主制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西欧有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像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王权、改革法律和司法的范例，由此也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形成之后，皇帝口含天宪，权力不受制约，专制垄断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部族政权之私心

李鸿章是当时内外公认的中国权臣，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作者举李氏与俾斯麦的对话为例，诠释晚清中国的权力结构及李在其中的位置：

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先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

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

说到权力结构,又不得不详析清朝开国以来的满汉之别。梁启超说:

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此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故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

有清一代,朝廷对于满汉大臣的任用,一向是内外有别。清廷擢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员,实因洪杨难起,政权有倾覆之危,时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梁氏指出:“当时朝廷虽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来,虽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并沿袭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权力的内圈仍为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吃饭的八旗子弟则是其外围,形成了一个靠族群血缘维系的特殊利益集团。二百余年岁月的消磨,令这个“弓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尽失,同光以来汉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导的改革,不断触发他们对统治特权及既得利益的疑虑和危机感。

钱穆先生认为清代“可以说是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以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族政权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在这一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1、143

页)

余英时先生指出:清王朝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或曰“族天下”),并有着八旗制度这种严密的组织系统。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他征引据梁启超的记述,指出“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2月号)

由是观察,满清王朝不仅承袭了汉族历代王朝之制度积淀,更兼有狭隘自私的部族政权特性,前期虽经历过康乾盛世的辉煌,但一旦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顿时捉襟见肘。对外既无力保中国,对内岂能保大清?这种部族政权的私心,越到危殆时刻越患得患失,越发认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辛亥革命前夕组成以满清贵胄为主的“皇族内阁”,即是私心与法术的回光返照,令立宪派乃至北洋将士率与朝廷离心离德。武汉首义枪声一响,满朝亲贵束手无策,拱手让汉族权臣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

多年来,影视传媒一直致力于制造大清专制王朝的盛世神话,已属咄咄怪事;近年更有学者罔顾历史,将清王朝吹捧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权,更是不知所云。

余论

梁启超在此书“序例”中开宗明义,自承“全仿西人传记之体”,他批评中国旧传记体裁“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矣”,而司马迁开创的夹叙夹议式列传体裁,“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他愿意继承这一传统。纵观全传体例,分为“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

“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八大主题,议论风发,既提纲挈领,又顺应了历史时序;末章结论中,列举古今中外十五位政治人物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格兰斯顿、爹亚士(梯也尔)、井伊直弼、伊藤博文,逐一与传主比较点评,妙语连珠,极具特色,而将传主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研判,上下五千年,环视八万里,更是自司马迁以降史家所未企及的时空。这种传记体裁开一代之风气,直到民国时代仍不断被人袭用。

全传以文言文撰写,仅六万余字,要言不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反观今日习见之白话传记,冗长拖沓,动辄数十万字,难免有码字赚钱之嫌。时人称道梁氏文风“笔端常带感情”,其感染力与煽动性超过“十万毛瑟”,而讥评者则贬之为“新闻记者手笔”。当时白话文的时代尚未到来,但新闻纸的出现,渐趋白热化的保皇与革命之争,使争取受众、扩大传播成为报刊的生命线,也势将影响到文风的演变。抛开政治观点不论,对照一下革命派章炳麟诘屈聱牙的古奥文字,不能不承认梁氏文笔是近代文坛上最生动的文言文。

这篇传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或可归入新闻性评传一类。作者自谓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为一位刚刚逝世的大人物作传,能做到不存私见、评价公允、褒贬分明,殊非易事。百年后读此传记,仍能栩栩如生地感受传主其人、其时代,非有高屋建瓴的史识、客观公正的史德及纵横驰骋的史笔不能为之,足令后世沉溺于“遵命史学”泥坑中人无地自容。

梁启超的文字,一向带有鲜明的个人文字风格,极具张力。在一些总结性论断中,经常用“吾敢言”、“一言以蔽之”一类词句,透露出一股咄咄逼人的自信,殆非有真知灼见者所不敢为也。他总结李鸿章洋务、军事及外交失败,在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在

批评了李鸿章的失误之后,他笔锋一转,又扩展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关于个人品格才具,梁氏断言李鸿章乃“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他直指“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为中国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尽管如此,“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他预见到“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十年后,清王朝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鉴往知今,学习洋务皮毛、改良经济而不改良政治的结局,是一面历史明镜。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纵观三十年来新一轮的历史大循环,不见了随亡国灭种危机而来的改革紧迫感,经济建设已有长足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蹒跚。一百多年过去,中国仍未建成一个民主宪政的公民社会,梁任公“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

2008年11月18日北京风雨读书楼

(本文是梁启超著《李鸿章传》一书的重版代序,出版时作了某些通俗化的修改,这里发表的是原文并更换了标题)

(责任编辑 徐庆全)



这个疮疤揭不得

● 张 鸣

现在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运动是什么？运动就是严酷的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是自上而下营造的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这种恐怖，几乎没有可以抵挡，所有的人都像是被困在陷阱里的困兽，唯一的本能就是自保，在极度恐惧中的自保，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运动中，人人都不太正常，被整者如此，整人的人也如此，从前称兄道弟者，可以反目相向，过去笑容可掬者，转眼冷若冰霜。任何人都不能信任，任何人，哪怕你的至亲好友，都可能通过告发你，挣得一点自保的本钱。夫妻、父子互相出卖都不新鲜，更何况朋友。苏联肃反，有专政机关，有秘密警察，中国的运动，基本上用不着这些专门机构。警察出面，往往是在运动收尾的时候，真正的秘密警察，也许就睡在你的身边，他们不拿工资，没有经过训练，甚至没有接受指令，人人自觉地卖出了自己的亲人朋友，还往往以为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

运动就是一个剧场，一个可以活生生上演杀人、伤人、逼死人命的剧场。所有人都在剧场里尽心尽力地演出，这一场扮演整人的，没准下一场就变成了被人整的。剧场里不分生旦净丑，各种角色，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一种是百分之五的坏人，任何人都不知道那百分之五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为了争取让自己被归在那百分之九十五里，都得拼命地表现，只要那百分之五的角色显露出来，就同声讨伐，越是站在边缘上的人物，表演得就越是积极或者说激烈，背后的告密，也越是动作频频。

运动是个绞肉机，这个机器的动力，居然有部分来自于被绞的肉，那些被整的人。即使是被投入到机器之中，还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努力表现，你可以爬出来，变成那百分之九十五。于是，背上打了红字的人，就拼命地爬，拼命地劳作，百倍的

努力，万倍的辛劳，同时也拼命地检举揭发告发同类，用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果敢的行动，向机器的操作者表明，自己其实跟被绞的肉不是一类人，原不该经受这样的磨难。

这样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关键在于运动的设计和发动者，占据了绝对的道德制高点。所有的运动，都是以人民和人民事业的名义进行的，绝大多数被整的人，也认可整人者的这种名义。在这至高无上的名义下，无论干的事多么荒唐，被整者有多大的冤屈，至多敢抱怨一下具体的政策偏差或者整人者的素质，决不敢怀疑运动本身。当年可以在国民党军警面前拍案而起者，不畏杀头，不畏强暴，但进入运动场景，就只能束手就擒。只要被整，无论看上去有多大的冤屈，环顾四周，都是横眉冷对，同仇敌忾，所有人，包括你的亲戚朋友，都认为就是你有罪，群众的声音，印证了整人者代表人民事业的神话。极个别清醒者的呼声和被整者的呻吟，都很快被淹没在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泡沫都起。

当然，这样的运动，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条件。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扫荡到了社会每一个角落，把每个人都组织到国家控制系统之中，连没有工作的大妈都有组织管着——街道居委会，没有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寸步难行，即使有钱，也得饿死。不合作，不屈服，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躲进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做白毛女。整体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每个城里人都万分珍惜自己的城市户口，只要有人威胁将你下放，不再管饭，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如果真的判了刑，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么，就等于死了一样，即使活着，也是行尸走肉。

这是一种别样的恐怖，深入骨髓的恐怖，挟带着道德正义的恐怖。运动中，没有人敢不积极，不积极意味着自己兴许就会挨整，运动中，也没有人

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么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罢了，你的家人怎么办？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连串的株连，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沾边就会遭殃，自己的亲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赶紧跟这种人划清界线。

吊诡的是，从历次运动的实践来看，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公开的揭发、还是背后的告密的人，只要是被整者的亲朋好友，并没有因他们的被动揭发或者积极揭发，私下的小报告，最终逃脱挨整的命运，反革命的妻子揭发反革命，无论怎样彻底，把床头话都贡献给了组织，还是反革命臭老婆，右派的朋友揭发右派，最终也是右派，身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人，检举身边的人，照样不能让自己脱罪。甚至组织有意安排的眼线，下场也并不好。但是，这样的揭发告密，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只要运动一来，大家就按照过去的模子走。显然，这些人其实没有其它的选择，尽管一次次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但是只要存在一丝希望，一丝自我脱罪的希望，这些人就还会这样做。

在运动中，不是没有清醒者，也不是没有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百倍地敬仰。但是，每个人都有弱点，即使品德高尚之辈，在人民事业，国家利益的面前，都是可能被说服的。即使每个人告密揭发别人的动机不高尚，也不纯洁，纯粹就是为了自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摊上的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陷阱，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

文人也是人，而且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脆弱

(上接 50 页)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美]德里格：《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377-378 页。)“包含自治与议会程序的复杂形式的自由主义政体，除非是在一个起码能容忍各种不同利益互相对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不致引起永久分裂的社会里，是不能运转的……说自由主义无力医治在内战中挣扎、主权正受到威胁的中国的疾病还不够，应该说这些疾病的严重性使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中国生根。”([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879 页。)因此，有研究者断言，

的人，也是被历次运动重点关照的人，他们中的告密者，互相撕咬者，甚至可能比普通人更多。这些人活到今天，人性已经复苏，回首往事，肯定会比普通人更加羞愧，羞愧到无法正视自己，既然无法正视，自然必须选择逃避，忘却，否则，怎么可能有勇气再活下去？我相信，这些告密者，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无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运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无论如何都走不到那一步的，其实，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同类事的人，审视一下自己，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如果我们也给抛到那个可怕的剧场，那个绞肉机里，我们能不能保持气节？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当年活下来的曾经的告密者，都垂垂老矣，剩余的岁月不多，当年的疮疤，留在被害者身上，也留在了他们心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特殊的岁月里，这样的告密，揭发，几乎无处不在，几乎所有吃国家饭的人，都会面临对组织交代自己以及其他问题的尴尬，如果全部追究起来，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柏林墙倒塌之后，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当年的东德出现过，毕竟，那是一个特殊政治场景造成的疮疤，这个疮疤，至少在目前，揭不得。

道理很简单，在一个无法自由言说的时代，一个档案不公开的时代，信息不完全，只凭着透露出来的部分档案或者传言，就互相揭底，根本无法有充分的讨论和对真相的追究，最后只能是当年的受害者或者家人互相火并，在个人道德上纠缠，从而忽略了对体制和运动本身的批判。

(责任编辑 萧徐)

虽然“有些人私下仍然珍惜着一些未经精确界定的自由思想与价值，但是，自由主义——如果把它当作一个自觉的运动来看——简直可以说在中国已经死灭。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甚佳的理由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无前途。的确，在五四时代初期盛行的脆弱的自由主义的理想，早已被来自左派与右派的势力所摧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 1988 年，第 161 页。)但是，自由主义历史也证明，自由主义就是一面镜子——它能存在的环境，必然是言论自由的社会、和平发展的世界、经济繁荣的时代。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无须掩饰的败笔

● 肖 荻

素所景仰的文化老人黄苗子、冯亦代等先生,经章怡和《谁把聂绀弩送进监狱》、李辉《写好一个‘人’字》等文章对其当年在运动中卧底告密等往事的梳理和曝光,令人愕然、痛惜、责备……比见到一个坏人做坏事,还要百感交集。众说纷纭中有一种看法是:“那段历史就像一部绞肉机,有多少人能问心无愧?”似乎是善恶难分、一团乱麻。好在那段历史,银发一族很多人都“欣逢其盛”,个中款曲并非“不知有汉,遑论魏晋”。那么,难道当时就只剩下“告密自救”这一条路了吗?

1968年夏文革高潮时,我因在五七年鸣放中由于发言“监督执政者是报纸天职”,被定为“鼓吹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已被流放十年,忽有两位彪形大汉从市里去劳改农场,拍着桌子要我提供当年曾在《天津青年报》主持整我的王仁(当时天津团市委副书记)和谢国祥(当时报社一把手)两人的罪行。在长达一小时的“提审”中,来客高声定调:“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到了,对那两个‘王八蛋’要彻底揭发!”忽而娓娓诱导、忽而怒目逼供,几近施以老拳,但我始终不置一词。做人是要有底线的。捕风捉影、陷人不义素为我所痛恨,我怎能又胡编八造、施之于人呢?对此我甘居“沉默的大多数”。那二位斗士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在这方面胜我者多多。黑云压城如文革,在通过决议要开除刘少奇的会议上,就有陈少敏伏案装睡硬是不举手,宁可为此付出重大牺牲。无限“扩大化”如反右,《人民日报》女记者刘衡对右帽横飞抱不平仗义执言,宁可为此陷入深渊,直至被威胁要活埋她,她高昂头颅。至于张志新、林昭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绝不把自己的生存植根于他人的血泊中,更为众所周知。以我曾和数百名老右昼夜同处大熔炉20余年所体会,处于当时左的高压下,可有仗义执言、沉默不语、出卖他人三条路,绝非仅剩下一条加害他人又自我作践的独木桥。

黄苗子等几位明慧胜我万倍的文化名人,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在运动中竟然选择以出卖他人来减轻自己处境的路子,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人生败笔。这几位老先生文学成就斐然,我给以足够的尊重。但,如果像有人所

说的,对其不义之举应以“大智慧、大慈悲”予以理解,那就太矫情了吧?邵燕祥先生曾以《人生败笔》为名出书袒露当年被打成右派时期的“自我检查”,真实地展现出在权力打压下痛苦挣扎的灵魂,以警后世,这是一种勇敢与豁达。败笔就是败笔,没有什么可掩饰、可冲淡的。邵燕祥的自我袒露,与那种卧底告密之举,或可均称“败笔”,其品格则有天壤之别。

但,黄苗子等人的败笔,透视其背后纵深,仅仅是其个人的品格问题吗?那几位学富五车且素来正派的文化老人,个人难辞其咎,但也足以见证当年的斗斗斗那无所不用其极的高压,其压榨和扭曲心灵的力度是何等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在加害他人之后就安之若素了吗?未必。1979年我在被改正回报社之后,听到一个令我震撼的故事。22年前反右斗争如火如荼之际,《天津青年报》一个开始沉默、后来被“动员”发言对我开火的人,后来竟抑郁而死。去世前他把心事哽咽诉诸一位自己信任的人:“解放前我在南开中学初中读书时,亲眼看到地下党员、担任学生会主席的肖荻,在反蒋学运中很积极很活跃,那时我就崇拜他。反右时报社一把手非叫对我他进行揭批。白天我勉强发了言,夜里我蒙着被子痛哭不已,我对不起良心!”他还说:“自那以后我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后来我被调出到一个中学工作,才知道那位一把手在我档案里照样给我签署了恶评……”,歉疚、自责、失落,使他患上忧郁症,常年辗转反侧彻夜失眠,终于英年早逝。听他倾述的老同事胡世先同志一五一十告知我时,我不禁潸然泪下。好人,竟落这么个结果。这就是当年“运动文化”的真滋味,它使人心灵异化、行为变形,留下难以泯灭的自责和创伤,直至弥留都不能解脱。显然,其愧疚、无奈和沉痛,一似三年灾害中河南信阳饿极了的妈妈煮食孩子的尸体,是不会有咀嚼的愉快的。这不是当时一个零星个案,而是一代人漫长的心路历程,冯亦代到92岁时终于在《悔余日录》里以极大勇气吐出了梦魂缭绕几十年的心中块垒,杜高在李辉整理《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时,他流着泪看完当年那些

互相揭发、揭秘的材料,断然同意出版问世。如鲠在喉,一吐为快。我想象,明智如黄苗子到阴间见了聂绀弩,怕也是伏地请罪吧?有什么比心债更让人难受的呢?中国文人向来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圭臬,以耿介、狂狷、高洁为追求。屈原的孤高、介之推的冷峻、比干的决绝、董宣的强项、董狐的史笔、鲁迅的犀利……戏曲《赵氏孤儿》中程婴的舍子舍命、《秦香莲》里韩琦的仗义自裁……正是这些代代相传、义薄云天的精神,构成了在举世所有文化中最具延续性的中华文化,并深深渗入中国人的脊梁骨。无论是五千年来义薄云天、筚路蓝缕,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绝地反击、誓死拼搏,靠的就是这些民族精神。当年一次次左的高压,其破坏性固然表现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尤为阴鸷的是各种“横扫”、“砸碎”、“批倒批臭”、“踏上一只脚”,彻底摧毁了道义和崇高。一个文人从心地高洁、志在千里一变而为无棱角、无骨气和良知泯灭,其窝囊和苦涩不亚于肉体的自杀。而“缺乏道德血液”这一远比GDP多寡还要致命的民族大患,也就在那时“打成”了!

1999年人民日报社老干局组织云南游,在丽江途中王若水先生曾和我谈到异化的问题,他说:“眼下一些官员本应是人民的公仆,但他由于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民、凌驾于群众之上,变成了人民的老爷,这不就是异化吗?文革中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有些人疯狂迫害他人,实际变成了狼,而领袖则被神化。这三种情况都是人性的异化:异化成鬼、异化成兽、异化成神。我提出人道

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性,要提倡人道主义,反对兽道主义和神道主义。”醍醐灌顶!其实,如今某些官员的“异化为人民的老爷”及其种种无行,与文革中在疯狂打压下把人性异化为鬼、兽、神,全然是一脉相通的。当年运动中那些道义的积欠、是非的混淆和决策者、执行者、操作者上下交错的各种缺乏梳理和清理的道义“沉淀物”,并不会自动消灭得无影无踪。它会不断地发酵,并不断衍生出种种潜规则、腐败链等诸多新变种,猖獗地迫使社会付出天文数字般的代价。是的,由于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我们仍不乏见义勇为、愤世嫉俗、可歌可泣的英雄。但,道义不彰的旧溃疡与钱权交易的新病毒合流,形形色色人欲横流、道德沦落的泛滥,如今已达到千奇百怪、骇人听闻的程度。陈良宇官至政治局委员还去搞腐败,程维高权至省委书记竟将反腐义士劳教,六旬劳模田文华靠毒奶害人发财,最近习水一些官员和教师竟堕落到奸污幼女……呜呼!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精神、没有追求、没有崇高,即便是富了,只能是贪婪无餍的四足经济动物,只会制造爆炸性的穷富差距。振兴中华,也要振兴道德,跋足走不了万里长征。此中死结在哪里?当其事者心知肚明。不能都像黄苗子、冯亦代有关事件这样时隔半个世纪后才以偶然形式被钩沉、被化解,那付出的代价和利息就太大啦!

化解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道义“沉淀物”复杂吗?权衡利弊,事在人为。(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第5期《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补遗纠错

增补: 安徽省 郑玉林、高本华主编:《中国人口》安徽分册记载,安徽在建国后的30多年间出现两次死亡高峰:第一次死亡高峰是1954年因特大洪水成灾而发生的,该年死亡人数达51.55万多人,死亡率为16.60%;第二次死亡高峰是1958年至1961年,其中1960年死亡人数达220多万人,死亡率高达65.58%。另据2005年9月12日,中国国家保密局、民政部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的数据,1959-1961年间安徽省总人口净减439万人(载《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11月18日第16版《新中国最惨痛的灾害记忆——三年大饥荒》)。

纠错:

天津市的数据包括:市区、郊区、市辖县在内。1959年死亡人数:市区25221人,郊区8930人,郊县20943人,全市共计55094人,死亡率为9.88%;1960年死亡人数:市区23553人,郊区7253人,郊县28679人,全市共计59485人,死亡率为10.34%;1961年死亡人数:市区24919人,郊区8796人,郊县24030人,全市共计57745人,死亡率为9.89%(1962年回落到7.36%)。(李竞能主编:《中国人口》天津分册,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河北省 1959年死亡人数462364人,死亡率为12.29%(1958年为10.92%);1960年死亡人数599458人,死亡率为15.84%;1961年死亡人数516288人,死亡率为13.63%(1962年回落到9.06%)。

吉林省 1959年死亡17.4万人,死亡率为13.4%(1958年为9.1%);1960年死亡13.7万人,死亡率为10.1%;1961年死亡16.9万人,死亡率为12.0%(1962年回落到10.0%)。(曹明国主编:《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

江苏省 1959年死亡62.19万人,死亡率为14.55%(1958年为9.40%);1960年死亡78.59万人,死亡率为18.41%;1961年死亡56.68万人,死亡率为13.35%(1962年回落到10.36%)。(杜闻贞主编:《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59年死亡115992人,死亡率为18.84%(1958年为13%);1960年死亡104618人,死亡率为15.67%(1961年回落到11.71%)。(周崇经主编:《中国人口》新疆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共运史上党报批评党领导机构的争论

•
靖
鸣

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问题,实际上是党报与党的关系的处理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我国几代党的领导人在理论与实践中都进行过认真的探索和总结。它涉及到党的自身建设、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各项事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160多年来国际共运实践始终都未能很好解决,其争论和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固然有许多因素起催化作用,然而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它们普遍存在没有处理好党报(媒体)与执政党的关系问题,违背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监督的原理,剥夺人民群众和媒体对党和政府批评和监督的权利,导致其形成不被监督的特殊阶层,腐败加剧,最终丧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我国党报(媒体)与党的关系的问题也始终未能很好解决。对国际共运史上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论作一粗浅描述和分析,希望能引起人们对处理其关系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倡导党报开展批评的理论与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报刊应当在履行社会监督职责方面表现出大公无私,毫无顾忌,因为“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忌,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注1}他们主持的《新莱茵报》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对敌人,该报的揭露毫不留情;对中间派、同盟者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缺陷,报纸的揭露同样毫不留情。马克思主编的世界上第一份无产阶级报纸《新莱茵报》是以“民主派机关报”的副标题出版的,然而恩格斯指出:“我们认为在德国民主党成份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对民主党人进行最严格的监督,正是绝对必要的。”^{注2}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应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时,既强调党报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也强调党报对党的领导的监督,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马克思主义舆论监督观认为,批评和监督无产阶级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的错误也是党报的权利。

马克思恩格斯对报刊批评也不是随心所欲、无所限制的,根据自己多年党报工作的经验,他们对党报如何正确履行监督批评的使命,提出了下列原则:

首先,党报开展监督和批评,要公正和坦率。恩格斯直到晚年还一再表示,如果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做了对党有严重危险的事情,党报就应该对之进行批评,他本人将“坚决站在编辑部这边”。^{注3}他还指出,为了党本身的利益,这种利用报刊对党的机构和党的官吏的监督应该是经常性的,批评必然是最坦率的。

其次,党报批评不能违背道德、党的纲领和党的既定策略。对不直接从属于党执行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的党的刊物,他们批评的范围可以更大一些。恩格斯认为,这种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注4}

第三,党报批评要注意不使敌人获得“窥视内幕”的机会。

第四,党报进行批评还要注意把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和整个党的错误区别开,把责任分清。恩格斯认为,党的官吏可能犯这种那种错误,但整个工人政党却在前进。对官吏的监督和批评,不应影响对整个运动和整个党的机构的看法。^{注5}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利用党报党刊对党的领导人进行公开监督和公开批评,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当时党已经有力量经受公开批评的打击,已经坚强到足以用自己的力量通过批评纠正自己的错误。恩格斯举例说,党的领导人在航运津贴案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俯首听命的庸俗作风,党是用自己的力量借助批评纠正的。其二,群众有能力开展批评并使这种批评收到良好的效果。当《社会民主党人报》由于批评党的领导人错误而陷入困境时,恩格斯建议编辑请群众出来讲话,让“党内同志根据惯用的‘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去进行批评”。到那时候,“愤怒的风暴”就会从四面八方掀起,而这些领袖们就会“真正大出其丑”。^{注6}其三,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袖人物进行民主监督,是党的报刊的使命,也是包括党报工作者在内的每个党员的民主权利。恩格斯特别强调,在党内,没人可以超乎批评之上。^{注7}

恩格斯认为党报对党的领导成员应有监督的作用,甚至有责任让党员群众有机会在报纸上表示党团无权阻止做什么事情。^{注8}

鉴于当时德国党的领导人在党内批评问题上主要倾向是反对甚至压制党内同志对他们进行批评,恩格斯在这一时期谈及党内批评问题的言论中,有不少是分析党的领导者为什么是可以被批评的。恩格斯认为,党的领导人不是凌驾于全党之上、主宰党的命运的主人,而是受全党委托、担负某些重要职务的仆人。因此,他们的工作理应受到全党的监督。恩格斯在1891年2月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善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注9}

恩格斯曾经说过:“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注10}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是靠批评(包括自我批评)来维持生

命力的。因为只有通过批评才能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纠正自己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以便学会更好的工作。对党来说,这样做“要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维更有益处。”^{注11}

而对于那些影响到党的纲领、路线的重大的政治上、理论上的错误,对于那些“对党有严重危险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只要条件允许,就必须在报刊上公开批评。^{注12}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党报的批评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既是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的积极的理论先驱和倡导者,也是热情的身体力行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并勇于与反对者进行斗争。《新莱茵报》创刊后第二天,马克思就在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民主派过分陶醉于最初的胜利”,因而在当时进行的革命中“遭到了失败”。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曾经行使党的执行委员会权力,它是不情愿接受甚至压制党报对其批评的。议会党团压制党的报刊对它进行批评的突出例子,就是所谓的“凯泽尔事件”。1879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议员麦·凯泽尔经党团准许在国会发表了为俾斯麦政府提出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由于这是一个有利于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而有害于广大人民利益的法案,马克思称凯泽尔的辩护演说是“可耻演说”。为此,希尔施在《灯笼》周刊上发表文章批评麦·凯泽尔违反党的纪律。可是党团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指摘希尔施在报刊上批评党团成员是违反党的纪律,要对希尔施实行检查。

党团这种压制批评的行径,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为了维护党的报刊开展党内批评的正当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在“通告信”中陈述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指出:党团压制希尔施对凯泽尔的行为的批评是极其错误的,是违背党的原则的。^{注13}

1884年底,俾斯麦从活跃德国殖民政策的利益出发,要求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多数迫使党团决议准备投票赞成航运津贴。《社会民主党人报》谴责党

团中的这一机会主义立场。党团声明报纸无权批评它的活动。党团对党报是否有权批评党的领导机关提出异议。这个声明公布以后,报纸编辑部收到各地党员寄来的大量信件和各地方组织的决议,抗议党团的错误立场和对该报的攻讦。“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斗争继续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编辑部得到了德国内外的党员同志们的有力支持。”^{注 14} 党团多数被迫让步,1885 年 4 月 23 日与报纸编辑部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任何限制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多数提出以帝国国会接受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国会拒绝了这些建议以后,党团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联合声明特别指出,任何限制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

马克思著名的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及其领导人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是发表在该党的党刊《新时代》上的。^{注 15} 这一著作的公开发表,使得包括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在内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大为不满,他们企图强令这一期《新时代》杂志全部停售,并警告它:今后不准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恩格斯对党的领导机构的这种错误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决不应当把党的报刊“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注 16}(按:“反社会党人法”已于 1890 年 10 月 1 日废止)。他在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说:“你们曾企图强制阻止这篇文章发表,并向《新时代》提出警告: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就得把《新时代》移交给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管理并进行检查,从那时起,由党掌握你们全部刊物的措施,不由地使我感到离奇。既然你们在自己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1881—1888 年任俾斯麦政府内务大臣——引者注)有什么区别呢?……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注 17}

恩格斯在这里明白表示,他反对党的领导机

构用强制的行政手段对待党的报刊:党的领导机构应该对党的报刊保持道义上,也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影响,而不应该在党内“实施反社会党人法”,在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并且能够合法地进行活动的条件下更应该如此。^{注 18}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当时德国党的党报对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批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的。从后来的共运史看,这个问题具有共性,表现出东西方共产党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的害怕、抵制新闻批评的特征,当然非共产党人中也存在同样问题,这也是人类共同的特性。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和解决,永远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而我国有的学者就恩格斯晚年对于德国党和党的报刊关系的论述,认为“是在他指导德国党的刊物批评德国党中央的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作出的,是针对德国党中央的情况和德国党报刊的状况提出的,是特定情况下的历史产物。其中虽有反映党的报刊工作的一般规律,以及反映党和党的报刊关系普遍性的东西,但是确有一些结论带有明显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注 19} 认为当时世界革命运动重心所在的德国党是在野党,恩格斯的论点‘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党报面临的新情况,是值得仔细考虑的。’恩格斯当时是国际共运不容争辩的领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不属于哪一个党,不担任哪个党的领导职务,也没有直接掌握的报刊。他同德国党有特殊的关系。德国党刊《新时代》同德国党中央关于是否刊登《哥达纲领批判》一文的争论,是在恩格斯亲自指导和强有力支持下进行、并且取得胜利的。如果没有恩格斯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国际裁判’,《新时代》能在争论上获胜吗?德国党中央能容忍《新时代》的批评吗?现在国际共运中,根本不存在恩格斯这样的权威。”^{注 20}

笔者不以为然。恩格斯强调尊重党的报刊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虽然针对的是党刊《新时代》,但是不能将其看成是一个个案,否则我们就不能全面客观的分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试想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有哪一篇不是就具有典型意义的具

体问题推而论之进行的分析和论述呢？“德国党是在野党”，既然处在无执政资源的在野党的地位的党都能够开展对党的领导机构的批评，理由是“当时党已经力量经受公开批评的打击，已经坚强到足以用自己的力量通过批评纠正自己的错误”，那么，一个建党八十多年、建国六十年，拥有数百万人民军队和七千万党员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还“面临”什么“新情况”，惧怕其党报(媒体)对自己进行批评？另外，没有“恩格斯这样的权威”就是不开展或拒绝舆论监督的理由吗？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党内外难道没有“恩格斯这样的权威”吗？假如当时《新时代》的争论没有获胜，能反证党报党刊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及其领导人”是错误的吗？试想，恩格斯如果在世，他又如何评论这一高见？

列宁等人关于党报批评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的思想与理论

我们知道，20世纪初，列宁根据党和党的报刊工作的新情况，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认为新闻事业应当成为党领导的“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党的一切报刊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的组织上的领导和监督。^{注 21}

但是列宁在如上原则下，又提出具有创造性地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领导人)的理论，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监督思想。

列宁一向把利用报刊开展不同意见的讨论，把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看成是实行党内民主的重要手段，并把它们作为形成和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策略，巩固党的团结和增强党的统一的重要手段之一。列宁认为，工人政党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和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是一种正常现象，党的报刊没有任何回避、粉饰的必要。相反，应当为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提供保证，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允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观点的文章，以便帮助人们清楚地认识所争论问题的实质和意义，以便尽快地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获得统一。由此表明，在列宁看来，党内正常的争论和批评与党对报纸的绝对领导不是对立的，不影响报

纸的指导、组织等作用的发挥。只要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是完全可以自由进行的。

列宁十分支持在报刊上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批评。1900年，作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主要编委列宁，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要使我们的机关刊物成为观点不相同的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讨论一切问题的机关刊物。我们不但不反对同志们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相反地，我们还打算用很大的篇幅来展开论战。”“我们甚至认为，对显然分歧的观点不作公开的论战，竭力把涉及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这正是当前运动中的一个缺陷。”^{注 22}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不仅要求党的机关报向党内各种不同的意见敞开大门，而且还应该保证党员们自由批评党的中央机关的权利。1904年列宁在致《火星报》的信中指出：“必须给全体党员以尽可能充分的自由来批评和责难中央机关；如果这些责难不会带来抵制，不会拒绝有效的工作和停付资金，中央委员会不认为这些责难是可怕的。”^{注 23}

1906年5月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莫斯科区300多名党员开会，讨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的总结时，就是容许在报刊和群众集会上批评四大的决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孟什维克竭力限制围绕代表大会的决定开展思想斗争，认为只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才是允许的，并根据这个精神提出了决议案。列宁对孟什维克的决议提出了修正。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决定不仅应当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应当在党的报刊和群众集会上进行讨论。经列宁修改的决议案获得大会通过（仅39票反对），次日刊登在《浪潮报》第15号上，孟什维克竭力反对列宁的意见，于是便通过中央委员会针对列宁的修改意见起草了一项决议，对讨论自由、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做出了具体规定。列宁认为这些规定极端错误地理解了党内讨论自由、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关系，立即写了《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发表在《浪潮报》第22号。文章指出：“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是完全可以自由进行的……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宣传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不能分割开的）是不可能的。”为此，他严肃地批评

了“中央委员会对批评自由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规定得太狭窄了；对行动一致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规定得太阔了。”列宁认为当时的“中央委员会的最大错误就是，它没有经过党的刊物和党组织事先的任何讨论”，就决定和公布了重大问题的决议。“事先的讨论本来是可以帮助它避免犯我们指出的这种错误的。”与此同时，列宁又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这本小册子中指出：“如果我们真正决定在我们党内严肃认真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如果我们决定吸引工人群众自觉地解决党的问题，那就应该在报刊、集会、小组和团体中进行这样的讨论。”^{注 24}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支持报纸批评时说过，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是群众性的创作，群众自己应当监督一切，群众的监督有时失败，有时做得不完备，但这都不能成为拒绝群众进行监督，特别是利用报刊公开进行舆论监督的理由。党政领导机关的不良现象时常逃脱工农检查员的耳目，却难以逃脱工农通讯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耳目，因此一定应当使报纸杂志对党政机关实行舆论监督这种可贵的精神发扬光大。

^{注 25}

列宁在《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中说：“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是完全可以自由进行的，不仅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可以在广泛的集会上自由进行。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宣传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不能分割开的）是不可能的。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广泛的集会上，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的‘号召’都是不能容许的。”^{注 26}

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政党从此成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对待自己的报纸对自己的批评？列宁一再强调对党和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列宁精辟地阐明了党内舆论监督和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思想，并积极实践，热情支持党报在维护党的行动一致基础上对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进行批评。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在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郑重声明：“我们

愿意让政府时时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注 27} 同一天，列宁签署出版法令，这个法令指出：“一旦新制度确立起来，对报刊的各种行政干预就必须停止，而将依照最开明与最进步的法律，并在对法庭负责的范围内对出版实行充分的自由。”以后，他曾多次提出党政机关报应当“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毛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毛病。”^{注 28} 同时列宁积极为人民群众利用报刊进行舆论监督创造条件，支持人民群众这种积极性的发挥，并以法令条文的形式保障人民群众的这种积极性不致因行政干预而受到挫折。1918年列宁主持通过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报刊工作的决议还明确规定：“揭露、批评苏维埃机关和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的缺点、错误甚至罪行，是党和苏维埃报刊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注 29}

列宁进一步主张，不论是对党的理论、党的路线或者是发现党在实践方面有错误而展开讨论和批评，只要不是瞒着党组织交给在某种“纲领”的基础上形成的小集团去讨论和批评，而且在党的报刊和党的组织之内进行必要的有益的讨论，党不但不应予以制止，而且应提供保证，创造各种方便条件，让他们有机会发表文章，出版专集。

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列宁始终主张舆论监督权的存在，并且认为少数人有权捍卫和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在论及党内行动一致和舆论监督时写道：舆论监督当然不应当破坏无产阶级的一致行动，“但是，最广泛地、自由地讨论和指责我们认为有害的措施、决定和倾向，这不是行动一致的范围以内的事情。只有进行这样的讨论，通过决议和提出抗议，才能形成我党的真正舆论。”^{注 30}

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报刊活动家卢森堡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不实行最充分的民主，不发动群众通过报刊等渠道对领导层实行舆论监督，那么，政权将会得而复失，资产阶级定然卷土重来。”^{注 31} 她最警惕、最害怕的，是批评社会公仆的自由遭到压制，她一再呼吁：必须保证公众的监督，保证出版自由。她明确指出，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国家机关向官僚制蜕化的唯一保证，唯一可行的途径。她在《论俄国革命》中描绘的这一压制民主所出现的社会

图景，并非耸人听闻。她描绘的这一图景成了斯大林在苏联执行肃反扩大化后出现的万马齐喑的情况的预言。^{注 32}

列宁倡导并支持党报批评党的领导机构

在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领导人）的问题上，列宁是一位积极的实践者，当有人因此遭到压制打击时，列宁是一位坚定而又热情的支持者。媒体是有权利和义务对上级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进行批评和监督的，不能把媒体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利从公民的舆论监督中分离出来，剥夺媒体及其工作人员对各种权力的监督。列宁在世时，一直支持被领导的报纸批评行政领导机构和党委会。

《经济生活报》起初曾是苏维埃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关报，它在党的原则指导下可以独立地、客观地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行使其舆论监督的权利，为此常常引起经济委员会的斥责。经济委员会负责人雷科夫曾企图剥夺《经济生活报》的舆论监督权。后来事情发展到了严重冲突的地步。于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召开会议，以《经济生活报》点名批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为借口，决定向中央要求“撤销”主编克鲁敏的职务。克鲁敏向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作出报告，要求中央检查《经济生活报》的“路线”是否符合党的路线。在列宁的领导下，中央肯定了《经济生活报》的工作，不同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撤销克鲁敏的职务，并且支持《经济生活报》继续与政府机关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等错误进行斗争，行使报纸代表人民在党的路线指导下对政府机关的监督权。^{注 33}

正像政府的机关报可以行使对政府机关的监督权一样，党的机关报按照党的精神行使对党的领导机关的监督权也是无可指责的，这和党的机关报应当服从党的领导并行不悖。列宁领导俄共（布）十大制定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第七节“工人民主制和党内生活”指出：“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是活跃党内生活“必须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注 34}

在列宁的倡导和支持下，《真理报》、《贫农

报》和《经济生活报》都曾认真行使了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监督权。党和政府根据报纸上的批评意见曾对某些不合理的方针、政策作了必要的调整，并不断地改进工作作风。由于《贫农报》经常发表来自农民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来信，为此列宁曾亲切地把《贫农报》称为“农民气压报”。1920年底到1921年初，国内战争刚结束，农民在战争中付出的牺牲使贫困达到了极点，惊慌和动荡笼罩着农民群众，对共产主义时期所实行的余粮收集制从怀疑转为不满。他们认为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余粮收集制应该停止执行。《贫农报》作为农民群众的代言人以及出于对党、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爱护，行使报纸应有的舆论监督权，连续发表了许多农民对继续执行余粮收集制的诉苦信和抗议信。列宁得知后，认为《贫农报》这样做有利于党和政府改变已过时的政策，于是要求《贫农报》主编卡尔宾斯基就农民来信批评党和苏维埃政府、批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事，提出详细的书面报告，同时附上农民来信的摘要。卡尔宾斯基挑选了五十封农民来信，并根据农民来信写成报告一并交给列宁，同时继续在《贫农报》上登载有代表性的农民来信。

^{注 35}

苏联斯大林执政时期确立“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新闻批评原则

列宁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签署政令剥夺对报刊的出版自由。1920年内战结束后，列宁则认为，确立新的政治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并着手逐步恢复新闻自由。具体做法有：（1）允许一部分非党报刊存在。（2）主张党内分歧应在党报上公开讨论。（3）提出达到一定人数的公民团体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出版物质条件。（4）鼓励报刊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但是，斯大林在后来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抽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条件，把列宁在夺取政权前和夺取政权之初的某些新闻观点和实践加以绝对化、模式化，使之成为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新闻制度，形成了一种很不利于表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极权制新闻传播模式。这种模式主张报纸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起组织作用，损害了新闻与社会

主义法治的关系,它否定普遍自由的形式,否定人民中的各部分成员直接行使自由权利,使新闻成为单纯的政治工具,导致新闻媒介的社会舆论功能的蜕化。

这种所谓的“苏联模式”连同斯大林在其它领域推行的专断政策,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格格不入的。在1925年联共(布)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谈到有人主张党的报刊应该允许不同意见时强调:“在我们看来,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但在他看来,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他所代表的“党的利益”是注定要凌驾于这种民主之上的。正是在这种专横集权的指导思想之下,他把此后对党的政策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接二连三地扣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或开除出党,或驱逐出境,或肉体消灭,在他把持的新闻媒介上当然也只剩下了他的“真理”。从20年代后期起,苏联新闻媒介秉承斯大林为首的领导层的旨意,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指名道姓,无限上纲,批判的对象波及整个文化界、知识界,以后又发展为肃反扩大化,使大批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遭到逮捕、监禁和杀害,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苏联新闻媒介从背离反映民意的神圣职责起,发展为官僚集权统治的驯服工具,这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异化、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的异化。这种异化现象不仅存在于斯大林时期,而且延续于后斯大林时期,这就更加令人痛惜、促人深思。

关于“党报能否批评同级党委”的争论,自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经出现,但真正作出“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原则和规定则是在斯大林执政时的苏共中央。这一规定出自一起历史事件。

1939年7月,科米省(州)委机关报《争取新北方报》的主编札(萨)多夫在该报的一篇编辑“按语”中,对于1939年7月10日公布的联共(布)科米省党委会常委委员会决议,进行批评(被认为是“粗率的错误”),被认为是在“省报纸”展开了反对省委会的论争”。为此,联共(布)中央1939年7月25日作出决议,决议全文如下:

《关于〈争取新北方报〉主编札(萨)多夫同志》^{注36}
(联共(布)中央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决议)

确认为《争取新北方报》的主编札多夫同志在该报纸的编辑“按语”中,对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公布的联共(布)科米省党委会常委委员会决议,发生了粗率的错误,在省报纸展开了反对省委会的论争。札多夫同志用《争取新北方报》反对省委会,是违反了联共(布)党章的规定,根据党章的规定,报纸应受党委会领导和监督,如果主编对省委会有不同的意见,他可根据党章向党委会提出问题,有时甚至可以向联共(布)中央提出问题,但无任何权力利用报纸来与省委会争论。

科米省委会对此事处理不当,对省委会决议一事未在编辑按语中反应出来,在省委会常务会上未讨论这个问题,亦未提交联共(布)中央。联共(布)中央决议:

(1)由于札多夫同志在编辑争论性的按语中反对省委会及省委会决议,特撤换札多夫同志的主编职务,并宣布其错误。

(2)将本决议分别通知各省委会、边区委会及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

自此以后,苏共中央正式确立了“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新闻党性原则和新闻批评原则。

这一决议对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曾任苏联《真理报》副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在苏联解体以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谈起他曾经试图对党内的不良现象开展一些批评。他不敢触动最高领导层,只是对州委书记和部长们作过一些批评,即便如此,也是如履薄冰,处境艰难。他感慨万分地说:“如果我们一切事(指那些批评——引者注)都做得如愿以偿,那么伟大的苏联,世界上三个最伟大的强国之一,具有极大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三极之一,就会存在下去”,而不致于崩溃瓦解。^{注37}

(作者系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注释

注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53页

注2 同上,第5卷,第410页

注3 同上,第22卷,第78页

注4 同上,第38卷,第517页

读者来信摘要

关于和陈独秀有关的“骨气”、“底气”的史实辨正

今得阅 2009 年第 4 期《炎黄春秋》载赵映林的大作《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很感兴趣，且甚获教益，然该文中所谈到的某些地方与史实有出入。辨正如下：

第一，赵文说：“教育部长朱家骅三次赠钱 5000 元，陈独秀一概拒之。”

据我所知，朱家骅于 1940 年、1941 年和 1942 年共三次派张国焘亲去江津分别向陈独秀赠款 1000 元、5000 元和 8000 元，共为 14000 元，而不是赵文所说的 5000 元，这三笔赠款，陈都一一收纳了。

另外，从 1940 年至 1942 年这三年，朱家骅并非教育部部长，而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那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为陈立夫。

第二，赵文说：“陈立夫曾拟助其《小学识字课本》出版，预支一万元稿费，书写出后陈立夫要他改书名，他坚决不同意，争执不下，书未出成，钱也分文未用。”

据我所知，陈独秀这本文字学大作叫《小学识字教本》，而不是《小学识字课本》。此书初稿名《识字初阶》，写于南京狱中。

说书稿的预支稿酬“钱也分文未用”，与事实不符。

注 5 引自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71 页

注 6 同注 1，第 36 卷，第 308-309 页

注 7 同注 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68 页

注 8 夏鼎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报刊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204 页

注 9 同注 4，第 33 页

注 10 同注 1，第 37 卷，第 324 页

注 11 同注 1，第 34 卷，第 399 页

注 12 同注 8，第 210-211 页

注 13 同注 1，第 208 页

注 14 同注 3，第 90 页

注 15 同注 1，第 3 卷，第 25 页末的附注

注 16 同注 3，第 38 页

注 17 同注 9，第 88 页

注 18 同注 8，第 205 页

注 19 林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视角的系统阐释》，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年，第 276 页。

注 20 同上，第 277 页

注 21 同上

1940 年 1 月 30 日陈致好友杨鹏升的信表明陈在当时就已“支取应用”此一预支稿酬充作了医药费。

第三，赵文说胡适于 1937 年 9 月他和蒋百里奉国民政府之命去欧美游说以求对我神圣抗日支持时，曾帮陈独秀联系一美国图书公司同意邀陈赴美写自传，但被陈辞谢。说此事发生于胡适“在美国任大使”时，则不确。胡被国府特任为驻美大使则是 1938 年 9 月 17 日。胡适此举是受汪孟邹先生之托。

读者 彭兴

更 正

编辑同志：

2009 年 4 月你刊发表我的《我对两个“和谐”的一点看法》一文，其中第 18 页右栏下面部分有“……非‘目的论’的生物进化学说，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书，是在宣言发表的第二年即一八四九年才发表的，……”按：此处有误，应为一八五九年。谈话时，我的书籍全打包了，记忆有误，谨此更正，并致歉意。

曾彦修

2009 年 5 月 10 日

本刊今年第 5 期 12 页左栏倒数第 8 行第一句话应为“五四精神是‘科学与民主’。”；第 56 页右栏倒数第 2 行“广东环江”应为“广西环江”。

注 22 《列宁全集》第 4 卷，316-317 页

注 23 同上，第 34 卷，第 220 页

注 24 同上，第 10 卷，第 348 页

注 25 文彦仁《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办报方针和言论批评自由》，《新闻学刊》，1985 年，第 1 期，第 40 页

注 26 同注 24，第 411-412 页

注 27 同上，第 3 卷，第 359 页

注 28 同 22 注，第 27 卷，第 187 页

注 29 参见《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264 页；第 28 卷，第 439 页，第 33 卷，第 67 页

注 30 同注 24，第 349 页

注 31 同注 5，第 340 页

注 32 同注 5，第 341 页

注 33 同注 25，第 40 页

注 34 同上

注 35 同上，第 40—41 页。

注 36 《联共(布)关于报刊书籍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4 年，第 296—297 页

注 37 《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1993 年，第 205 页

(责任编辑 萧 徐)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新中国60周年丛书：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内容简介：

本书多位作者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非凡的历史瞬间，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这些发表于著名纪实性杂志《炎黄春秋》的文章，致力于匡正教科书的偏误，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实历史，全面提供了观察中国政治、经济与生活变化的新视角，诸多真知灼见也闪耀其间。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权利觉醒的时代

彭德怀对“高彭联盟”的申诉

五十年代历史学家的命运

“文革”前的中学生思想教育

巴金留给我们的箴言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ISSN 1003-1170

06>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6.90元